

基督教二千年

阿爾諾·羅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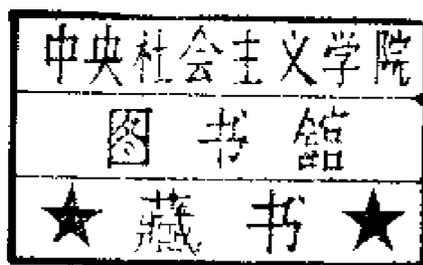


5979/71656
2

基督教二千年

马超群 编著

DH/B2/02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韩 琳
责任编辑：张国风

基督教二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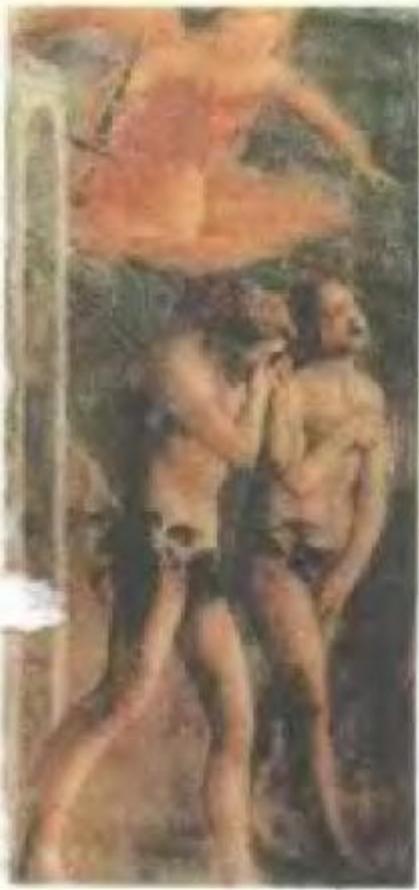
马超群 编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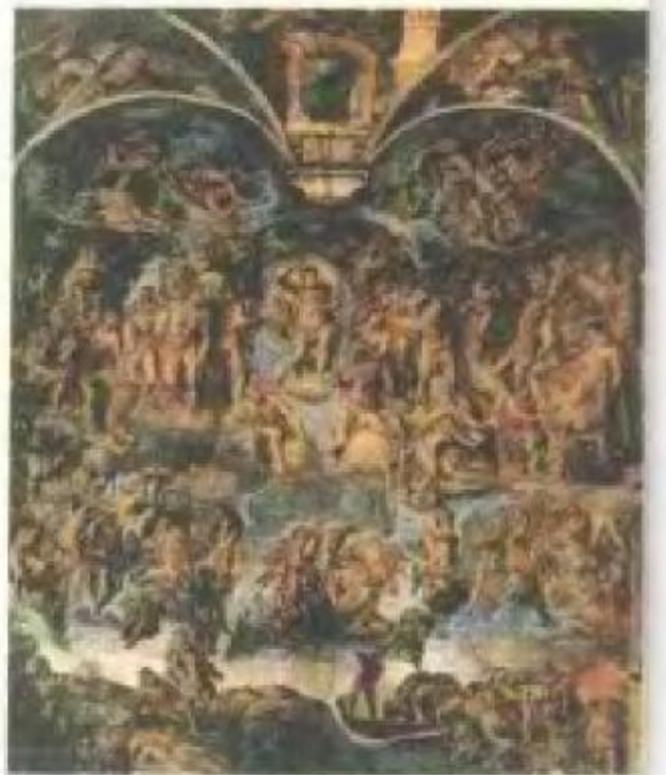
*

787×1092 1/32 8印张 2插页 147千字
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册 定价2.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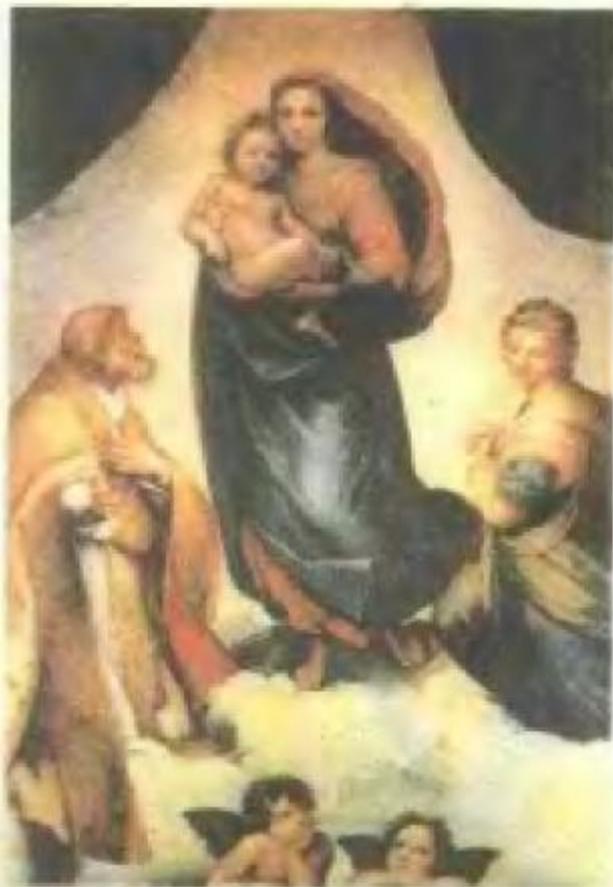


最后的晚餐

失乐园



最后的审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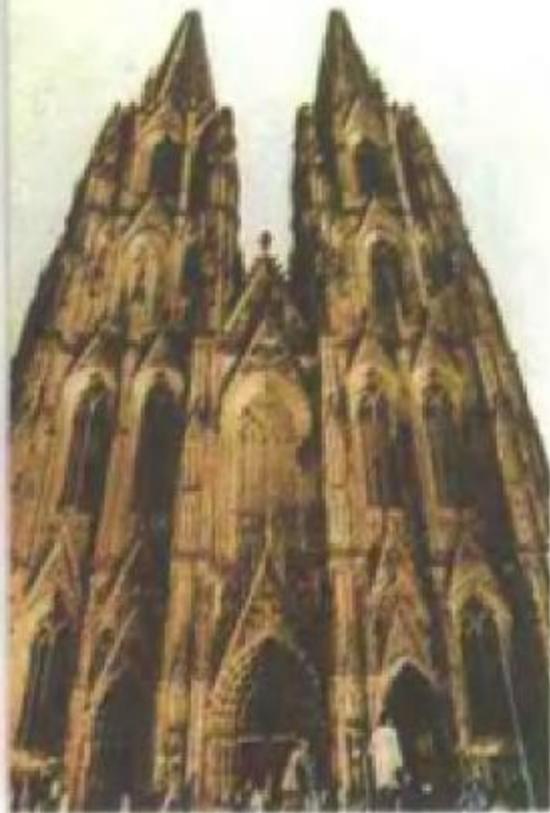


西斯廷圣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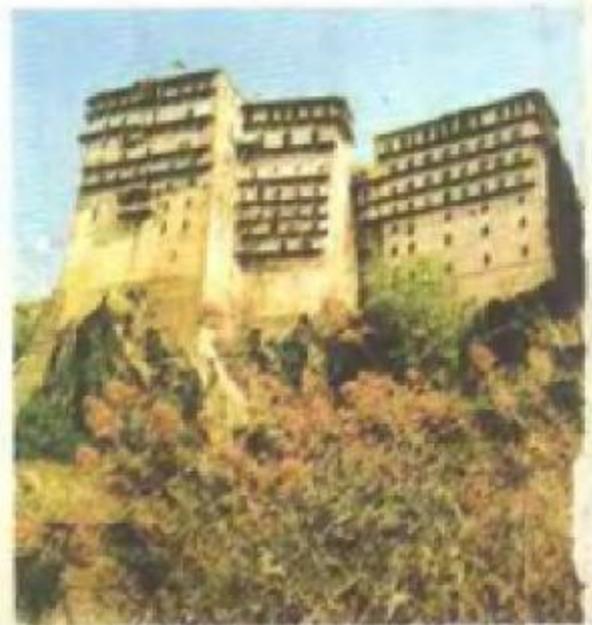
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13世纪《旧约圣经》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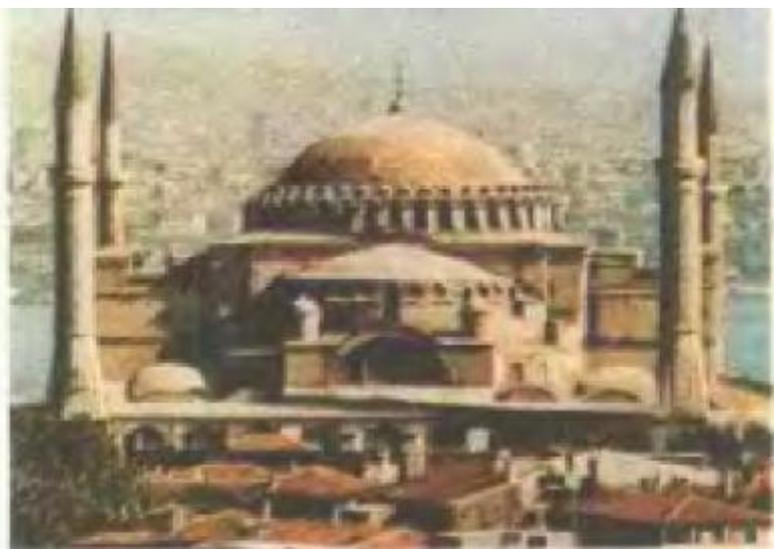


科伦大教堂

希腊阿陀斯圣山——东正教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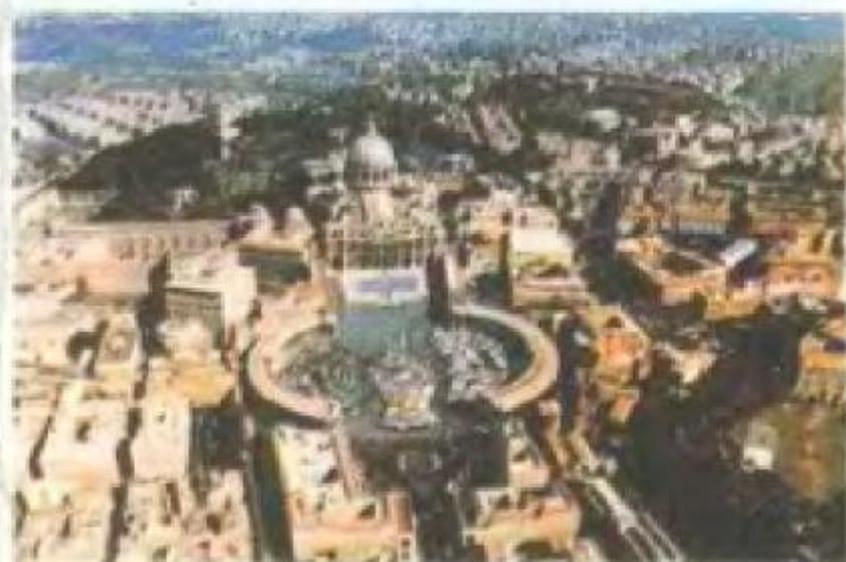


圣索菲亚大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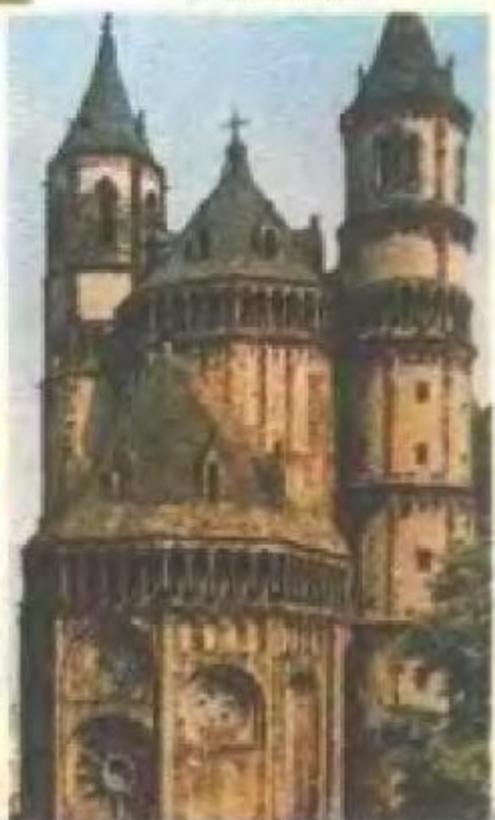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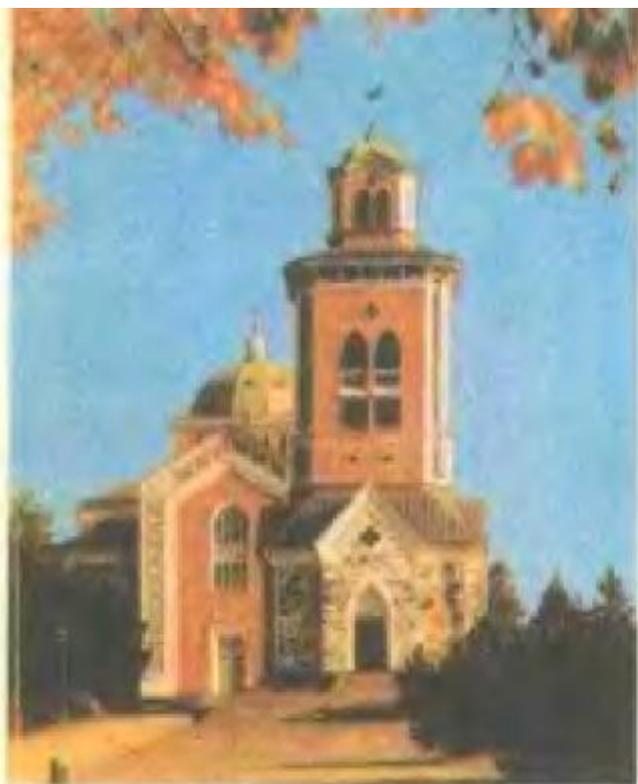
比萨大教堂

沃尔姆斯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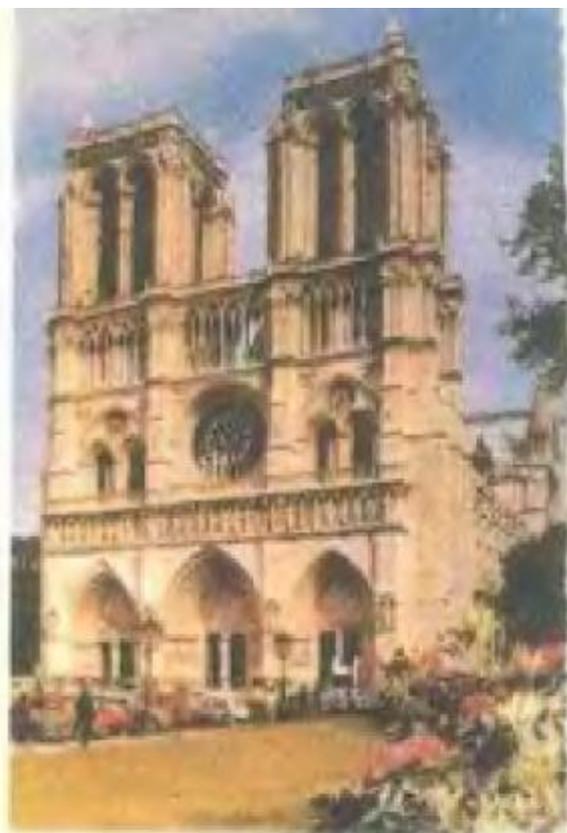


梵蒂冈教廷全景





芬兰乡间木造教堂



巴黎圣母院



意大利米兰大教堂



威斯特敏斯特教堂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基督教的起源和它的早期历史	1
一 不是耶稣创立基督教，而是基督教会 塑造救世主耶稣	6
二 基督教是罗马帝国阶级压迫和民族压 迫的产物	13
三 原始基督教——“奴隶和被压迫者的 宗教”	21
四 从原始基督教到奴隶主的基督教	28
五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西方 教会矛盾的由来及罗马教皇的起源	42
第二章 中世纪的封建教会和反 教会的“异端”动运	48
一 天主教会与西欧世俗封建主相互勾结	51
二 封建制度的辩护士和精神警察	60
三 西欧封建社会中最富有的财主	72
四 教皇与西欧世俗君主的角逐	84

五	“十字军东征”——教皇发动的侵略战争	101
六	“异端”运动的兴起和官方教会的镇压	117
七	威克里夫——“宗教改革的启明星”	127
八	胡司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的先声	134

第三章 近世基督教

一	马丁·路德和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	146
二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和“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164
三	英国国教的产生及清教运动的兴起	178
四	“无可奈何花落去”——天主教会的徒劳挣扎	190
五	“变色龙”的演化——封建的天主教会转向资本主义	201
六	与殖民侵略血肉相连的传教事业	211
七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226

附 录 本书参考及引用的主要书目

引 言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和佛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其中，基督教流传最广，分布于150个国家和地区。

基督教有190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分成三大主要派系：(1)罗马公教(Catholica)，亦称“加特力教”。由于传入中国后，该教教士将基督教信仰的神译为“天主”，故我国习惯称罗马公教为“天主教”。(2)正教(Orthodox)，亦称“东正教”或“希腊正教”。(3)新教，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会而产生的新宗派。西方一般称新教为Protestantism，即“抗议宗”。在中国，习惯统称新教各派为“基督教”或“耶稣教”。除上述三大主要派系外，还有一些较小的独立派别，如聂斯托里派(我国古时称之为景教)、科普特教会和亚美尼亚教会等。

最初的基督教是从犹太教派生出来的一个新宗派，它继承了犹太教的一神论。又逐渐吸收各种东方神秘宗教和庸俗化的希腊哲学思想，形成自己的教义体系，并发展独立的教会组织，最后同犹太教决裂，成为自我意识的基督教。基督教的正式经典称为《圣经》，包括两大部分：《旧约》和《新约》。《旧约》是从犹太教继承下来，《新约》是基督教形成后才编写的。犹太教因经中讲述上帝耶和華(雅赫维)与犹太民族在

西奈山订立约法，故称其经典为“约书”。基督教继承此说，称耶稣基督以他的流血牺牲在上帝面前与人立了新的“约”，故将基督教形成后编写的经典称为《新约》，从犹太教继承下来的那部分经典就叫做《旧约》。

《旧约》本为犹太教经典，原文为希伯来文，稍后有希腊文译本。《旧约》被基督教接受为经典后，各教派的《旧约圣经》在卷数和次序略有差异。基督教新教承认的《旧约》经典为39卷，而天主教除这39卷外，还收录《次经》7卷，共46卷。《旧约》经卷分为“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录”三类，主要内容包括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始祖的神话；古代犹太人的法典和宗教条规；古代犹太民族的历史和传说；具有宗教内容的诗歌、格言和预言文学作品等。

《新约》原文为希腊文，共27卷，包括4部《福音书》、《使徒行传》、21篇“使徒书信”和《启示录》。主要内容有：关于耶稣的神话传说和说教；使徒们的传教故事和以他们的名义所阐述的教义学说等。

基督教信仰上帝耶和華和救世主耶穌基督，其基本教义是：(1)相信上帝（天主）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圣经》神话称上帝用了6天时间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始祖，用泥土制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又以亚当的肋骨造其妻夏娃。第七日，上帝完成造物之工，便歇息了，此日称为安息日。(2)相信人类自始祖亚当起，便都犯了“罪”。《圣经》神话称上帝将亚当、夏娃夫妻二人安置在伊甸园中享乐，但他们违背上帝命令，偷吃“知善恶树”上的禁果而“犯了罪”，

被逐出乐园。基督教宣称，人类始祖犯的“罪”传给了子孙后代，故人人人生来都有“罪”（即“原罪”），并在“罪中受苦”；但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解脱苦难，只有信仰上帝和耶稣基督，“罪”才能被赦免，得到拯救。因为上帝为了拯救世人，派遣自己的独生子耶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牺牲，用自己的鲜血洗净信徒的“罪”。故耶稣就是替人类赎罪的羔羊，是救世主。(3)基督教要人相信，由于世上充满罪恶，牺牲了的基督虽已复活升天，但将再次降临人世，在“世界末日”审判活人和死人。信教者的灵魂将升入天堂得永生；不信教者则被抛入地狱受永罚。(4)基督教教人相信来世，对现实世界的压迫剥削要忍耐顺从，不能反抗，把希望寄托到死后升入的“天国”。(5)基督教的最大教派——天主教除信仰上帝（天主）和耶稣基督外，还崇拜圣母马利亚。

基督教有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公元1世纪，基督教诞生在罗马帝国的社会下层群众中。最初的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群众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但基督教不号召人们同统治阶级作斗争，宣扬忍耐顺从，要人们寄希望于来世，所以很快被统治阶级利用，4世纪时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为垂死的奴隶主阶级的政治统治效劳。

到中世纪，基督教传遍欧洲，成为欧洲封建社会的支柱。教会是封建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欧洲最富有的封建大地主；教会垄断文化教育，基督教神学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1054年，欧洲的东部教会与西部教会最后决裂，东部教会称为“正教”（东正教），西部教会称为

“罗马公教”（天主教）。在欧洲封建社会里，由于基督教会居于统治地位，故劳动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往往以基督教的“异端”运动形式出现。在封建社会末期，新兴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也多半披上宗教外衣。16世纪时发生宗教改革运动，从天主教会里分离出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教。

在近代，基督教各派系（包括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都相继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统治本国人民和对外侵略扩张的政治工具。随殖民侵略活动的开展，基督教从欧洲扩散到南北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成为遍布全球的世界宗教。目前，共拥有信徒9.5亿人，几占世界总人口的1/4。

在9亿多基督徒中，天主教徒占一半以上，约有5.5亿人，主要分布于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比利时、波兰、匈牙利、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各国。天主教宗教仪式烦琐复杂，组织制度严密，有等级分明的教阶制度^①；梵蒂冈的罗马教廷是天主教会的世界中心，教皇是天主教会的最高首脑^②。

东正教徒总数约8500万人，主要分布于苏联、保加利亚、希腊、塞浦路斯、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东正教宗教仪式与天主教略同。在组织上，世界各国东正教会没有象

① 在天主教会内，神职人员分成许多品级：教皇、枢机主教（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父（司铎）、助祭等。天主教规定，一切教士都必须独身。东正教无教皇和枢机主教，其余神职与天主教类似。东正教的主教必须独身，主教以下教士可以娶妻。

② 我国解放后，中国天主教会已与梵蒂冈罗马教廷割断关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地自办教会。

天主教会那样形成统一的整体。按历史传统，君士坦丁堡总主教虽享有东正教的“普世牧首”（世界首席主教）称号，但实际上他不能统领各国的东正教会。各国东正教会都是独立自主的，彼此间仅有松散的联系，即不定期召开宗教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新教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从天主教会分离出来的新宗派，它们不承认罗马教皇的统治地位，反对天主教烦琐复杂的宗教仪式，建立适合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的节俭教会。最初产生的新教是路德宗（信义宗）、加尔文宗（长老宗）和安立甘宗（圣公会）等三大宗派，后来随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政治斗争的需要，又从三大宗派中分衍出数百个新教支派。在组织上，新教各派教会都是独立自主的。大多数新教教会取消了封建的教阶制，各地的教会一般由长老、牧师管理。新教主要分布于英国、美国、德国北部、瑞士、瑞典、挪威、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部非洲，新教徒共约3.3亿人。

基督教与许多国家，特别是欧、美各国的历史和文化密切相关，对当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也有较大影响。我们不论研究国际现状或世界历史，基督教史都是必不可少的研究课题。

第一章

基督教的起源和 它的早期历史

一 不是耶稣创立基督教，而是 基督教会塑造救世主耶稣

公元1世纪前半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兴起。

基督教是怎样产生的？教会宣传说，基督教是上帝耶和华的独生子、救世主耶稣亲自在巴勒斯坦创立的。在《新约》圣经的《福音书》^①里，记载着关于耶稣基督的传说：

《马太福音》罗列了耶稣的家谱，从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开始，代代相传，最后传至马利亚（耶稣的母亲）的丈夫约瑟。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犹太国王“大卫的子孙”。另外，几部《福音书》都特别强调耶稣是神的化身，是上帝的独生子，是救世主。说他为了拯救人类，降世为人，诞生在犹太伯利恒一个木匠约瑟的家里。据

^① 《新约全书》的开头4卷为《福音书》，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福音”原意为“好消息”。教会称，《福音书》是向受苦受难的人“报告好消息”的，说只要他们承认自己有“罪”并信仰耶稣，救世主耶稣便拯救他们。

称，耶稣的母亲马利亚，许配给了约瑟，但尚未出嫁，便受“上帝圣灵”的感动而怀身孕。约瑟想把怀孕的未婚妻休了，但上帝的使者前来解除他的顾虑，在他梦中显现，说：“只管娶过你的妻子马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约瑟醒来后，遵照上帝使者的嘱咐，娶过马利亚来，没有和她同房，等她生产后，就给这个婴儿起名叫耶稣。耶稣到30岁时，开始在巴勒斯坦传教，宣传“天国”的“福音”（好消息），说“天国近了”，劝人悔改，并在穷苦人中招收许多门徒。耶稣在传教时，曾表演许多“奇迹”：医好许多人的不治之症，如使哑巴说话、瞎子眼睛复明、麻疯



基督受难

病人一身洁净等；又能使死人复活、以5个饼两条鱼让5千人吃饱肚子，他本人还能在海面上行走等等。耶稣的宣传和表演的“奇迹”赢得许多人的信仰和赞叹，但却遭到巴勒斯坦犹太教祭司和罗马官员的嫉恨。他被指控违反犹太教、蔑视罗马政府当局、企图自立为犹太王，被罗马派驻犹太的总督彼拉多判处死刑，钉死在耶路撒冷一座小山上的十字架上。不久，他复活升天，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耶稣虽升天而去，但在世上留下一个由他的信徒组成的教会。

以上便是《福音书》里关于耶稣创立基督教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于公元325年尼西亚宗教会议上被教会确定下来，写入《信经》中，作为不可怀疑的信条，流传至今。

一般的西方学者虽不承认耶稣具有神性，但相信耶稣真有其人，并认定他是基督教的创始者。然而多年来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圣经》中关于耶稣的种种传说是虚构的，迄今发现的一切历史资料都难以说明耶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耶稣创立基督教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基督教产生的时代的各种著作很少提到基督教。罗马帝国初期的历史家塔西陀（公元55—120年）和斯韦托尼阿（公元75—160年）的著作中只简单地提到1世纪时有人自封为“救主基督”，其信徒叫基督徒，但没有记载耶稣本人的生平事迹，甚至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提及。小普林尼于2世纪初与罗马皇帝图拉真的通信也只提到罗马帝国有基督徒存在，说他们“象对一位神一样地对基督唱赞美歌”，但同样不能证实耶稣是基督教的创始者。基督教会声称耶稣是被

罗马派驻犹太的总督彼拉多判处死刑的，但在1世纪罗马政府的档案里根本找不到关于耶稣的材料。《圣经说》耶稣生长在犹太人的故乡巴勒斯坦并在那里传教，但1世纪时的犹太历史家约瑟福斯·弗拉维（约公元37—100年）对耶稣就一无所知。虽然在约瑟福斯的著作《犹太人的古代事迹》一书中有两处地方提到耶稣，但经近现代学者们的考证，该书提及耶稣的那两段文字是3世纪时的基督徒缮写者添加进去的，不能作为耶稣创立基督教的证据。

基督教会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认定耶稣是基督教的创始者，他们的主要依据是《新约》圣经的传说，但这些传说多是互相矛盾的神话。《新约全书》有一个形成过程，其中各篇作品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而且在流传和编订过程中，经过多人之手增删更改，加工润色，最后才汇集成书，所以《圣经》中关于耶稣基督的描述常常互相抵触，漏洞百出。

《新约全书》中最早产生的一篇作品是《约翰启示录》（约写成于公元1世纪60年代末）。此文首尾部分虽提到耶稣之名，但文章中根本没有耶稣的生平事迹材料。它描绘耶稣基督是古代犹太预言中的“神子”，说他“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象在炉火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完全是位天神的形象，同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毫不相干，可见《启

示录》的作者对《福音书》里的耶稣故事全然无知。这也说明了在1世纪中期，耶稣的故事还没有编造出来。

记载耶稣故事的各种《福音书》，是基督教产生以后很久才陆续出现的。4部《福音书》中以《马可福音》为最早，出现于1世纪末，其余几部是在2世纪上半期才先后流传于世。当时，初期的基督教会从犹太教逐渐分离出来，基督教内部又宗派林立，互相进行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各教派根据各自的政治需要编写《福音书》，按照各自的观点来描绘救世主耶稣的形象。因此，《路加福音》中的耶稣家谱同《马太福音》中的耶稣家谱就大不一样。在同一本《马太福音》里，关于耶稣的描写也是前后矛盾的。它忽而说耶稣是大卫王的子孙，忽而又说是上帝的独生儿子。

基督教产生于犹太教的一个宗派，最早的基督徒又多半是犹太人，《福音书》的观点自然会受到犹太教的影响。《旧约》中曾预言，上帝今后派到世上来的犹太复国救主将是“犹太王”，所以《马太福音》作者编写的耶稣家谱就把耶稣说成是以色列——犹太国王大卫的子孙，从而使耶稣这位救世主具有神圣性和合法性。后来，随着基督教在非犹太人中广泛传播，仅仅将复临人间的救主耶稣说成是犹太王的后裔，说成是犹太复国救主，对广大的非犹太民族出身的基督徒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所以，必须把耶稣说成是全人类的救世主。那么，又怎样才能使这位全人类的救世主具有神圣性呢？基督教既已接受犹太教的一神论，除上帝外不许敬拜其他神祇，当然就不能将耶稣当作一位独立的神，只好把

他说成是上帝的独生子。然而又产生新的矛盾：在古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徒看来，天上的神仙与地上的凡女相结合，诞生英雄人物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基督教是一神教，怎么能说上帝竟与凡间的处女马利亚共同生了耶稣呢，这种观点是对上帝的“亵渎”，是基督徒所不能接受的。于是《福音书》的撰写家就制造出童贞女马利亚许配给了约瑟，但未出嫁便受圣灵感动而怀孕的奇谈故事，证明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为了吸引各种多神教徒改信基督教，《福音书》作者把当时流行于罗马帝国的各类宗教的思想素材尽量运用到耶稣形象的塑造上，因而耶稣的故事越编越矛盾，越编越离奇。

其实，“耶稣”是犹太人中一个极普通的名字。“耶稣”是“约书亚”（Josua）一词的希腊文音译，其原意为“雅赫维（耶和華）^①拯救”。“基督”（Christos）是希伯来文（古犹太文）“弥赛亚”（受膏者、救主）一词的希腊语译。显然，人们对自己幻想中的救世主赋以“耶稣”的名字，加给他“基督”的称号，是理所当然的事。

至于纪念耶稣的一些宗教节日更是基督教产生后几个世纪才由教会逐步确定的。圣诞节（12月25日）是基督教最盛大的节日。在基督教盛行的国家，圣诞节已成为习惯中的全民节日。届时各公共场所、街道和商店都布置得五彩缤纷，琳琅满目，家家户户都团聚会餐，亲戚朋友还要互相道贺，

^① “雅赫维”是犹太教信仰的唯一真神，后来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基督徒将“雅赫维”一词读成“耶和華”。

赠送礼物，十分热闹。但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早期基督教会并没有这个节日。《福音书》里根本没有提及耶稣生于何年何月何日，直到公元354年，罗马帝国西部拉丁教会的年历中才第一次写明12月25日为耶稣生日，此后，罗马帝国各地教会才逐渐以这一天为“圣诞节”。12月25日并非历史学家考证出来的耶稣生日，而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官方宗教之后，教会才把罗马帝国原来信奉的太阳神（米特拉神）的生日移植到耶稣身上，变成了基督教的圣诞节。这一点正好说明基督教“是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

上述大量事实证明：（1）耶稣创立基督教的传说没有任何历史根据；（2）不是耶稣创立基督教，而是基督教会塑造出救世主耶稣。

耶稣的传说既然如此荒诞不经，为什么千百年来有众多的人相信它呢？一方面，因为这些神话适合科学不发达时代受苦受难的人们期待救世主来临的那种幻想。另一方面，任何宗教都是宣扬迷信，提倡盲目信仰。基督教早期神学家德图良曾说：“上帝之子死了，虽然是不合理的，但却是可信的；埋葬了，又复活了，虽然是不可能的，但却是可肯定的。”又说：“正因其为荒诞不经，我就信仰它。”所以基督教会历来反对独立思考，严禁任何洞察神秘的企图。耶稣的故事既已载人经典，并概括在尼西亚宗教会议通过的《信经》中，就成了千古不变的教条。谁对这些神话持怀疑态度，便被认为是信仰不虔诚，信心不坚定，甚至被指控为“异端”

或“叛徒”，受到宗教法庭的惩罚。

二 基督教是罗马帝国阶级 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产物

基督教并非耶稣所创立。它于公元1世纪前半期产生在罗马帝国东部地区的社会下层群众中，这不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它是时代的产物，是罗马奴隶社会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产物。

在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罗马奴隶制共和国不断对外侵略扩张，一跃而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地中海大霸国。这时的罗马，政治上十分强盛，奴隶制度空前发展。古罗马的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剥削压迫是十分残酷的。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不仅在监工的鞭笞下从事最繁重的劳动，而且许多人还被逼充当角斗士，在角斗场上互相格杀或与野兽搏斗，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供奴隶主老爷们观赏取乐，故奴隶与奴隶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奴隶主贵族的大庄园经济挤垮了意大利的小农经济，人数众多的农民破产失地，纷纷流入城市，变成无业游民，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外，罗马政府在广大的被征服地区，建立起许多行省，通过征收苛捐杂税，掠夺各省居民，把被征服的各民族人民推入苦难的深渊。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期间，罗马奴隶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不堪忍受剥削压迫的各民族人民，不断掀起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其中

有两次西西里奴隶起义、阿里斯东尼克起义、斯巴达克起义和多次犹太起义等。起义者英勇战斗，曾给罗马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以沉重打击，但历次起义最后都失败了，被罗马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随后，罗马统治者将共和国体制改为军事独裁的帝国体制。从屋大维（奥古斯都，公元前27年至公元11年在位）开始，罗马皇帝（起初称“元首”）集国家大权于一身，依靠庞大的官僚机器和精锐的军队，严密控制全国；又重申奴隶制的残酷法律，加强对劳动群众的统治。罗马帝国的建立，标志着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强化，苦难人民的从反抗斗争中求得解放的希望破灭了，普遍陷入绝望状态中。

绝望的“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贫的人们的出路在哪里”？恩格斯写道：“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42页）在原始社会，人们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软弱无力时，就相信有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着一切，产生原始的宗教崇拜。到阶级社会中，被压迫者在与统治阶级的斗争中感到自己软弱无力时，也会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神在支配着自己的命运；人们对自己的力量丧失信心，就必然盼望救世主从天而降，解救受苦受难的人民；现实生活中的反抗斗争接连失败，物质上的解救无望，就只有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产生对美好来世的信仰，把今生得不到的幸福生活，寄之于虚无缥缈的来世。基督教应许那些不幸的人们，要善于忍受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痛苦，在来世才能得到善报，得到永生之乐，在“天

堂”里享福。于是，人们终于找到一条精神上的出路。基督教就这样在罗马帝国劳苦大众的惶惑中、哀怨声中、对来世生活的一线希望中应运而生。这就是基督教产生的历史背景。

基督教的产生，不仅有其社会基础，也有自身的思想来源。在基督教产生的时代，罗马帝国境内流行的一些社会思潮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恩格斯说，基督教是“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哲学的混合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

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和帝国初期，希腊哲学中过去盛极一时的伊壁鸠鲁主义已不时兴了。因为它是唯物主义哲学，只关心现实生活，教导人们追求人生的幸福。而这时的罗马劳苦大众，对现世幸福生活的憧憬已成泡影，对他们来说，只有从宗教中寻求精神的寄托。即便是那些社会上层分子，由于这个时期阶级斗争的激化，社会动荡不定和奴隶制度由盛而衰，他们也同样处于意志消沉和心情颓废的状态中。所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斯多葛派哲学。这时的斯多葛哲学已蜕变为一种宗教唯心主义派别，它的代表人物是塞涅卡（公元前6年或8年——公元65年）。他宣扬宿命论和神秘主义，认为命运、天命统治着世界，因而提倡听天由命；对现实生活则主张恬淡寡欲，抛弃人生的乐趣。这种宿命论观点和实行禁欲主义的主张给基督教很大影响，故人们称塞涅卡为“基督教之叔”。

罗马帝国时期另一个宗教唯心主义派别是斐洛派哲学。斐洛（约公元前25年——公元40年）是生长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亚历山大里亚是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交往最密切的地方，斐洛深受希腊文化影响，他的思想的特点是将犹太教神学与柏拉图哲学和斯多葛哲学揉合在一起。他把希腊哲学中解释宇宙本原的“逻各斯”解释为上帝创造万物的原型、上帝的智慧和全能，认为“逻各斯”是上帝与世界万物之间的媒介。《新约·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上帝）同在，道就是神（上帝）。这道太初与神（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约翰福音》第1章第1—3节）《圣经》所说的“道”就是“逻各斯”。可见斐洛派哲学对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形成发生深刻影响，故人们称斐洛为“基督教之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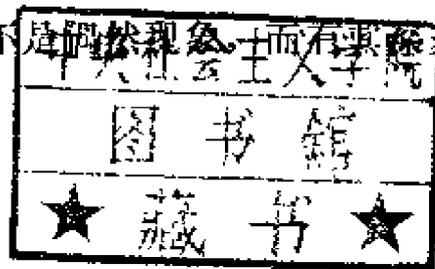
各种东方宗教在罗马帝国境内的流传对基督教思想和仪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特别为塑造救世主耶稣的形象提供了大量素材。这些东方神秘宗教主要指流行于小亚细亚的大母教、古埃及人对爱西斯和奥西里斯神的崇拜以及从波斯传来的米特拉教。基督教教义中的死后复活、永生、世界末日、来世王国、世间生活的果报等学说，以及洗礼、圣餐等仪式都可以从这些流行民间的宗教中找到它们的渊源。

但在东方神学中对基督教影响最大的是犹太教神学。犹太教的《圣经》被基督教承受下来，成为基督教《圣经》中的《旧约全书》。现行的《旧约全书》共39卷，分为《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录》3大部分，其主要内容为上帝

创造世界和创造人类的神话、古代犹太的传说故事、法典、宗教条规以及古犹太的文学作品等。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一神教义。《旧约》中唯一真神雅赫维（耶和華）被基督教承认，尊奉为创造世界、主宰世界的上帝。基督教笃信救世主，其救世观念也是从犹太教的“弥赛亚”观念发展而来的。希伯来文的“弥赛亚”一词原意为“受膏者”。古犹太人封立君王或最高祭司时，要举行一种仪式，在受封者头上敷以油膏，故古犹太君王有“受膏者”之称。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犹太民族处于危亡时期，犹太人中盛传：上帝将重新派遣一位“受膏者”到世上来拯救犹太，解放犹太。“弥赛亚”一词就成为犹太人幻想中的“复国救主”的专称。罗马帝国初期，这种“弥赛亚”观念十分适合广大的帝国居民的需要，走投无路的苦难群众从犹太教思想中找到了他们的救星。基督教宣称：耶稣就是“基督”（“弥赛亚”一词的希腊语译），基督就是全人类的救世主；信仰了他，灵魂便可得救，升入“永生”的“天堂”。来自犹太教的“弥赛亚”观念构成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石。

恩格斯说：“……基督教是犹太教的私生子，……”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1年2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7页）这不仅因为犹太教神学是基督教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基督教诞生之时，是以犹太教的一个新宗派的面貌出现于世的。基督教为什么首先在犹太群众中萌芽呢？这也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犹太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古代历史上，他们虽曾建立过短暂的独立国家，但后来却长期遭受异族的蹂躏，所以犹太人从宗教中寻找出路的要求特别强烈，期待弥赛亚救主降临的愿望尤为迫切。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古代犹太历史作一简略的回顾。

公元前14世纪前后，犹太人的祖先——游牧的希伯来人各部落陆续侵入巴勒斯坦，征服土著居民迦南人，并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公元前11世纪，希伯来各部落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以色列——犹太王国。公元前10世纪，在国王大卫（约公元前1000——960年）及其后继者所罗门（公元前960——930年）统治时，以色列——犹太王国进入繁盛时期。但所罗门死后，国家一分为二：北为以色列王国，定都撒马利亚；南为犹太王国，定都耶路撒冷。统一国家分裂后，国势日渐衰落，不断遭受异族的侵略和统治。

公元前722年，以色列国为亚述帝国所灭。公元前586年，犹太国亡于新巴比伦王国，大批犹太人被掳往美索不达米亚，史称“巴比伦囚掳”。公元前538年，新巴比伦王国亡于波斯，犹太“囚掳”被释放，返回巴勒斯坦。这时，犹太教已形成，他们在耶路撒冷建立起犹太教祭司贵族统治的神权国家，臣属于波斯帝国。公元前4世纪以后，犹太国仍被异族控制，相继附属于希腊贵族统治的马其顿、托勒密、塞琉西诸王国。公元前301年，托勒密埃及征服巴勒斯坦，迫使上万犹太人迁往埃及城市亚历山大里亚。后来，更有大量犹太人移居地中海沿岸各地。公元前198年，塞琉西

王国从托勒密手中夺得巴勒斯坦，以苛重的捐税对犹太居民进行剥削，甚至抢掠耶路撒冷圣殿的财富。公元前168年，塞琉西王国统治者宣布犹太教为非法，激起犹太人民起义（“马喀比革命”）。公元前142年，犹太脱离塞琉西王国统治，一度取得独立。但这时西方的罗马强大起来，不断向东方扩张。公元前64年，叙利亚地区被罗马并吞，变成罗马共和国的一个行省。公元前63年，罗马大将庞培侵占耶路撒冷，将犹太置于叙利亚总督监管之下。罗马政府扶持犹太贵族和犹太教高级祭司充当傀儡，剥削压迫犹太人民。饱受异族压迫之苦的犹太人民渴求独立自由，不断掀起大规模的起义运动。公元前51年，爆发了一次反罗马起义，但被镇压下去，被卖为奴隶的犹太人有3万人之众。公元前4年，傀儡王希律死，犹太人民又趁机起义，但也遭到罗马政府镇压，两千名起义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公元6年，罗马帝国废黜犹太傀儡王，把犹太和撒马利亚正式划归叙利亚行省，犹太国从此灭亡。这一年，又爆发一次起义，失败后起义者仍坚持秘密组织活动。公元66年，巴勒斯坦再次爆发大规模犹太起义，历史上称为“犹太战争”。起义者曾重创罗马军队，坚持斗争4年之久，但最后仍然失败，耶路撒冷被攻陷，并毁于大火，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遭惨杀，钉死在十字架上者不计其数，以致“没有地方再立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再钉人”，幸存下来而被卖为奴隶的就有7万人之多。因为国土沦丧，民族危亡，反抗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故犹太人对“弥赛亚”救主抱着十分殷切的期望。

由于阶级地位不同，罗马政府统治下的犹太人分成许多不同的派别，其中多数派别都信仰犹太“先知”们预言的“弥赛亚”救主将降临人间，建立地上“天国”的说法。其中《新约》圣经经常谴责的法利赛派是较保守的派别，代表中产者和犹太知识分子的愿望和要求。他们把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弥赛亚”救主身上，反对斗争，主张妥协，认为只要遵循犹太教律法便能得救。吉洛特派（亦称“狂热派”或“奋锐党”）是犹太下层群众中的激进派别，代表城市平民、乞丐和游民无产者。他们狂热地宣传“弥赛亚”救主即将降临人间，推翻罗马帝国和犹太贵族的统治；主张以暴力促进“天国”的来临，故在“弥赛亚”的旗帜下多次掀起英勇的起义斗争。以西尼派（或译称“艾赛尼派”）是代表巴勒斯坦农、牧民的派别。他们反对外族统治，虔诚信仰“弥赛亚”救主，但与吉洛特派不同。吉洛特派（狂热派）主张暴力斗争，而以西尼派则不主张斗争，只寄希望于神，坐等弥赛亚救主从天降临。以西尼派成员出身贫苦，他们在本教派内部宣传财产公有，实行经济互助，过禁欲主义生活。近数十年在巴勒斯坦陆续发现的《死海古卷》就是以西尼派的经卷抄本。不少学者认为，原始基督教同以西尼派十分近似，最初的基督教就是从以西尼派或类似以西尼派的巴勒斯坦犹太教秘密教派发展演变而来。

与此同时，在移居小亚细亚各地的犹太人中，也有些秘密教派，他们的“先知”狂热宣传“弥赛亚”救主即将降临，拯救苦难的犹太人。这些教派也是基督教的先驱。《新

约全书》中最早的作品《约翰启示录》提到小亚细亚“七个教会”，说明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一样是基督教的策源地。

总之，基督教是公元1世纪上半期在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一带的犹太下层群众中萌芽的；原始基督教是犹太民族争取独立解放高潮中派生出来的一个犹太教新宗派，基督教是罗马帝国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产物。

三 原始基督教——“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

基督教在建立的最初阶段被称做原始基督教，它存在的时间大体在公元1世纪30年代至60、70年代。原始基督教与后来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基督教有明显的差别。原始基督教还不是自我意识的基督教，而是以犹太教的一个新宗派的姿态出现的，它的思想面貌主要反映在《新约全书》最早的一篇作品《启示录》里，《启示录》约写成于公元68年前后。

原始基督教是在社会下层群众中自发产生的“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3页）。最初的基督徒主要是属于社会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据《新约·福音书》传说，耶稣是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长大的，他的门徒大多是牧人、渔民、罪犯等穷苦人，耶稣最宠爱的第一号门徒西门·彼得和第二号门徒雅各，都是以打渔为生的。这就反映出，最早的基督信徒多半是贫穷孤苦者。当时

处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劳苦大众在斗争失败之后，把获得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弥赛亚”救主身上。他们殷切地期待救世主，狂热地宣传救世主，故原始基督教是一个狂热宣传救世主的群众运动。



使徒彼得的铜像

在原始基督教阶段，教义还处在萌芽时期，尚未形成明确的神学思想体系。它根本没有后来基督教会的那种“三位一体”论，也没有“原罪”和“因信称义”说，原始基督教只有一个信条：信徒因基督的牺牲而获救。《启示录》谈到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又复活了，他是为世人赎罪而牺牲的“羔羊”，所有受苦受难的信徒都因他的流血牺牲在神面前“赎了罪”。原始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就是相信这位死而复活的救世主即将复临，到人间建立快要到来的“千年王国”。这个“千年王国”不是在遥远的后世，而是建在现实世界上。1世纪末及2世纪初，《福音书》里还有这样的话：“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上帝的国大有能力临到。”（《马可福音》第9章第1节，参见《马太福音》第16章第28节）“人子将降临在他的国里。”（《马太福音》第16章第28节）在这个

“千年王国”里，基督将为王，并对世人进行最后审判，信徒们则跟随基督救主一同掌权享福，从而为受苦受难的人们展示出幸福的“地上天国”的美景。

原始基督教“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5页），所以它明显地反映了这批最早的基督徒对统治者的憎恶和仇恨情绪。《启示录》的作者咒骂罗马政府的残暴统治，隐喻罗马帝国为“巴比伦大淫妇”，其统治者为“七头十角兽”；另一方面，将基督救主比作“羔羊”，预言“羔羊”必将战胜“七头十角兽”，推翻罗马帝国，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又预言在“世界末日”，将要审判和严惩罗马皇帝，“因他的罪恶滔天”，“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齐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新约·启示录》第14章第8节；第18章第5节，第8节）。

原始基督教信徒对残暴的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复仇情绪是十分强烈的。《启示录》作者说，他看见在祭坛底下，有那些被杀害的基督教殉道者的灵魂，他们大声叫喊：“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新约·启示录》第6章第9至10节，第19章第1至3节）恩格斯指出：从《启示录》看来，原始基督教时期，“还根本没有什么‘爱的宗教’……这里宣讲的是复

仇，毫不隐讳的复仇，健康的、正当的对基督徒迫害者的复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44页）这一点说明原始基督教与后来的基督教有着多么大的差别啊！公然劝导劳动人民不要反抗统治者，“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等类说教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见诸经传的。在4部《福音书》流行以前，处在婴儿时代的原始基督教还不曾有这种伪善的宗教道德。

《新约全书》中的4部《福音书》的出现，较《启示录》晚得多，多半是2世纪前半期的产物，到4世纪才编成定本。虽然《福音书》开始流行时的基督教与原始基督教相比，思想上已发生很大变化，已处在“爱人如己”的说教的笼罩之下，而且《福音书》在流行编订过程中不断经人篡改，但我们仍能在字里行间看到一些原始基督教时期保留下来的反映社会下层群众思想情绪的词句，如说救主耶稣“兴起了拯救的角”，要把被压迫者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新约·路加福音》第1章第69至74节，52至53节）。又对压迫者和剥削者表示憎恨！说“倚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新约·马可福音》第10章第24、25节；《新约·马太福音》第19章第23、24节；《新约·路加福音》第18章第24、25节）。甚至个别地方还可以听到过去犹太起义的战斗号角的尾声，《马太福音》假托耶稣的口气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

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第34节）由此看来，在某些早期的基督徒身上，往日的战斗热情还没有完全冷却。2世纪时，《福音书》和“使徒书信”的撰写人虽竭力宣传“顺从人的一切制度”，顺从“世上有权柄的人”，但还不能把受压迫剥削的信徒的思想感情抹煞殆尽。

原始基督教的信徒多半是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劳苦群众，他们不仅憎恶有钱的财主，也轻视私有财产。他们相信“天国近了”，“弥赛亚”救主即将来临，私有财产将失去意义。据《新约·使徒行传》等文献记载，各地原始基督教的信徒组成共同消费的宗教社团。在这些社团里，成员是平等的，“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新约·使徒行传》第2章第44、45节）；他们每天在一起共同用餐，一同进行祈祷，期待着基督救主的降临。为了保证基督徒社团的经济来源，《新约》圣经的说教里大力宣传财产公有和平均主义思想，说“要均平”，“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样就均平了”（《新约·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4节），因而鼓励信徒变卖家产，“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新约·马太福音》第19章第21节）。信徒们交给基督徒社团的钱财，主要用于赈济穷

人，也为游行传道的使徒^①们提供食宿方便。原始基督教不仅宣传基督教主即将降临，而且主张财产公有，在基督徒社团内部实行经济互助，这对一切受苦受难的人具有很大吸引力，促进基督教的迅速传播。

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原始基督教对“弥赛亚”救主和“千年王国”的狂热宣传，正反映了被压迫人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苦难深渊中挣扎的人民大众，在反抗斗争一次次地失败之后，仍希望借助上帝和“弥赛亚”救主的威力推翻罗马帝国的罪恶统治，为被无辜杀害的死难者复仇，并在人间建立基督教主为王的“千年王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愿望和要求是正义的和进步的。那么，我们能否说原始基督教具有革命性呢？

虽然原始基督教萌芽于社会下层群众中，恩格斯说它是“被压迫者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5页），具有“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的性质”，但并不认为基督教的兴起是一次革命运动，并不认为原始基督教具有革命的性质。恩格斯在称它是被压迫者的宗教的同时，曾明确指出基督教与现代工人运动的本质区别：“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

^① “使徒”是基督教产生时代的传教者。“使徒”原意为“奉差遣的使者”，主要指受耶稣“派遣”并“赋予”传教使命的门徒，除十二门徒外，保罗等人也有使徒之称。

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基督教给苦难群众指出的解放道路是“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里，在据说不久必将到来的‘千年王国’里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5—526页）。所以，基督教不引导被压迫群众去作变革现实的斗争，而寄希望于虚幻的来世。

尽管《启示录》中宣传的“千年王国”将建立在人间，不象后来的基督教所宣传的那样在天上，但如何将“千年王国”的美好理想变为现实呢？《启示录》预言罗马帝国的覆亡、在“世界末日”对罗马皇帝的审判以及“千年王国”的建立等全都靠上帝的大能，全都靠从天而降的“弥赛亚”救主的威力，而不是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去斗争。尽管在《启示录》里充满了对罗马帝国的复仇情绪，甚至在后来的《福音书》里也还能见到对剥削者的怨恨，然而这不过是受尽折磨的群众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表现得无可奈何，只有发发牢骚，表示对现实苦难的抗议而已。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尽管在2世纪初仍可听到“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的词句，但原始基督教自诞生之日起，从不组织人们起来斗争。这是原始基督教与犹太人中的狂热派（奋锐党）不同的地方。狂热派是以“弥赛亚”作为一面旗帜，主张用暴力斗争促使“天国”降临。他们所宣传的“弥赛亚”救主往往是现实的人，是领导他们进行起义斗争的领袖。原始基督教则不然，它除了发泄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外，没

有斗争行动，却要人们“悔改”、“认罪”，以求神的宽恕和恩赐，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神，消极坐等“弥赛亚”救主从天而降。这不会指引苦难人民走上斗争之路，只会用这种永远不能实现的幻觉使群众麻木下去。所以，基督教这种意识形态一开始就对统治阶级有利，后来它成为罗马帝国国教，蜕变为奴隶主阶级统治人民的政治工具，绝不是偶然的。

四 从原始基督教到 奴隶主的基督教

从公元1世纪到4世纪，基督教经历了一个十分深刻的演变过程——它由社会下层群众中自发产生的“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逐步蜕变为奴隶主阶级压迫人民的政治工具。它是怎样演变的呢？

首先，基督教从犹太教分离出来，向世界宗教的方向发展。

公元1世纪中期，原始基督教还是犹太教的一个新宗派，它先在犹太下层群众中秘密流传，故基督教最早的信徒是犹太基督徒。由于罗马帝国的许多城市都有犹太人与其他民族杂居，基督教产生不久也在地中海沿岸的非犹太人（《新约》中称为“外邦人”）中传播开来。在向外邦人传播的过程中，基督教逐渐抹去从犹太教带来的民族主义特色。

犹太教同当时流行于罗马帝国的各种旧有宗教一样是民

族宗教。犹太教信仰唯一的真神雅赫维（耶和华），宣称犹太人是上帝雅赫维的“特选子民”，比其他民族“优越”；犹太教宣传的“弥赛亚”是犹太民族的“复国救主”；犹太教徒遵守《旧约》中的古代律法，举行割礼^①，禁止与外邦人通婚等，使犹太人的民族和宗教严格保持自己的独特性。

基督教则不然。它虽是犹太民族争取独立解放高潮中产生的一个犹太教新宗派，但它适应当时时代的要求，切合罗马帝国统治下各民族居民的需要。尽管基督教的救世主信仰来自犹太教，但它冲破了犹太“复国救主”的狭隘民族主义界限，宣布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新约》圣经说：“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今译为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新约·歌罗西书》第3章第11节）这种打破民族界限和等级界限的救世主，正是各民族苦难群众所共同盼望的。此外，初期的基督教摆脱了那些旧有宗教的繁杂的宗教仪式，只重视信徒内心信仰是否虔诚，故不象一切旧有宗教那样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因此，基督教能在罗马帝国流行的各种宗教的生存竞争中获得最后胜利，成为“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4页）。

^① 割礼是犹太教对初生婴儿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用石刀割损阴茎包皮，作为神和人缔约的象征。《圣经》中说的“受割礼的”指的是犹太人。后来，伊斯兰教吸收了犹太教的割礼仪式。基督教只有科普特教会保留割礼。

但基督教要发展成为一个打破民族界限的世界宗教，必须冲破犹太人的民族偏见和传统习惯势力。它刚开始向外邦人传播时，便不得不同来自犹太基督徒内部的阻力作斗争。《使徒行传》说，使徒彼得向外邦人宣传“福音”，那些和彼得同来的犹太基督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①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新约·使徒行传》第10章第44至48节）。

因为基督教吸收信徒没有种族之分，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故在非犹太人中传播极迅速，外邦人基督徒的数量很快便超过犹太基督徒，著名的使徒保罗成了外邦人基督徒的代言人。犹太基督徒一般都谨守犹太教律法，而外邦人基督徒则不愿遵循犹太教律法，故以彼得为代表的犹太基督徒同以保罗为代表的外邦人基督徒时常发生争议。传说外邦人基督徒不愿按犹太习惯受割礼，在基督徒内部引起一场风波。经过两派的激烈争论，保罗派取得胜利，说外邦人基督徒“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新约·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9节，参见《使徒行传》第15章）。此后，基督徒可不必再遵循犹太人的传统习惯了。

除在基督徒内部存在保罗派和彼得派的斗争外，基督教

^① 施洗是给信徒举行洗礼。洗礼是基督教的人教仪式，施洗时，主持仪式的教士口诵经文，给受洗者额上洒水，也有将受洗者全身浸入水中的，叫浸礼。

与传统的犹太教之间还存在尖锐矛盾。虔诚的犹太教徒（如法利赛派）不仅谴责基督徒不遵从犹太教律法，而且他们矢口否认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弥赛亚救主（基督），这就彻底否定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所以，基督教这个犹太教的新宗派在诞生后不久便与传统的犹太教产生裂痕。此外，基督教自身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许多犹太教经典无法回答的新问题，故必须打破犹太教神学的框框，对一些问题另作解释；也需要根据对内对外斗争的需要，编纂独自的经典（《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等，最后汇编为《新约全书》），发展自己的教义和教会组织。同时，为了与犹太教徒相区别，开始自称基督徒，向自我意识的基督教转变。在一二世纪之交，基督教与犹太教徒逐步分离。到2世纪30年代发生新的犹太起义时，思想上已逐渐转向罗马统治者的基督教，终于同犹太教彻底决裂，分道扬镳了。

在与犹太教决裂的同时，基督教本身已在蜕变中。由于有钱有势的人们大量入教，基督教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原始基督教时代的基督徒大多是奴隶、游民无产者和其他穷人，他们对维持宗教社团不能作出多少经济贡献，相反地，还要靠社团补助过活。同时，基督教的最初阶段，没有统一的教会组织，而是宗派林立，互相纷争。各教派为了维持和发展壮大自己的组织，吸收富裕的人们入教就成为必要了。过去是憎恨有钱的财主，而今则要奉劝和欢迎富贵的人受洗入教。使徒保罗致书提摩太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

足的人……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又要嘱咐他们行善……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新约·提摩太书》第6章第17至19节）从1世纪后半期到2世纪初，富裕手工业主、商人、奴隶主贵族入教者日渐增多。他们利用自己优越的经济、政治地位，逐渐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控制各地教会。保罗派就是依靠富裕教徒的支持，发展和壮大自己的教派势力，从而取得优势地位的。自保罗派在基督教内部取得优势地位后，基督教的思想大变样。

基督教思想变化的第一个表现是：救世主的观念有很大改变；“千年王国”由地上搬到天上，从现世转入来世。

原始基督教本来是被压迫者宣传“弥赛亚”救主的群众运动，声称基督即将降临人间，建立基督为王的“千年王国”。这个“千年王国”不在天上，而将建立在现实世界中，因而信徒们每天在一起用膳和祈祷，一心等候基督救主的降临。然而岁月不断地流逝，救主的降临却杳无音信，人们对救世主的信仰开始动摇，出现了失望情绪。有人提出疑问：“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传道的使徒回答说：“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新约·彼得前书》第3章第4至9节）回答得多么巧妙呵！似乎不是人们等待救世主，而是救主基督在耐心等待人们悔改呢。基督教的说教者用这种娓娓动听的言语暂时稳定信徒的心。

随着外邦人（非犹太人）、富翁显贵和希腊化知识分子大量入教，基督教越来越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保罗派的神学思想就是把庸俗化的希腊哲学同犹太神学结合起来，并表现出同犹太教分离的倾向。他们否认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而将基督救主神秘化，不再强调在地上建立神的王国，只强调基督徒个人因信仰而得救。这种观点明显地体现于写作较晚的《约翰福音》中。《约翰福音》与前3部福音书显著不同，作者不提耶稣是犹太王族的后裔，仅说他是“逻各斯”（道）的化身，即所谓的“道成肉身^①”；否认他是地上神国的王，更否认地上的“千年王国”，说耶稣一再申明“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进而强调信徒“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唯有靠圣灵“重生”，才能进“上帝的国”，得到“永生”（《新约·约翰福音》第18章第36节；第3章第1至15节）。还说基督徒“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上帝“在天上”“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新约·希伯来书》第11章第13至16节）。这样一来，救世主耶稣基督被抽象化和神秘化了，“千年王国”则由地上搬到了天上。人的一生中，看不见基督建立的“千年王国”，只有在来世，那“不朽的”灵魂才能体验天堂之乐了。由此可见，这时的基督教与原始基督教有很大不同，

① “道成肉身”是基督教教义之一。基督教主要教义中有“三位一体”说，即上帝只有一个，但包含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圣子即耶稣，但他在降世前与圣父（上帝）同体，称为“道”（即“逻各斯”）。后来这个“道”以肉身形式降世为人，即耶稣。这就是所谓的“道成肉身”，

它已演变为一种只信来世，只信仰受难基督的神秘宗教了。

其次，基督教的思想变化更突出的表现是：原始基督教时代那种阶级憎恨和复仇情绪已逐渐淡薄和消退，教训被压迫者要安分守己，忍耐顺从。

《新约》圣经不仅教训奴隶要“加意服事”自己的主人，而且告诫劳动人民要服从整个统治制度，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新约·彼得前书》第2章第13至14节）使徒保罗更散布君权神授论，借上帝之命威吓群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新约·罗马书》第13章第1至7节）为使劳动人民甘受剥削压迫，基督教更提倡培养忍耐精神，诱导人们树立卑躬屈节的思想。《圣经》中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39节、40节）《圣经》更进一步劝告被压迫者要“爱人如己”，非但不能憎恨压迫者，还应“爱你们的仇敌”，为压迫者“祷告”（《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44节）。同时，要求人们学习耶稣的榜样，因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他的忍耐精神“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新约·彼得前书》第2章第21至23节）。于是，“象主耶稣那样甘愿忍受苦难”，就成了基督教的中心思想。

基督教刚诞生时，《启示录》所描绘的基督教救主是一位坚决为被压迫者伸冤复仇，对敌人严惩不贷的执法明君。但不到一个世纪，基督教塑造的救主耶稣的形象就变成了一个对统治者卑微恭顺、心甘情愿忍受一切苦难的奴才。1世纪中期，原始基督教咒骂罗马皇帝，要求推翻罗马帝国的罪恶统治，盼望“世界末日”早日到来。但100多年后，基督教神学家德图良却上书罗马皇帝：“我们为皇上、为帝国祷告……祈求世界末日延期到来……我们盼望帝国国运天长日久！”（《护教篇》第29至33节）

大量事实说明，2—3世纪时的基督教与原始基督教相比，思想上的差距已何止十万八千里！这时的基督教虽尚未成为帝国国教，甚至基督徒还不时受罗马政府迫害，但它的教义已开始蜕变为奴隶主阶级的精神武器，自觉地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统治效劳了。

在基督教发生思想蜕变的同时，它在组织上也发生变化，由零散的早期基督徒社团发展成有钱有势的社会上层分子所控制的基督教会。

早期的基督教没有严密的、统一的组织，也没有教阶制度。大体说来，早期基督徒社团的组织机构是民主平等的，使徒在各地社团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游历各地传道，在那些没有建立基督徒社团的地方建立组织，又负责各地社团之

间的联系。起初，使徒不仅传道，也掌管社团的经济生活。由于基督教迅速传播，信徒不断增加，社团事务日益繁杂，各地社团便从当地信徒中选举一批有能力的人来管理社团的经济事务，这些人称为“长老”和“执事”，在诸“执事”之上，又设“监督”一职。后来各地教会的主教就是从“监督”演变而来。

随着富翁显贵们大量入教和基督徒社团资产日益增多，掌握经济大权的“监督”、“执事”的地位也不断提高，而且这些职务被有钱有势的基督徒所操纵。2世纪初，各地教会组织中出现了“监督团”（亦称长老委员会），主教居其首。后来主教的权力日益增大，各地教会的经济、政治、组织和思想方面的领导权都由主教独揽。2世纪中叶，主教制开始确立。以主教为首的教会上层集团——主教、长老和会吏组成的“圣职界”（神职人员），从一般的信徒中分化出来，形成教会内部的统治阶级。一些大城市的教会主教不仅在本地区教会中大权独揽，而且还伸张势力到附近中小城市的教会和乡村教会中去。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克和耶路撒冷等地教会就是这样逐渐驾临其它地方教会之上的。同时“宗教会议”也出现了，由各地教会派出的代表（往往都是主教）组成。宗教会议的召开说明基督教的组织开始出现统一的趋向。在宗教会议上，主教们迎合罗马奴隶主阶级的政治需要，编审经典，制订教规和教条，与之违背者就被宣布为“异端”，主教们有权革除其教籍。

当社会上层分子控制的教会日益向罗马帝国政府靠拢

时，社会下层群众往往坚持原始基督教的传统观点，与教会上层相抗衡。2世纪后半期，在小亚细亚的弗吕吉亚一带出现了孟他努派。他们不承认主教们的权威，反对教会上层集团卖身投靠罗马政府；他们高举《启示录》中的“弥赛亚”旗帜，宣传“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千年王国”将以弗吕吉亚为中心建立起来。孟他努派的思想在小亚细亚农民群众中深受欢迎，但基督教会却敌视他们，宣布孟他努派为“异端”，开除他们的教籍。与此同时，罗马政府对信仰孟他努学说的农民进行残酷镇压。历史事实说明，虽然这时的基督教还不是帝国国教，但教会已开始同罗马政府站在一边镇压人民了。到这时，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统治工具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只等待罗马皇帝的垂青了。公元4世纪上半期，罗马政府对基督教的政策有了重大的改变。

从公元1世纪后半期至4世纪的最初几年，由于帝国政府对新兴的基督教持怀疑态度，曾对基督徒进行过许多次迫害，直到戴克里先皇帝（284—305年在位）执政时，还连下4道圣旨，把那些在军队中及宫廷中任职的基督徒尽行革职；教堂被毁，宗教集会被禁止，经书被焚烧，许多主教、牧师被处死。这是罗马史上对基督徒规模最大的一次迫害。但是政府的残酷迫害不能制止基督教的传播，甚至连戴克里先的妻子也变成了基督徒。罗马政府鉴于迫害政策徒劳无功，同时统治阶级中有不少人逐渐认识到基督教对帝国的统治有益而无害，故改弦更张，开始对基督教实行控制和利用的政策。

公元311年，罗马皇帝伽列里乌下令停止迫害基督教。伽列里乌死后，在罗马统治阶级中展开了争夺王位的斗争。罗马将军君士坦丁(约280—337年)为了加强实力、战胜竞争对手，开始利用基督教，从广大的基督徒中寻求支持者。据传说，在312年的一个夜里，君士坦丁和他的士兵们一同看见一个“奇迹”：天空中出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十字架，上面书写着几个大字——“靠此得胜”；在同一夜里，君士坦丁又梦见耶稣基督嘱咐他以十字架作他的军旗的旗徽。于是，“靠上帝的帮助”，他旗开得胜，一举打败他的竞争对手，从而登上罗马皇帝的宝座。这种杜撰出来的神话般的故事是荒唐可笑的，但它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君士坦丁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是得到基督教会这支巨大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帮助的。



君士坦丁大帝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皇帝颁布著名的《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归还戴克里先迫害时期没收的教会财产。接着，由国家捐赠给教会大片土地，并由国家资助在各主要城市修建大教堂，皇帝还把罗马的拉特兰宫赠给罗马主教作官邸。此外，政府给予教会种种特权，豁免教会神职人员的捐税和劳役，确认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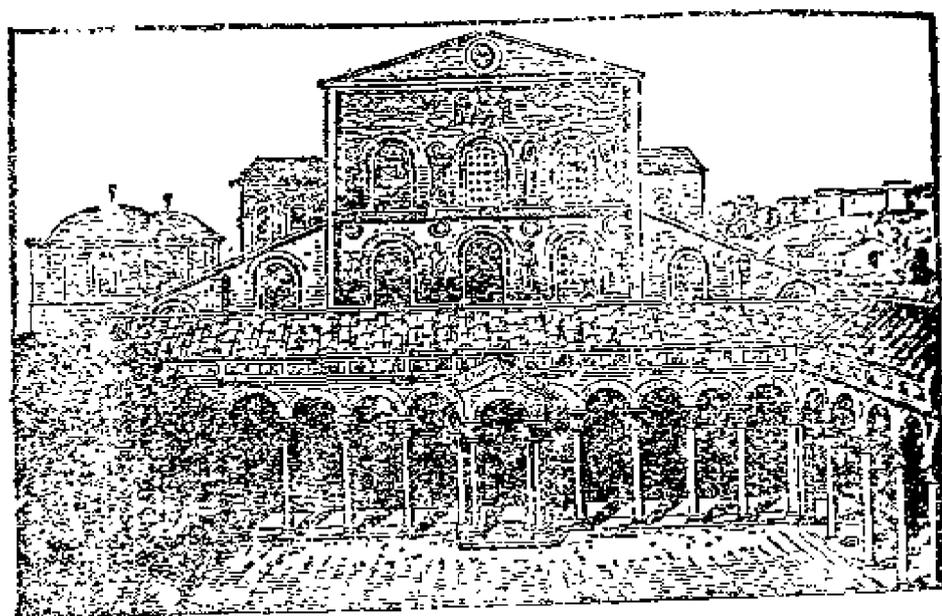
会享有接受私人遗产的权利等。由于君士坦丁的倡导和支持，社会各阶层受洗入教者倍增，基督教得到更大的发展。

君士坦丁认为，要使基督教成为自己手中的驯服工具，则应帮助教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完全统一起来，在教会内部不应容许与官方教会相对立的宗派存在。他本人虽然不是基督徒（他临死前才受洗入教），但亲自召开宗教会议，积极参与基督教内部的斗争，帮助教会镇压所谓的“异端”派。

公元二三世纪以来，基督教会中已形成“三位一体”论的教义学说。称上帝（天主）是唯一的神，但包含圣父、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三位合为一体。到4世纪初，基督教内部出现利比亚主教阿利乌为首的一个新教派，对“三位一体”论提出异议，他们强调耶稣基督的人性，说耶稣既是天父上帝的儿子，是神创造的，其地位必在神之下，更不能与神同为一体，故否定了耶稣的神性。同时，他们反对教会占有大量土地财产。阿利乌派的观点在帝国东部各省流行，引起教会内部的纷争。公元325年，君士坦丁皇帝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召开全帝国的主教会议，会议上制定了一个统一的信条，其中包括“三位一体”论的观点。皇帝强迫每个与会的主教签字，阿利乌和其他几名主教拒绝签字就被驱逐出境；阿利乌派拒不接受尼西亚信条而被宣布为“异端”，开除了教籍。通过尼西亚会议，基督教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被罗马皇帝全面控制。

君士坦丁以后的历代皇帝，继续实行控制和利用基督教的政策，皇帝放弃了罗马旧有宗教的“最高祭司”职务。公

元392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发布命令，废除一切旧有宗教，异教神庙被勒令关闭，异教的一切宗教活动被禁止，只有基督教才是唯一合法的宗教，于是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从此，基督教的正统教会成为官方教会，与垂死的奴隶主阶级政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教会的组织也相应地按罗马行省区域划分为若干大教区，各大教区的中心是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克、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等大城市。各大教区的大主教分别统辖本教区各地方教会。



罗马旧圣彼得教堂

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帝国的每个臣民都必须是基督徒，基督教思想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以罗马帝国末期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必然会反映到基督教里来。阿利乌派与官方教会的矛盾不单纯是教义之争，实质上是阿利乌派反对正统教会和帝国政权的勾结。他

们强调耶稣的人性，贬低其神性，也就是否定官方教会的神圣性。阿利乌派虽遭到帝国政府和官方教会的敌视和迫害，但却受到社会下层群众的欢迎，尼西亚会议后仍在罗马帝国民间流行，并在帝国的北方敌人——日耳曼民族中广泛传播。

与阿利乌派同时遭受迫害的还有流行北非的多那图派。他们也反对教会与帝国政府结合，主张恢复原始基督教的朴素传统，要求社会平等和实现财产公有。4世纪，北非出现的阿哥尼斯特运动就是多那图派的继续发展。

阿哥尼斯特运动是罗马帝国末期以宗教斗争形式表现出来的农民、奴隶和隶农的革命运动，其斗争锋芒指向大奴隶主、罗马政府官员和官方基督教会。起义者自称“阿哥尼斯特”，意为“真正信仰的战士”，他们把同帝国政府勾结的教会视为耶稣基督的叛徒，故曾杀死一些臭名远扬的主教。起义运动的中心在努米底亚一带，起义者们拿起武器，成群结队地从一地打到另一地，捣毁奴隶主的庄园，焚烧债券，解放奴隶。有的地方，起义者见到老爷坐在马车上，奴隶在车后随行，便让奴隶坐上马车，命令老爷下车随车奔跑。他们说这是恢复地上的平等。起义者还痛打反抗的奴隶主，将他们逐出家门。神学家奥古斯丁曾写道：非洲的“乡间居民激烈反对自己的主人，而逃亡的奴隶不只离开主人，并且威胁他们——不只威胁他们，而且毁灭他们。”阿哥尼斯特运动对没落的罗马奴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曾使罗马政府在北非的统治一度陷入瘫痪状态，但最后这一运动受到教会

和罗马军队的残酷镇压。

罗马帝国末期，官方的基督教会 对“异端”派的迫害和镇压，实质上就是垂死的奴隶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阶级压迫。历史表明，四五世纪时的基督教，不仅是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而且基督教的正统教会业已成为罗马奴隶制帝国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受苦受难的人们从宗教中寻求解放的期望落空了。基督教诞生时，人们曾寄希望于基督救主，但过了几百年，救主非但没有使劳苦大众获得真正的解放，到头来，却给他们戴上新枷锁——基督教会的压迫。

五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东、西方教会矛盾的由来及 罗马教皇的起源

公元1054年，罗马教皇利奥九世派红衣主教洪贝尔到东罗马（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宣布对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迈可·色鲁拉里乌判处绝罚^①。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提请拜占廷皇帝召开宗教会议，谴责教皇的使节“象一头野猪来到圣城诬蔑真理”，宣布开除罗马教皇的教籍。这样，基督教会的东、西两派正式决裂，形成两大独立

^① “绝罚”是罗马教皇对教徒的一种处罚，即开除教籍。“绝罚”的意思是教会与受罚者断绝一切关系。

的教会。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为首脑（“牧首”）的东方教会以正统自居，称为“正教”（后来人们习惯称它为“东正教”），与罗马教皇为首脑的西方教会（“罗马公教”或天主教）相对峙。双方互相对骂，势不两立，断绝往来。这就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东、西教会大分裂。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方、西方教会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两大教会决裂以前五六百年，即罗马帝国时期，便已出现裂痕。基督教诞生后几个世纪，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教会逐渐分化为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和拉丁语地区的西派。由于罗马城一向是帝国首都，罗马教会拥有较大的权势。罗马主教不断向外伸张势力，逐渐控制帝国西部（拉丁语区）各地的教会。在这个基础上，到中世纪，罗马主教才发展成西方教会（天主教会）的首脑——罗马教皇。

“教皇”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PaPa（英文写作PoPe），其原意为“父亲”。这本来是早期教会对一般高级教士的尊称，起初可以称呼任何主教。后来，随教会内部教阶制的发展，这一名词逐渐只限于称呼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克、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等五大城市的主教。到中世纪，P.P.这一称谓最后被罗马主教所垄断，汉译为“教皇”。

在罗马主教不断发展权势的同时，君士坦丁堡主教也同样发展自己的权势。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首都东迁至拜占廷，改名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主教凭借新首都的优越地位，也伸张自己的势力，逐渐控制帝国东部（希腊语区）各地教会。在东方的四大主教区（君士坦丁堡、亚历

山六里亚、安提阿克和耶路撒冷)中,君士坦丁堡主教取得了首席地位。

从罗马帝国末期起,罗马主教和君士坦丁堡主教在基督教会内一直进行着争夺权势的激烈斗争,并且这种斗争还同世俗君王们争夺政权的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公元337年,君士坦丁皇帝死去,皇族内部为争夺政权发生内讧。经过骨肉相残的战争后,康士坦斯统治帝国西部,康士坦蒂乌统治帝国东部。这两个奴隶主统治集团都利用基督教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故于342年(或343年),双方协商在撒狄卡共同召开宗教会议。开会时,罗马教会恢复了被东方教会革职的主教的职务,并派他们去开会,因而东方教会的主教们拒绝出席会议。会上,西方主教趁机把一批东方主教革职,并树立罗马主教的首席权威。康士坦蒂乌和康士坦斯对教会的东、西两派则各支持一方。从此,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的矛盾有增无已。

撒狄卡会议曾决定,有关主教的被控案件应由罗马主教审理。虽然这个法规只能通行于帝国西部的拉丁教会中,但已提高了罗马主教的权威地位。东方教会则针锋相对,于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君士坦丁堡是新首都,其主教地位仅次于罗马主教。然而,罗马主教拒不接受这项决议。正当两派教会明争暗斗的时候,罗马帝国分裂了。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东罗马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西罗马帝国定都罗马。451年在小亚细亚召开的查尔西顿宗教会议再次确认,君士坦丁堡和

罗马同为帝国的都城，两个城市的主教地位应当平等。但罗马主教不仅拒绝接受这一决议，还提出“彼得优越”论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宣称：《新约·马太福音》里记载着耶稣基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了他的第一号门徒彼得，并说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彼得”一词原意为磐石），而罗马教会正是使徒彼得和保罗建立起来的，故罗马主教是圣彼得的合法继承人，在基督教会中应拥有特殊地位^①。虽然东方教会拒不承认罗马主教的这种“优越论”，但西欧当时的政治形势却非常有利于罗马主教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自从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个帝国以后，东罗马帝国政治上较稳定，西罗马帝国则急剧衰落，名存实亡。由于各地爆发起义运动和日耳曼人的进攻，进入5世纪以后，西罗马帝国在各行省的统治已土崩瓦解，只有一些城镇和军事据点仍在帝国政府手中。帝国心脏地区——意大利也不平静，西罗马皇帝惶惶不可终日，不敢留住罗马，长期隐居沼泽环绕的米兰或腊万纳，靠雇佣兵的保护苟且偷安。西罗马帝国政府既然陷入瘫痪状态，罗马主教就趁机加强自己的权势。445年，罗马主教利奥一世怂恿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三世发布诏令，授予罗马主教更大的特权：罗马主教的决定，应成为全教会的法规；任何主教如被罗马主教传召，该省总督必

^① 历代罗马教皇都宣扬“彼得优越论”，说自己是圣彼得的合法继承人，故自称是“基督在世的代表”，在信仰上和伦理上是“永无谬误”的，对全世界的天主教会拥有“最高管理权”。

须督促该主教前往，不得有误。这一诏令为罗马主教攫取教会的最高领导权和自封为教会首脑提供了法律依据。事实上，在罗马帝国末期，罗马主教已经充当西罗马帝国行政代理人的角色。他不仅负责城市修建，还维持意大利奴隶制统治秩序，给雇佣兵发薪饷，组织对外族入侵的抵御和进行媾和等。452年，被人们称为“上帝之鞭”的凶猛残暴的匈奴领袖阿提拉率军队攻入意大利，焚掠阿挨利亚、维罗纳、米兰等城市，进逼罗马，罗马主教利奥一世率使团前往求和，说服匈奴军撤退回匈牙利，罗马这座“永恒之城”得以保存。这种情形大大地提高了罗马主教的威望。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亡更加速“教皇”权位的形成过程。从476年起至535年东罗马（拜占廷）帝国攻占意大利时止，罗马主教完全成了罗马地区的保护者。后来，虽然意大利名义上归拜占廷统治，但6世纪中叶以后，拜占廷已无力控制意大利，其统治区只限于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而罗马地区的实际统治权则牢牢掌握在罗马主教手里。6世纪末格列高里一世任职时，他既是罗马主教，又是罗马的行政首脑、城防司令和法官，控制着监狱、法庭，还负责铸造货币和管理市场等。同时，罗马教会在罗马和别的地区拥有许多领地；罗马主教又以传教和建立修道院的方式扩张势力，其管辖范围扩大到意大利中部、西西里、撒丁尼亚和科西嘉，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足迹甚至出现在遥远的不列颠群岛。在意大利或其它地区，没有一个地方主教的权力能与罗

马相比，这时的罗马主教已稳当地坐上西方教会的第一把交椅，居于首位。虽然直到11世纪当格列高里七世开始垄断“PaPa”（教皇）这一称号时，罗马教皇的权位才算最后确立，但在6世纪末格列高里一世任罗马主教时，教皇的雏形已经形成了。

第二章

中世纪的封建教会和 反教会的“异端”运动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敲响了西欧奴隶社会的丧钟，揭开了欧洲封建社会的序幕，世界历史进入中古时期（中世纪）。

上古时期，基督教主要流行于罗马帝国，那时它是奴隶主阶级的宗教，为没落的罗马奴隶制帝国政府效劳。到中古时期，基督教已传遍欧洲各个角落，并由奴隶主阶级的宗教转变为封建主阶级的宗教。

在欧洲封建社会里，基督教是垄断人们信仰，支配人们思想的唯一宗教。除了人数极少的犹太人外，人人都必须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受着教会的神权统治。每个居民既是本国政府的属民，也是教会的属民；既受国家权力（世俗政权）的统治，也受教会权力（教权）的统治。国家政权和教权是欧洲封建主阶级的两支臂膀。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会是支撑欧洲封建制度的社会支柱。

首先，教会垄断文化教育，一切文化知识都必须服从于

神学。基督教的教义和教条成为封建主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第二，天主教会占有西欧各国土地的1/3以上，东方的希腊教会也几乎占有拜占廷帝国土地的1/3，教会本身便是最大的封建领主，教会上层集团是穿着道袍的封建贵族。他们同世俗贵族相互勾结，共同统治和奴役劳动人民。

由于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历史发展状况不同，东方基督教会（拜占廷教会，即东正教）与西方基督教会（罗马天主教）的发展各有自己的特点。

自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以来，东罗马帝国政治上较西罗马帝国稳定，它的寿命比后者长得多。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继续存在，叫做拜占廷帝国，它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5世纪，即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灭为止。因为东罗马帝国一直存在一个统一的实行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东方教会就长期处于皇帝控制之下。宗教会议虽被认为是东方教会的最高机关，但只有东罗马皇帝才有权召集，也只有皇帝才有权选定会议的代表和批准会议通过的决议，所以东方教会长期处于依附帝国政府的地位。

在西欧，情况有所不同。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前，帝国政府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处于分崩离析状态。西方基督教会（罗马天主教）乘机扩张势力，罗马主教事实上充当了西罗马帝国行政代理人的角色。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许多日耳曼人的封建王国。这些国家之间矛盾重重，互相角逐。中世纪前期，西欧各国内部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王权微弱，罗马主教更有机可乘，进一步发展自己

的权势，不断扩大天主教会的势力范围，罗马主教本身则上升为西方教会的最高首脑——罗马教皇。8世纪时，教皇得到法兰克王国统治者矮子丕平的帮助，在意大利中部地区建立起一个教皇国。于是教皇不仅是世界天主教会的首脑，而且是一个拥有世俗统治权力的封建君主。

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罗马天主教按照封建等级制的原则，形成了自己的教阶制度和组织系统。教皇居于天主教会的顶端，其下设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长，大主教和主教各有自己所辖的教区；再下为基层教堂，由神甫管理。此外，天主教还有各种跨越国界的修士团体，即“修会”，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后来的“耶稣会”等。总之，天主教教会组织密如蛛网，遍布西欧各国。教皇实行中央集权制，西欧各国的大主教和主教都必须听命于教皇。教皇的贪婪的手，通过天主教会组织伸向西欧各国，搜刮各国的财富，干涉各国的内政。在中世纪中期天主教会的鼎盛时代，教皇往往成为凌驾于西欧各国君主之上的太上皇，罗马教廷成为西欧“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

在西欧封建社会里，教会封建主与西欧各国的世俗封建主相依为命，互相利用，互相勾结，共同统治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双方又为争夺政治经济权益，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天主教会与世俗政权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这是西欧中古历史的一大特点。现在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天主教会与世俗封建统治者是怎样勾结起来的。

一 天主教会与西欧世俗 封建主相互勾结

当罗马帝国没落时，帝国北方境外的日耳曼各部族象滔滔的海潮不断涌入帝国境内。西罗马帝国覆亡后，日耳曼人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许多封建国家——东哥特王国、西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和法兰克王国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兰克王国。

日耳曼人的经济和文化远比罗马帝国落后。恩格斯说：“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一进入中世纪，基督教会便适应新兴剥削阶级——封建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发展自己的教义学说，论证封建制度的合理性，要求劳动群众弃绝物质享受，克制情欲，忍受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服从封建主的统治。教会的宣传很快得到日耳曼封建贵族的赏识，法兰克王国就是西欧第一个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

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原居住在莱茵河下游地区。5世纪后期，他们占领原罗马帝国高卢地区的东北部。486年，法兰克人的一个部落酋长克洛维联合法兰克人其他各部落，击败西罗马帝国残余军队，夺得高卢大片土地，建立

起法兰克王国，开始了墨洛温王朝（481—751年）的统治。法兰克贵族在建立封建国家过程中，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和帮助，而国家则给教会种种特权，不断提高教会的地位。法兰克王国依靠教会的支持而巩固，教会则依附于国家政权而发展。

早在克洛维征服高卢和创建法兰克王国的时候，便采取一条极重要的政策：同罗马天主教会建立良好关系，同时皈依天主教。496年圣诞节那天，克洛维率领他的3000名亲兵在教堂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在他的带动下，法兰克人纷纷信奉了罗马天主教。

皈依罗马天主教，对法兰克王国的政治与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除法兰克人外，大多数日耳曼部族早已信奉基督教的异端教派阿利乌教。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和伦巴德人都是阿利乌派的信徒。他们占领西罗马帝国领土并建立起封建王国后，都敌视当地原有居民信奉的天主教，占夺教会的土地财产，因而遭到天主教会的抵制和反对。由于这些日耳曼人国家与天主教会处于敌对状态，故他们的政权都不能长久维持。然而克洛维在高卢实行的政策则产生不同的效果。法兰克人征服者皈依天主教，不仅减少他们统治高卢的阻力，而且还能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和帮助。当克洛维带头受洗入教时，罗马教皇阿拿斯塔斯二世便写信给他，表示热忱欢迎，并说：“愿您象一根铁柱支持教会，教会也会使您战胜一切敌人。”教会支持法兰克王国加强国内的统治，还支持它对外扩张，去战胜那些信奉异教（阿利乌派）

的日耳曼人国家。

在天主教会支持下，克洛维不断向外扩张，其疆土扩大到卢瓦尔河以南的高卢地区，把西哥特人的势力完全排挤到西班牙境内。克洛维死后，其后继者继续进行扩张战争，到6世纪中期，先后征服勃根第、图林根、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等地区，法兰克王国遂变成当时西欧最强大的封建国家。

法兰克王国统治者懂得依靠教会维持政权、巩固政权的作用，故大力扶持教会，提高教会的地位，给予教会种种特权。规定教堂神圣不可侵犯，任何自由民到教堂避难，政府机关不得派人进教堂搜捕；教会神职人员犯法时，只能由主教按教会法规审理，国家法庭无权处置。克洛维在世时曾下令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便宜称：宗教会议制定的法规同样具有法律的效力。到7世纪初，国王制订法律时，还吸收全国的主教参加。同时，主教享有巨大的政治权力。在法兰克王国，主教不但有权修改法官的判决，而且有权处分渎职的法官。恩格斯在论述教会在中世纪欧洲的统治地位时指出：“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在经济上，教会也享有特权。各地教会拥有大量地产，主教和修道院长都是大封建主。法律规定：教会神职人员的财产免税，本人免服劳役。

另一方面，国王既要利用教会，就力图控制教会。法兰克王国的教会和修道院全由国王管辖，各教区主教均由国王委派。新主教就职时，要对国王举行臣服仪式并宣誓效忠。教

会的高级神职人员既是国王任命的，他们又广泛参与国家的政治和法律事务，教会事实上成为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大主教和主教们事实上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可见在墨洛温王朝时期，天主教会已与法兰克封建国家政权结合起来。到加洛林王朝时，二者更紧紧地勾结在一起。

8世纪中期，墨洛温王朝的国王虚有其名，国家的最高权力实际上控制在宫相（宫廷总管）矮子丕平手里。矮子丕平朝思暮想推翻墨洛温王朝，由他登上国王的宝座。为使自己的篡位活动合法化，丕平需要向天主教会及其首脑罗马教皇寻求支持。另一方面，罗马教皇也急需法兰克王国的帮助。751年，位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德王国侵占了属于拜占廷帝国管辖的腊万纳总督区（在罗马东北方），直接威胁到罗马教皇的安全，所以教皇希望借助矮子丕平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于是双方情投意合，勾结起来，结成亲密的伙伴。

矮子丕平想当国王心切，751年派使节去罗马试探教皇的态度。教皇心领神会，按丕平意愿作了明确回答，说：“由握有实权的人来当国王比有名无实的人当国王强得多。”既然得到教皇的赞同，矮子丕平立即采取行动，于751年11月在国内召开法兰克贵族会议。会议利用教皇的声明，废黜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将他幽禁于修道院中，墨洛温王朝就这样被推翻了，矮子丕平则在贵族们的簇拥下登基称王，建立起法兰克王国史上的加洛林王朝。不久，教皇授命美因兹教区大主教卜尼法斯为丕平举行特别的涂油仪式，表明丕平是受“上帝的拣选”，“蒙上帝之恩”而当国王的，使丕平的篡

权活动合法化，给他的政权涂上一层神圣的油彩。

矮子丕平是在教皇的赞助下登极的，对教皇当然是感恩戴德！为了报答教皇，他应教皇斯德望二世之请，两次（754年及756年）出兵意大利，战胜伦巴德王国，迫使伦巴德王交出意大利中部的彭达波里斯（即“五城区”）和腊万纳总督区。丕平把这一大片土地赠给教皇，教会史上称为“丕平献土”。正由于矮子丕平的帮助，罗马教皇在意大利中部地区得以建立起一个教皇国。这个教皇国前后共维持了1100多年（从756年直到1870年）。教皇国是个世俗政权，教皇国诞生后，罗马教皇不仅是世界天主教會的领袖，而且成了教皇国这个封建王国的世俗君主。

矮子丕平死后，他的儿子查理登基称帝，教會和世俗封建统治者的亲密关系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查理执政时期（768—814年）是加洛林王朝的极盛时代。查理的大半生是在50多次侵略扩张战争中度过的。他消灭了伦巴德王国，将意大利北部并入法兰克王国的领域；他攻占西班牙部分土地和兼併多瑙河上游的巴伐利亚，又通过前后共30年（772—802年）的战争，征服居住在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萨克森人，把西欧大部分土地纳入自己的版图，形成历史上著名的查理曼帝国（加洛林帝国）。

查理在侵略扩张和巩固政权的进程中，除使用血腥的暴力手段外，还特别注意利用基督教这一政治工具。为了使被征服者驯服，凡新征服的地区的居民尚未信奉天主教者，一律强迫入教，拒绝受洗者判处死刑；不按教會规定在大斋期

禁食或在星期五吃肉食的也要处死^①。8世纪80年代，查理在征讨萨克森人时，曾颁布《萨克森敕令》，规定：“今后如有任何萨克森人隐藏在众人之中，不受洗礼，轻视洗礼，愿继续信奉异教者，处死刑”（第8条）；“凡小孩在生下一年之内，必须受洗……凡在小孩生下一年以内，不将小孩受洗……贵族罚款120索里达，自由人60索里达，半自由人30索里达。钱归国库。”（第19条）《敕令》还强制萨克森居民向教会缴纳什一税，说：“朕命令每人将自己的财产和劳动的十分之一捐给教会和教士。”（第17条）查理除在萨克森各地修筑要塞派军队镇守外，还大肆兴建教堂和修道院，训练大批萨克森人当教士，以“驯化”当地居民。

在加洛林王朝的政治生活中，高级教士成为查理大帝的得力助手。查理常任命主教或修道院长担任外交使节或巡阅使，在打仗时有的主教被任命为司令官。五月校场是查理主持的封建主代表会议，在会上，主教们与世俗贵族分列两边，两边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可见教会封建主和世俗封建主是查理大帝统治人民的左右手。

查理同矮子丕平一样，除利用本国教会外，还与远在意大利的罗马教皇建立良好关系，结成联盟。罗马教皇阿德里安一世（772—795年）曾应查理的请求，帮助他清除政治

^① 传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天是星期五，为纪念耶稣受难，教会规定星期五吃素。教会又规定复活节前40天为“大斋期”，在大斋期中要守“大斋”和“小斋”，小斋日不食肉，大斋日除一餐饱食外，其余两餐必须减食。

上的竞争对手，宣布开除拜占廷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六世的教籍。另一方面，这时的教皇国刚建立不久，羽毛未丰，需时时仰求法兰克王国政府的帮助。795年，新教皇利奥三世通过不正当途径登上教皇宝座，许多大贵族群起而攻之。教皇陷入困境，不得不向查理表示忠诚，以换取查理的支持。教皇在罗马的拉特兰宫教堂安放了一幅镶嵌的彩色图画，描绘神圣的使徒彼得把教士的圣带赠给教皇，把“罗马帝国”的旗帜送给查理，祷文里写道：“圣彼得把生命赐给教皇利奥，把胜利赠与国王查理！”另一方面，查理也作出友好的姿态，表示愿意合作。796年查理写信给教皇利奥三世说：我“愿与您建立牢不可破的信仰与仁爱的团结契合……我的天职是用武力保卫教会，使它不受异教徒的攻击蹂躏，在教会内部确保教会的纯正信仰。而神圣的教父（指教皇——引者），您的职责则是用祈祷支持我的武力。”封建政权与教会神权的密切配合，这封信把它一语道破了。



《神权与世俗政权》教皇
与帝国皇帝接受圣物

在8世纪末，教皇与国王确实是相依为命的。799年，罗马教皇利奥三世被反对派贵族逮捕监禁。不久，他逃出罗马，向查理求救。800年12月，查理亲自带军队把他送回罗马，让

他重新登上教皇宝座。为了报答查理的救命之恩，利奥三世一复位便以上帝之名为查理加冕。当查理跪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作圣诞节弥撒时，教皇将一顶金冠戴在他的头上，尊称他为“奥古斯都”和“伟大的带来和平的罗马人的皇帝”。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300多年，教皇称查理为“罗马人的皇帝”，恭维他是世界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古罗马皇帝的合法继承人。于是人们开始称查理为“查理曼”（Charlemagne），意为“查理大帝”，他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就叫做查理曼帝国。

可是这个庞大的帝国寿命不长，查理大帝死后不久，帝国迅速解体。查理的子孙争权夺位，进行内战。843年，斗争的三方在凡尔登签订条约，帝国被分割为三部分：莱茵河以东地区归日耳曼路易，称东法兰克王国；些耳德河和马斯河以西地区归秃头查理，称西法兰克王国；处于东、西法兰克王国之间直到意大利北部的地区划归罗退耳，并由他承袭皇帝称号。这就是后来德意志、法兰西和意大利三个国家的雏形。

查理曼帝国瓦解后，德意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在西欧政治舞台上曾一度扮演重要角色。德意志帝国由东法兰克王国发展而来。919年，德意志政权落入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919—936年在位）之手，他建立起德国史上的萨克森王朝。亨利一世的儿子鄂图一世（即鄂图大帝，936—973年在位）是该王朝最著名的统治者，他继承亨利一世的政策，同教会建立密切的关系，把教会作为支撑封建王权的社会支柱。鄂图一世授予教会更多的特权，如赐给教会大片领地，并重申

查理曼以来历代帝王的惯例，让主教在教会领地上享有独立的行政权和司法权，进而对周围地区也享有某些统治权（包括司法权）；此外，主教和修道院长还享有在一些城市的集市贸易中征收捐税的权利。德意志国王给予教会的这些“特恩权”，历史上称为“鄂图特权”。

在这个时期，德意志主教是由德意志皇帝任命和由皇帝管辖的。教会封建主必须对皇帝宣誓效忠，有为皇帝服军役的义务，主教和修道院长担任军官，带兵打仗是常事。955年，奥格斯堡主教在对匈牙利人的战争中曾赢得猛将的盛名。

鄂图一世利用教会封建主的支持，对内压抑诸侯的分离倾向，加强皇权，对外则大肆侵略扩张，而天主教则随着德意志势力的扩张传播到中欧和西北欧各地。但鄂图一世的侵略矛头主要是指向富庶而又四分五裂的意大利。951年鄂图一世率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南下，直接干预意大利北部封建主的争权斗争。当时伦巴德和维罗那等地区的大封建主为争夺徒有虚名的意大利王冠而混战不已。鄂图一世占领伦巴德后，接受了“意大利王”的称号。可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继续南下，力求取得对罗马教皇的支配权，从而巩固他对德意志教会的控制。955年，一部分意大利贵族拥立一个纨绔子弟当教皇，即约翰十二世（955—964年在位），但他遭到许多贵族的强烈反对。约翰十二世无力对付，961年吁请鄂图一世援助。鄂图一世趁机率军队进入罗马，压服反对教皇的贵族，巩固了教皇的地位。为酬谢皇帝，962年2月，教皇在圣彼得大教堂为德意志皇帝鄂图一世加冕，称之为“罗马帝国皇

帝”。到1155年，德皇腓特烈一世加冕时，在“罗马帝国”前面又加上“神圣”二字。从此，德意志帝国又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直到1806年被拿破仑推翻为止。

上述的大量历史事实说明，在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天主教会就同西欧国家政权互相利用，紧密勾结，沆瀣一气了。

二 封建制度的辩护士 和精神警察

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8页）在整个中世纪，天主教会充分发挥了牧师的职能（有时还兼有刽子手的职能），起着封建主阶级的精神警察的作用。

马克思指出：基督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8页）一进入中古时期，天主教会便适应新兴剥削阶级——封建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发展自己的教义理论，使它成为维护封建制度的精神武器，而僧侣们便成为“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代表”（《德国农民战争》1975年

版中文本第24页)。

教士们继承和发展罗马帝国时代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等的神学观点，给暗无天日的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他们说：人的生死祸福和高低贵贱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上帝慈悲地注定那些人要做奴隶；他看到，对他们来说，自由是不相称的”；“上帝要人们之中有些人成为主人，有些人成为农奴，并且使主人爱上帝，农奴敬爱他们的主人”。

从公元八九世纪起，基督教的教义理论更加系统化，在天主教会控制的学院里形成“经院哲学”。经院神学家们利用脱离实际的、空洞烦琐的唯心主义哲学来论证基督教的教义和教条。13世纪时的正统派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是经院哲学家的主要代表。他用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中的目的论来论证上帝创造世界和主宰世界的教条，证明封建剥削制度的合理性，给封建制度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他宣称：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上帝按照等级秩序和预定的目的安排定的。这个自下而上的等级秩序是无生命界、植物界、动物界、人、圣徒、天使和处于顶端的上帝，这样逐级上升，每高一级都有较高级的目的，上帝是宇宙的终极目的；在各等级间，上一级统御下一级，下一级隶属和服从于上一级，层层统御，层层归属，最后一切事物都隶属和服从于上帝。托马斯认为，社会上的封建等级制度正是这个宇宙等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罗马教皇既是耶稣基督在世的代表，封建帝王的权力是上帝授给的，故世人都应归顺他们，服从他们的统治；既然上帝预先安排了人类中间的差

别，故出类拔萃者治人，愚昧无知者受治于人，就是天经地义的了；既然封建等级秩序是“神的意志”，如果谁胆敢违反“天意”，改变“上帝的安排”，就是“犯罪”，死后必将堕入地狱受永罚。

与此相关，天主教会宣扬“原罪”说和来世主义，提倡禁欲主义。按基督教教义，每个人除了本人违背上帝旨意而犯的罪（本罪）外，还有所谓“原罪”。原罪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上帝之命偷吃禁果而犯下的“罪”，这个“罪”遗传给所有的子孙后代，故人人人生来都有“罪”。即使是刚出世的婴儿，虽未犯任何过失，也成了当然的“罪人”，需要洗罪，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教会又宣称：人世间的天灾人祸和一切苦难，既是上帝对人类罪恶（包括原罪和本罪）的公正惩罚，也是上帝对人们赎罪的严峻考验。因此教训人们要虔诚信仰上帝和救主耶稣，依赖教会，参加各种宗教仪式（圣事），实行斋戒，克制情欲，轻视物质生活享受，忍受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卑微恭顺，服服帖帖地顺从人间的统治者，才能洗涤罪愆，得到神的恩典，在来世免下地狱受苦，而升入天堂享福。因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愿望，希望他们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8页）

为了从思想上、行动上和组织上严密控制群众，天主教

会制订了一整套教徒必须参加的“圣事”（主要宗教仪式），并要求教徒除信仰上帝和救主耶稣外，还要把教会组织当作信仰对象，时时事事都要依赖教会，服从教会。

从罗马帝国末期起，教会便提出“教会之外，别无救恩”的口号，强调唯有教会掌握拯救灵魂的“真理”，唯有教会才能施行“圣事”，帮助教徒洗涤罪愆，获得救恩；如果谁“脱离教会，便背离了上帝”，失去被拯救的希望云云。在中世纪西欧现实生活中，由于教会的神权统治，一个教徒被教会革出教门，在社会上就几乎没有容身之地，所以开除教籍，处以绝罚（教会宣布与受罚者断绝关系，禁止一切信徒与他往来）成为教会对待教徒的一种最严厉的处分。

按天主教的说法，教会所施行的各种“圣事”，是帮助教徒获得上帝恩赦的必由之路。但事实上“圣事”往往成为教会控制教徒的一种手段。天主教会的宗教仪式十分烦琐复杂，主要有7种，即所谓的“七圣事”：（1）洗礼是入教仪式，谓受洗者接受教会的洗礼便可洗去入教前的罪过。（2）

“坚振礼”是教徒接受主教施行的接手礼和敷油礼，以“坚定信仰”，“振奋灵魂”。（3）“领圣体”是举行弥撒仪式时，主持仪式的主教或神父把面饼和葡萄酒经过祝圣后，谓已转他为耶稣的“圣体”和“圣血”；主礼者自食一块面饼和喝葡萄酒，然后让教徒轮流领食面饼，谓之“领圣体”，表示获得耶稣基督的生命。基督教认为，耶稣为人类洗罪而牺牲，是为人类赎罪的“羔羊”，故举行弥撒仪式是以不流血的方式，重演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上帝的献祭。（4）婚礼是教徒在

教堂举行结婚仪式，由神甫祝福。(5)“神品”即派立礼，是教会给主教、神甫授圣职的仪式。(6)“终傅”是教徒生命垂危，快要断气时，由神甫给他头上和手足上敷擦圣油，表示赦免他一生的罪过，让他放心地去见上帝。(7)“告解”亦称“办神工”，是天主教的重要活动之一。天主教规定、在一定时期，教徒必须单独向神甫坦白告明自己所犯的罪过，表示忏悔，不得有丝毫隐瞒。而神甫则要详细盘问他“犯罪”的时间和具体情节，然后决定他应以何种方式赎罪补过，即所谓的“补赎”（“补赎”的方式有济贫、斋戒、禁食、朝圣、罚金等项目）。最后，神甫以上帝之名，宣布赦免前来忏悔的教徒的罪过。在名义上，神甫是帮助教徒赎罪和获得拯救，但实际上，“告解”这种宗教仪式是教会严格控制教徒群众思想行动的一种重要手段，因为逃避“告解”的人会招致“异端”的嫌疑，而且前来忏悔的人所受到的盘问，不仅限于他本人的信仰和言行，还包括他们的邻人的思想和行为，这一切都为宗教法庭的审查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神甫们自然便充当起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警察了。

此外，教会还散播封建迷信思想，用宗教迷信愚弄群众，控制群众。

教会一方面散布说上帝“威力无边”，闪电雷击是上帝对人类某些罪孽的惩罚，借以威慑民众服从教会的教义和教规，不得越雷池一步。另一方面，编造出许多鬼怪故事来吓唬群众，说各种天灾人祸都是妖魔鬼怪带来的，只有依靠上帝的大能、圣徒的“德行”和教会的帮助才能驱逐妖魔，消灾

灭病。于是，教士们编出各种祷文、咒语，出售“赶鬼符”和“圣徒遗物”。美国学者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记载了一个用咒语来“消除”天灾的事例：

一年，特拉主教区内发生虫灾，当地教会编写了一篇消灾的咒文。咒文写道：愿上帝佑助，阿们^①。鉴于在特拉主教区内，维勒诺斯居民控诉说：蝗虫、毛虫及其害虫蹂躏本地葡萄园达数年之久……使居民蒙受巨大损失；又考虑到居民请求我们（特拉主教）给害虫以警告，并以宗教处罚迫使害虫逃离本地区。为此，现在我们根据本主教区享有的职权，对上述蝗虫、毛虫及其它害虫，不管叫什么名字，提出严正警告：自即日起，限在6天之内，离开维勒诺斯城的葡萄园与土地。如胆敢违抗，6天期满，我们将咒诅它们，决不宽贷！

从中古时代起，宗教游行就是天主教会驱魔消灾的一种重要方式。不论是久旱祈雨，或是防涝抗涝，均经常举行宗教游行。游行时，教士们敲着铜钹，吹着喇叭，彩马身上放着圣像和“圣徒遗物”，人们簇拥着它，上街游行。

天主教会崇拜圣徒的风气由来已久。所谓的“圣徒”是指古代为宗教信仰而牺牲的殉道者。从罗马帝国末期起到中世纪，天主教会内崇拜圣徒的风气越来越盛，人们从敬仰圣徒发展到迷信圣徒，圣徒竟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保护神”。

^① “阿们”（Amen）是基督教祈祷时用语，源于希伯来文（古犹太文），其意为“诚心所愿”，“心愿如此”。伊斯兰教祈祷时念“阿敏”（Amin），亦来源于希伯来文的“阿们”，其意仍为“诚心所愿”。

6世纪后期都尔城主教格列高里(538—594年)公开攻击医生以药物替人治病,鼓吹崇拜圣徒就能使百病痊愈,说什么圣徒神龛下的泥土可以治胃病,用舌头舔一舔圣徒墓前的栏杆便能治咽喉肿痛。后来,这种迷信更有所发展,教会宣称,许多圣徒有专门的职能,如崇拜圣于贝尔能治疯癫症,崇拜圣阿波林可以治牙疼等等。不仅如此,教会为了诈骗钱财,还伪造和贩卖所谓的“圣徒遗物”,胡诌圣徒遗物的“赎罪”效用。说什么圣徒是为信仰而牺牲的,是上帝的“宠爱者”,所以敬拜圣徒,拥有圣徒遗物,可以帮助自己“赎罪”,死后灵魂得升天堂。因此,谁拥有的“圣徒的遗物”越多,谁便能被上帝赦免更多的罪过。萨克森选侯腓特烈自称拥有5000件“圣徒遗物”,足够他本人赎50万年的罪过。勃兰登堡大主教阿里勃立赫脱宣称他共搜集近9000件“圣徒遗物”和42具完整的“圣徒遗体”,吹嘘说可以保证他赎买三千九百二十四万五千一百二十年零二百二十天的罪过。在他们所谓的“圣徒遗物”中,不仅有“耶稣睡过的稻草”和“耶稣与门徒举行最后的晚餐的桌板”,而且居然还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流下的汗珠”、“童贞女圣母马利亚的奶汁”,甚至有“上帝创造人类始祖亚当时用剩下的泥块”等等。真是荒诞之极!正如中世纪英国文学家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所揭露的,教士们为了骗钱敛财,不惜愚弄群众,把猪骨头当作“圣徒遗骸”来出卖。

为了使人们对天主教这些荒诞不经的说教坚信不移,教会反对独立思考,提倡盲目信仰。教会力图使基督教的教义

和教条神圣化,把《圣经》的教条当作千古不变的绝对真理,当作鉴别是非的唯一准绳。神学家奥古斯丁说:“《圣经》的权威远超过人们的头脑,因此一切都应以《圣经》为标准,决定取舍”。在西欧封建社会里,教会的教条同时又是政治信条,《圣经》的词句具有法律的效力,人人都得信仰,人人都得服从,不容许有任务怀疑。中世纪正统派经院哲学家安瑟伦(1033—1109年)认为“不是理解而后信仰,而是信仰之后再去理解”,说信仰不仅是基督徒研究哲学的出发点,而且是全部哲学的金科玉律和它的归宿。托马斯·阿奎那更提出“信仰高于理性,天启(神的启示)高于知识”的原则,强调各门学科都应服从于神学,说知识如果不以论证上帝为目的,那么任何知识都是“罪恶”,因为“颂扬上帝是善,亵渎上帝是恶”。他还叫嚷:凡是否认罗马教廷制订的信条的、怀疑天主教會的,都是离经叛道,异端邪说,就应当取缔和镇压。为了强化封建主阶级的统治,保持基督教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统治地位,天主教实行文化专制政策。

首先,天主教會认为希腊、罗马古代文化遗产是违背基督教神学的,就把它斥之为“异教”文化而任意摧残。在中古初期,罗马教皇格列高里一世(590—604年)宣称:“不学无术是信仰虔诚之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下令烧毁罗马巴拉泰山丘上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此后,许多古代著名的建筑、雕刻及其它艺术珍品横遭破坏。修道院的僧侣们还刮去写在羊皮纸上的古代手稿的字迹,用来抄写教会信条和历史。9世纪时,一个教会学校的教师拉巴努斯·毛魯斯

在议论几部古代著作时说：“如果我们从中发现什么有用的，就把它牢记下来。如果我们遇到有害的，就用锋利的小刀把它刮掉、削除或割去。”因此，许多重要的希腊、罗马古典著作，不是被弄得面目全非，便是湮没无闻。若干世纪以后，经过阿拉伯人介绍，这些失传多年的古典文献又才为欧洲人所知。

第二，除摧残古代文化遗产外，教会对教育实行垄断。中古时期的教育主要控制在教会手里，广大劳动群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甚至连阅读《圣经》都是犯法的，他们只能听教士的讲解。特别在中古初期，不仅人民群众没有文化，连王公贵族也目不识丁，唯有教会僧侣才读书写字。那时的学校都办在修道院里，主要任务是训练教士。学校里开设的7门课程（即所谓的“七艺”）是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七艺”都是为宗教服务的：拉丁文是天主教会的宗教用语，也是学校的教学用语，拉丁文本的《圣经》便是主要的教科书；学习文法、修辞和逻辑，是为了阅读《圣经》，训练讲道的口才和论证神学的命题；学习算术、几何和天文，是出于设计、修建教堂和推算宗教节日的需要；音乐是为了学会演唱赞美诗。总之，各门学科都浸透了宗教的性质，全部内容都必须服从于神学，不得背离教会的信条。在教会审订的教科书里充塞着许多荒诞无稽的东西。一本几何学参考书里说：“在杳无人烟的一些沙漠（在埃塞俄比亚）”里，“一些部落民没有鼻子……另一个部落的人嘴唇连生在一起，他们通过小小的孔道吸啜燕麦制的食物……而摩尔族的埃塞俄比亚人则有4只眼睛，这是为了准确

射击的缘故。”在天文学课里，讲述大地并非球体，却象个圆盘，浮在水中；耶路撒冷是大地的中心；而天是由4根巨柱支撑着的苍穹等等。他们说，如果大地是个球体，那么居住在地球背面的人必将用头朝下行走。可见中世纪教会学校所讲授的许多东西不是科学知识，简直是神话！

8世纪后期，查理大帝为了维持帝国政权，培养行政管理人才，创立宫廷学校，贵族子弟开始读书识字。这所学校由来自英国的高级教士阿尔琴主持，教师全是僧侣，教学内容自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自11世纪起，随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城市居民要求从封建主统治下独立出来，也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要求。因而产生世俗的城市学校，重视读、写、算等应用知识的传授和训练，当然也免不了要开设神学课。从12世纪开始，大学纷纷成立。最先成立的是意大利波伦亚大学，这是个法律研究中心。随后，出现著名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这些大学最先多半是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师生联合组建的，但学校开办以后，天主教会施展各种手段牢牢控制了学校的领导权。各大学虽然都有文学、法学、医学等学科，但一切学科都必须服从神学。教会为了保证神学的统治地位，对从事科学研究和有自由思想倾向的教师学者进行打击和迫害。

12世纪前半期，法国神学家阿伯拉尔（1079—1142年）在巴黎讲授神学。他反对安瑟伦的“先信仰而后理解”的观点，主张信仰不应盲从，应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故提出“理

解而后信仰”的口号。于是他遭到教会的谴责，其著作《神学导论》被焚毁，他本人被幽禁于修道院中而死。14世纪时的英国人奥卡姆，虽也是个经院哲学家，但他主张神学只能管辖“信仰领域”，不能干预“知识领域”；并说教会只能管宗教，不应干预政治，应实行政教分离。他的思想主张，触犯了教会的封建神权统治，罗马教皇判他为“异端”，把他关进教廷的监狱中。牛津大学教授罗吉尔·培根（约1214—1294年）是中世纪中期冲破神学罗网，大胆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位学者。他青年时代虽也当过修道僧，但他不服从修会清规。到大学任教后，更反对盲目信仰，蔑视烦琐空洞的经院哲学，长期埋头进行物理、化学的实验和研究。宗教与科学是对立的。教会敌视他的科学研究成果，诬蔑他的研究工作是搞“巫术”、“与魔鬼交往”，叫嚷要打倒这位“魔法师”。1278年，他被关进教会监狱，囚禁14年之久。被释出狱时，已78岁高龄，两年后便去世。

到中世纪后期，反封建的政治运动蓬勃兴起，“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西欧的封建堡垒——天主教会不断受到猛烈冲击而日趋没落。罗马教廷为了维护其神权统治，挽救西欧封建制度危机，更加疯狂地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对坚持真理的思想家和科学家进行更加残酷的迫害。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和伽利略便是两位永为世人怀念的受害者。

乔丹诺·布鲁诺（1548—1600年）是著名的哲学家和天文学家。他蔑视教会的淫威，勇敢捍卫和发展哥白尼的唯物

主义学说,并提出宇宙是无限的和统一的理论。他认为宇宙是物质的、无限的,由无数的星系组成;太阳并非宇宙中心,只是人类所在的星系的中心;地球是无限宇宙中的一个细小微粒,围绕着太阳旋转;宇宙是永恒的,既不会被创造,也不会被消灭。另一位天文学家伽利略(1564—1642年)同时也是一位物理学家。1609年,他亲手制造第一架天体望远镜,用来观测浩瀚无垠的太空。经长期的观察研究,他发现许多天体现象,特别注意到金星和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找出星体运行的规律。1632年出版了他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一书,批判了托勒密地心说的谬误,用确凿的证据证实了哥白尼的日心学说体系。

这两位意大利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激怒了教会的当权者,因为他们的观点触犯了《圣经》的教条。多少世纪以来,教会根据《圣经》的神话宣传说:上帝创造了世界;大地是宇宙的中心,而日、月、星辰只不过是上帝创造出来点缀天空的装饰品;上帝创造的大地坚如磐石,不能转动等等。而今,布鲁诺和伽利略的学说推翻了在西欧统治1000多年的“地心说”,否定了《圣经》中关于上帝创造世界和主宰世界的神话,动摇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于是天主教会把他们的科学观点视为洪水猛兽,一定要把他们二人置之死地。教会指控布鲁诺为“异端”,宣布开除他的教籍。他被迫流亡国外,颠沛流离10余年。后来受骗回国,被宗教裁判所逮捕下狱,囚禁7年。他虽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坚贞不屈。1600年2月,这位为真理而斗争的伟大科学家被教会法庭判处火

刑，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伽利略也同样遭受封建教会的残害。1632年，他的天文学著作发表才几个月便被教会列为禁书。1633年2月，宗教裁判所勒令这位年近70的老人到罗马受审。他虽已是风烛残年和疾病缠身，仍不得幸免，被严刑逼讯并被押到教堂中当众忏悔。1633年6月，教会又以“异端”罪名判处他终身监禁。在软禁中，他那双观察天象的敏锐眼睛失明了，1642年1月终于含冤去世。

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就是这样通过美化封建制度，垄断文化教育和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铁的事实说明，天主教会是西欧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

教会为什么能同封建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根据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发展自己的教义理论，发挥其精神警察的作用？这与教会的经济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在欧洲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教会本身已发展成欧洲最富有的封建大地主，这是教会建立封建神权统治的经济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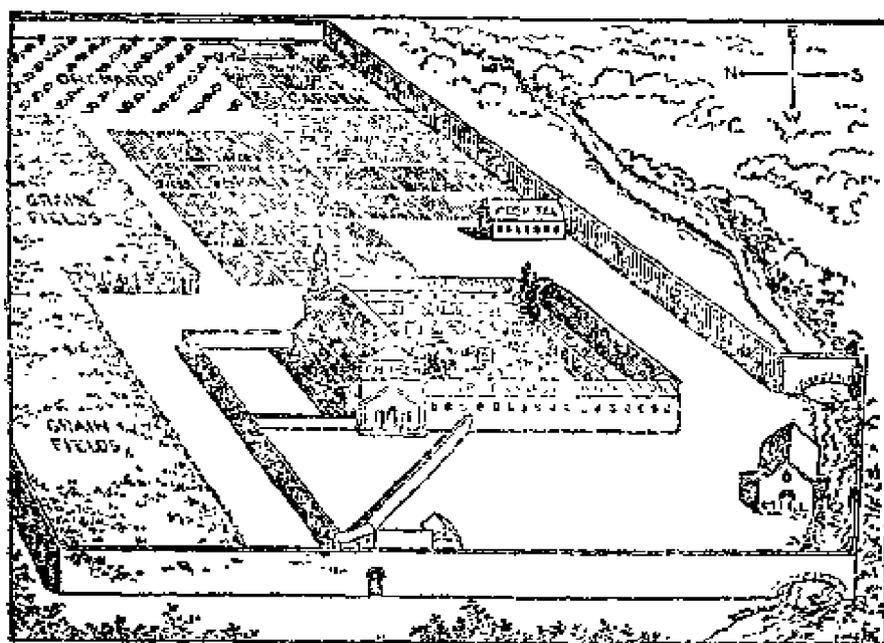
三 西欧封建社会中 最富有的财主

道貌岸然的教士们捧着《圣经》，向群众喋喋不休地宣讲《福音书》里耶稣的“遗训”，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路加福音》第18章第24、25节）可是这些伪善者

却每时每刻都在贪得无厌地追求财富，对广大群众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使天主教会成为西欧封建社会中最富有的财主。

在中古时期，天主教会占有西欧各国1/3左右的土地，教皇、红衣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长都是大封建主。他们剥削教会领地上的农奴，又向全体居民征收什一税。此外，他们不仅通过施行各种“圣事”剥削广大教徒，还出卖所谓“圣徒遗骸、遗物”和赎罪券来诈骗钱财，因而十分富有。

在教会的封建经济中，修道院占据重要地位。修道院又叫“隐修院”，是基督教的出家人（修士和修女）聚居的地方。修士们自我标榜脱离世俗，隐居修道，过清贫生活。但中世纪的修道院一般都是封建大庄园，它们广置田产，占有众多的农奴，并利用教会的免税特权经营工商业，逐利远近；



修道院图

还放高利贷，聚敛钱财。寺院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形成一股巨大的势力。

早在罗马帝国晚期，教会已拥有许多土地产业。进入中古时期以后，相继信奉天主教的各国封建统治者又不断给教会大量馈赠。法兰克的历代国王都向教会捐赠土地、葡萄园、金钱、珠宝和教堂用具等，他们简直在彼此竞赛，看谁捐献得多。克洛维赐给圣里迈教会大量土地；达格伯特一世则把图尔的全部收入捐给当地的圣马丁教会。难怪希尔佩里克执政时常抱怨说：“看，我们的国库变得多么空虚！看，我们所有的财物都送给教会了。”查理大帝征服萨克森人之后，又将新征服的大片土地赏赐给教士们，随查理出征的主教都成了萨克森地区的大封建主。国王如此，贵族和平民也踊跃向教会捐献，因为那时不分贵贱，都抱有这样一种信念，认为向教会捐献钱财可以“赎罪”，教徒的“信德”就是看他向教会捐献的多少，于是财富源源不断送到教会手中。

教士们利用信众的宗教热情和对古代圣徒的崇敬来取得各种捐赠，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到中古时代，教会内部崇拜和迷信圣徒的风气越来越浓。人们为了“赎罪”和得到上帝宽恕，也为了治病和得到平安，都要祈求圣徒的在天之灵给予帮助，于是纷纷朝拜圣徒墓地，或到一些教堂瞻仰圣徒遗骸、遗物等，这就使教会增加了大量经济收入。德国历史学者保·罗特在《采邑制度史》中，生动地记述说：“为了继续唤起人们捐献的兴趣，我们看到，他们（指教士们）采用多么无耻的手段啊！描绘天堂之乐和地狱之苦已经不再

见效的时候，他们就从遥远的地方搬来圣徒的遗骨，举行巡回展览，建造新的教堂；这在9世纪简直成为一种正式的经营部门了……苏瓦松的圣梅达尔德修道院的使者，在罗马费了极多的周折，乞求到圣塞巴斯提安的遗体，并将格列高里的遗体也一同偷走。当这两具遗体放在修道院里的时候，跑来瞻仰新到的圣者的人是那么多，他们就象蝗虫一样布满那个地区。对于求助者，不是一个一个治疗，而是成群结队一起治疗。结果是，修道士们只得用升子来量金钱，这样的升子就有85个，修道院的黄金储量达到900磅。”美国学者汤普逊也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记载说：在乡村里，教士捧着“圣徒遗物”带领群众列队游行已成一种风俗，而且游行队伍在哪里停止，哪里便被宣布为“属于圣徒的土地”，划归教会所有。

教会除接受人们的捐赠外，还利用自己的特权，通过“委身式”把自由农民的土地变为教会所有。在西欧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劳动者中还存在着众多的法兰克自由农民。由于天灾人祸，特别是连绵不断的封建割据战争、抢劫和赋税剥削，使大批自由农民陷入破产境地。因为教会享有免税特权，其财产又得法律保护，于是走投无路的农民，被迫将自己的土地交托给教会，请求教会“保护”，然后又从“保护人”那里领取份地来耕种，并向“保护人”缴纳贡赋和服劳役。经过这种“委身”方式，自由农民失去土地所有权和人身自由，土地所有权转归教会，农民本人及家属则变成了教会封建主的农奴。

不仅如此，教会还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和司法权霸占农民土地。查理大帝在他的诏令中透露：“穷人忿忿不平地说：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被主教、修道院长及其代理人驱逐出来……如果一个穷人不愿交出他的土地给主教、修道院长或伯爵，这些大人就制造借口，把他送交法庭，或命令他长期服兵役，直至这人完全破产，不得不交出或出售土地。”也正由于教会拥有司法权，教士们才可以肆无忌惮地伪造证件，侵吞教徒的产业。罗特在《采邑制度史》中又写道：“许多宗教界人士大规模地干这种事……可以从我们所搜集的大量假造文件的数目中看出来。在布雷基尼所引用的360件墨洛温王朝文书中，约有130件绝对是假的……兰斯的欣克马尔^①就利用过莱米鸠斯的假遗嘱为他的教会侵占了许多财产。”

罗马天主教会就是通过捐赠、欺骗、霸占、伪造证件等种种手段巧取豪夺到大片地产的。据罗特估计，在7世纪末期，高卢天主教会的土地，已超过当地总面积的1/3。810年亚琛的宗教会议，曾按财产多寡把教士分为3等：拥有1000块保有地者只列入第3等，第2等一般都拥有3000块保有地，拥有3000至8000块保有地的才列入第1等。德意志著名的佛尔达修道院在兴盛时期共有保有地15000份之多。就面积计算，许多修道院都有良田万顷。9世纪时，位于巴黎境内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共有地产近43万公顷；圣丹尼、吕克瑟伊和图尔的圣马丁等修道院各拥有土地80余万公顷。由于教会财产太多，一个寺院的产业往往分散在各地。德意

^① 法国兰斯地区的大主教。

志鲁尔河畔的维登修道院，在莱茵河畔夫勒美西漠的旧王室领地上有一块辽阔的土地放牧牲畜；在厄斯特河畔有一处连接王室领地的肥美庄园；在莱茵河中游，有几处大葡萄园；在莱茵河出口处，有8个庄园，饲养着无数的牛羊和猪群；在威斯特发里亚，有四五个村庄，另有330个分散的蜂房；在佛里斯兰，有82处小庄园，还有几片森林地，几所教堂和若干处盐场……总之，它共拥有200多个村庄，420个大庄园和几百块小土地，然而这座维登修道院只被人们看成是一所穷寺院。在有的地方，绝大部分土地及农户被教会占有。9世纪末，在阿尔萨斯的435个村落中，就有399个属于教会。不仅西欧如此，在天主教势力伸入中欧及东欧某些国家后，教会也同样占有大量的地产。波兰的格尼兹诺大主教就拥有两座城市，271个乡镇，83个庄园和87个磨坊。就整个天主教世界而言，教会的地产占各国土地的1/3左右；而14世纪时的捷克，教会竟拥有全国土地的一半。

教会封建主占有广袤的土地，直接剥削领地上的农奴。农奴耕种从封建主那里领来的那块份地（亦称“保有地”），承担着极沉重的封建义务：除负担各种徭役之外，还要把份地上和家庭手工劳动中生产的一大部分农副产品（粮食、肉、酒、家禽、蛋、麻布等）作为地租及贡物交给封建主。如法国的圣里奎尔修道院每年可从租户征收巨额现款租外，还可收到小鸡1万只，阉鸡1万只，蛋75000千枚，制烛的蜡400磅。普鲁姆修道院9世纪时每年可从领地中收进各种粮食7550担，食盐432担，鸡4300余只，蛋20800多枚，猪4200余

口,羊200余只……

狠心的教会封建主向农户征收贡物时条件极为苛刻。有一所修道院曾规定,如果贡纳的小鹅“吃草时趴在地下,样子难看”,就拒不接受;交纳的母鸡要“在受惊时能飞到凳子上”才算合格,否则就不算数。

教会除直接剥削和奴役所属领地上的农奴外,还向全体居民征收什一税。这是中古时期教会强加于欧洲各国人民的一种宗教税。《圣经》中曾说农牧产品的 $1/10$ “属于上帝”。6世纪时,封建教会便引经据典,开始向居民征收什一税。8世纪时,查理大帝发布敕令,明文规定向教会缴纳什一税是帝国全体居民的义务。敕令中说:“按照上帝的意旨,朕命令每人都将自己的财产和劳动的 $1/10$ 捐纳给教会和教士。所有贵族、自由人和半自由人,都应从来自上帝的,拿出一部分还给上帝。”这样便使什一税合法化。9世纪时英国教会也开始征收什一税。到10世纪中期,西欧各国普遍实行这种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又分成大什一税(粮食)、小什一税(蔬菜)和血什一税(牲畜)几种。事实上,税额在不断增加,远远超出纳税人收入的 $1/10$ 。在库尔敦的《中世纪村庄》一书中写道:什一税是一种“土地税、所得税和死亡税,比起任何近代所知道的税要苛重得多。不仅农民和茅舍人必须缴纳他们所有产品(按理论,至少包括直到他们花园中的盆花为止)的 $1/10$,而且商人、店员甚至最穷苦的手艺人,也必须缴纳同一的税,按同一理论,即从他们的个人所得的每镑里应缴付两先令的税……收取羊毛的什一税被

认为也应包括鹅毛在内。连从路旁所割下的青草，也应付它应负的税。如果有农民在缴纳他谷物的什一税之前先扣除工作上的成本费，那么他将因此而自投地狱。”17世纪初，法国的三级会议曾向法兰西国王呼吁，说什一税的负担太重，因它“按总收获量的 $1/10$ 征收，不象国家征税时那样是扣除了50%的生产费用之后而计算的，因此实际上是20%的税”。国税已够苛重了，教会的什一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教徒不仅生前要负担沉重的什一税，死了还要交纳“死亡税”。贪婪的神甫借口说，死者在生前缴纳什一税时必然会对自己的收入有所隐瞒，欺骗了教会，因此教会有权索取死者家中次好的牲口或其它物品，作为补偿。这是多么荒唐啊！在爱尔兰，还形成一种惯例，每个死亡的教徒的遗产的 $1/10$ 必须划归教会所有。

西欧各国的封建帝王曾给教会封建主“特恩权”，即主教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独立的行政权、司法权和征税权，所以主教可从领地居民身上榨取诉讼费、罚金和各种苛捐杂税。主教和修道院长在集市贸易中征收交易税，对过路客商征收通行税和过桥税。为了索取更多的通行税，有的领主把一些本来通行的道路堵死，强迫旅客绕道而行非从他的领地经过不可。

有的教会封建主以势压人，向居民强迫推销他们的劣质酒。教会庄园（特别是修道院的庄园）里有葡萄园和酿酒房，生产大量的葡萄酒。由于寺院有免税特权和专门的商业经纪人，教会庄园的产品有着十分便利的条件运往各地销售，赚

得巨额利润。但教会封建主并不以此为满足，竟利用手中特权，规定一个期限，强迫本地居民出高价购买他们的劣质酒，抗拒者要受处罚。在德国普鲁姆修道院的领地里形成一种惯例，倘若农民不愿购买庄园主的那两加仑酒，领主可以“从这家人的屋顶上倾倒4加仑酒，如果酒往下流，农民就必须付出酒钱；如果酒往上流，那就可以不必付款”。教会封建主对家贫如洗的农民竟如此敲诈勒索，真是丧尽天良！

利欲熏心的修道院长们不仅经商牟利，还从事银钱业务，进行高利贷剥削。修道院在贷款时，要求有许多抵押品，即使债务人到期不能偿还贷款，寺院仍能盈利。而且贷款时，债务人必须送礼，还款时也要送礼。修道院就这样靠抵押放款，重利盘剥，集聚了无数钱财。

天主教会的宗教仪式十分繁杂，有洗礼、坚振礼、领圣体、婚礼、终傅等，每一种宗教活动都成为主教、神甫剥削收入的来源。15世纪初，捷克的宗教改革家胡司教授曾经揭露说：每个信徒从睡在摇篮里的时候起直到老死进棺材的一生中，神甫们的贪婪的手都向他们伸着。“这是忏悔费，这是弥撒费，这是圣体费，这是恕罪费，这是传道费，这是祝福费，这是埋葬费，这是圣水费，这是祈祷费。甚至于老太婆为了使强盗和窃贼找不到起见而藏在头巾里的最后一枚铜元，也被他们夺去了。”

主教、神甫和修道院长们搜刮来的钱财，一部分耗费于他们奢侈豪华的生活中，另一部分则转入教会首脑——罗马教皇之手。罗马教皇既是教皇国的君主，又是天主教会的世

界领袖，故有庞大的财政收入。中古时期，教皇的剥削收入主要有下列项目：

(1) 教皇国的赋税收入。

(2) 向所有天主教国家居民征收的什一税。什一税一部分归地方上的主教、神甫所得，另一部分要上交罗马教廷。

(3) 从10世纪起，各天主教国家的君王及诸侯向罗马教皇的进贡。

(4) 自13世纪英诺森三世任教皇开始，教皇权势盛极一时，英国、葡萄牙等国家都成了教皇的“侍臣国。”侍臣国必须定期向教皇缴纳贡赋，称为“彼得辨士。”

(5) “十字军东征税”。教皇以“保卫基督教”之名发动十字军东侵，为募集军费而征收此税。这是罗马教廷的一大宗收入，常占教会年收入的1/10。然而“十字军东征税”的一大部分不是花费在其它用途上，便是落入教皇及其宠臣的私囊中。到十三十四世纪时，教皇已无能力再发动十字军东侵了，但仍继续征收所谓的“十字军什一税”。

(6) 教皇委派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和教廷的官员等神职人员时要收取各种“献礼”，实际上是靠卖官鬻爵而大发横财。在法兰克时代，主教和修道院长是由国王任命的；在11世纪以前的神圣罗马帝国，仍由德意志皇帝控制着主教的授职权。在11至12世纪之间，罗马教皇同德意志皇帝进行了反复激烈的斗争，教皇权势逐步上升，并取得了对主教等神职的委任权。从此以后，出售教会神职成了教皇最能获利的一项买卖。每一个教会神职都有一定的售价。在罗马教廷

里，对各地的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长的任职处各有多少教产、年收入若干，都有一个详细的登记册。任何一名被委派的高级神职人员在正式领受象征教会权力的“戒指”和“牧杖”以前，必须把相当于该职位年收入的1/3至40%的金钱“献给”罗马教廷，称作“任命费”。这笔任命费实际上就是教会出卖该神职的售价。14世纪时，捷克布拉格教区主教的任命费值2800金币。而德意志科隆大主教区大主教职位的任命费高达3万金币。“任命费”收入十分可观，在1316年至1326年10年间，教廷任命高级神职669项，共收任命费89万多金币。教廷所收的任命费，罗马教皇分得一半，另一半由教廷大臣——红衣主教们瓜分。此外，基层教堂的神甫（司铎）一般由本教区的主教授予神职，神甫就职后，必须将第1年的收入“献”给主教，叫做“初熟之果”或“年金”。14世纪初，教皇下令将这笔收入改归教皇，由教皇一人独占。

为了弄到更多钱财，罗马教廷不仅出卖实缺，还出卖“候补神职”。如某主教未死，还在任职，教廷就已经把他的职位卖给了另外一人作“候补”，当第一个后补人还未上任，又已经有了第2、第3个甚至第10位候补人。排列在后面的那几名候补人往往等到老死还轮不到自己上任。由于出了钱没有捞到实缺就离开了人世，死者家属便在教皇法庭提起诉讼，所以教皇亚历山大四世（1254——1261年在位）不得不规定，后补神职只能卖到第4位。教会出卖候补神职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桩丑闻。

此外，教皇还向其下属神职人员收取各种费用，如“巡

礼费”、“视察税”等。按教会规定，各地高级神职人员在任职期间，必须定期到罗马巡礼，朝拜教皇，觐见时要备厚礼献给教皇及教廷的红衣主教们。13世纪以后，教廷决定，不到罗马朝圣也可，但必须向教廷缴纳“巡礼费”，数额为从该教士的任职处所到罗马的来回旅费。教会又规定，主教必须定期视察本教区的乡村小教堂，视察时向教堂神甫征收“视察税”，后来教皇决定主教不必外出视察也可征收这种税款，但税金的一半必须上缴给教皇。罗马教皇巧立名目，从下属神职人员那里索取各种费用和“献礼”，而主教和神甫们又把这一切重担转嫁到人民群众肩上，从百姓身上十倍、百倍地捞回付出的钱。

（7）贩卖“赎罪券”（赦罪符）的大宗收入。罗马教皇自称是“基督在世的代表”，有权代表上帝赦免任何一个教徒的罪过，因此教皇利用其神权进行的“赦罪施恩”就成为他取之不尽的财源。中世纪教皇的御用神学家们提出了一种“过剩神恩宝藏”说（或称“功库”论），谓人类有罪而又不能自救；上帝为了拯救信徒，给人“恩典”，派遣其独生子耶稣以自己的流血牺牲为人类“洗罪”；他们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一滴血就足够赎人类所有的罪，而耶稣身上所流的其余的血、圣母马利亚和圣徒们的德行（功劳）又组成“神恩”的额外部分，所有的“神恩”都储存于“功劳宝库”（善功圣库）中；“功劳宝库”由教会掌管，罗马教皇有权将“功库”中的“神恩”施舍或出售给任何一个罪人，帮助他“赎罪”，获得拯救，死后得进天国。这一学说成为

教皇收取施恩“特别费”和贩卖“赎罪券”的理论依据。

凡是违犯教规的人，如被开除教籍者请求恢复教籍、贵族的私生子要取得正式继承权等，都要请求教皇“恩准”，必须向教皇缴纳施恩“特别费”。此风一开，教会大肆伪造和出售“圣徒遗物”诈骗钱财（教会谓圣徒遗物有“赎罪”效用，最后竟发展到由教皇贩卖“赎罪券”。在中世纪的中、后期，出售“赎罪券”成为教皇国库的一项重要财源。罗马教廷经营“赎罪券”的机关是“听悔审判厅”，由它规定“赎罪券”的价格。“赎罪券”在罗马印刷，然后运往欧洲各地，由教士们在教堂里、广场上或十字街头叫卖兜售，金钱则源源不断地流入罗马。

罗马教皇通过上述各条渠道从欧洲各国人民身上搜刮钱财。据估计，教皇每年的收入大大超过欧洲各国国王年收入的总和。主教、修道院长们都是封建吸血鬼，而罗马教皇则是欧洲最大的封建吸血鬼。教会的殷实富有，使许多世俗封建主感到望尘莫及，产生嫉妒之心，并时时觊觎教会财产，以致教、俗封建主之间发生齟齬，为争夺权势和经济利益不断发生剧烈冲突。

四 教皇与西欧世俗君主的角逐

为了维持封建统治，天主教会同西欧各国世俗政权相互

勾结在一起。另一方面，罗马教皇和世俗君主们各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几辆“马车”并驾齐驱。由于教会与世俗封建主在剥削利益上存在着尖锐矛盾，为争夺政治经济权益，二者又长期互相角逐。

在11至12世纪期间，欧洲当时的两股最大封建势力——罗马教皇与德意志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争夺主教的叙任权和争夺西欧的最高支配权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兵戎相见。

所谓的主教叙任权是指授予天主教主教在其领地上的职务和权力，即委派主教之权，任命主教之权。任命主教时，一般是授以“指环”及“牧杖”，象征其宗教职权；授以“权



给主教授圣职

杖”象征他在领地上的世俗统治权力。在法兰克时代，主教和修道院长是由国王任命的。在11世纪末叶以前的神圣罗马帝国，主教的职权仍由德意志皇帝授与。国王掌握着主教的叙任权，便可控制本国教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许多好处。既可利用教会力量牵制搞封建割据的诸侯，也可以出卖教会神职和从教会的庞大收入中捞取油水。但这时权势日益上升的罗马教皇，不能容忍世俗君主控制本国的教会，要求各国教会都绝对听命于教皇，而夺取主教的叙任权是关键所在，故主教的叙任权成了中古中期教皇和世俗君主斗争的焦点。

在罗马教皇与德国皇帝的冲突公开爆发以前一两个世纪，教会与世俗封建主的矛盾就逐渐暴露出来了。教会为了提高教皇地位，维护主教职权，摆脱皇帝或国王的控制，已在多方面制造社会舆论，其表现是：（1）教会伪造《伊西多尔教令集》；（2）在教皇赞助下，克吕尼运动兴起。

在八九世纪间，出现一部教会伪造的《伊西多尔教令集》（教会称这一文件集为7世纪西班牙大主教伊西多尔所编，故名），汇编了2世纪以来罗马主教的书信及一些会议文件，其中有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致当时的罗马主教西尔薇士德一世的一封信。该信称，君士坦丁为感谢医好他的麻疯病并使他皈依基督教，自己迁都东方的拜占廷（后改名君士坦丁堡），而把帝国西部的统治权及整个基督教会的管辖权都交给了罗马主教西尔薇士德一世及其继承者，史称“君士坦丁的赠礼”。整个文件集都宣扬“教权至上”的思想，谓教

皇应高于国王，教会权力应高于国家政权；教会主教只能服从教皇，不能服从任何政府。虽然这部《教令集》后来被证实属于伪造，但在中古中期，曾被罗马教皇利用来同世俗君主争权，并成为教皇在教会内加强集权统治的理论依据。

克吕尼运动是10世纪天主教会内部产生的一个僧侣运动，它也为提高教皇地位，夺取主教的叙任权而摇旗呐喊。克吕尼运动兴起的背景是，由于教会世俗化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第一，随着西欧封建制度的最后形成，天主教会不仅成为最富有的封建农奴主，而且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世俗统治权力。教会神职人员依恃其神权和世俗权力，残酷剥削和鱼肉人民，生活奢侈腐化。神甫娶妻、纳妾、出入妓院以及神甫的儿子继承父职当神甫等现象不断出现。10世纪时意大利的一名主教透露：当时的教会神职人员一旦任职，便恣意挥霍教会的钱财，进而把教会财产转入私人名下；神甫们平时养鹰、养狗、赌博和酗酒，有时身怀匕首，醉熏熏地走上祭台。在爱尔兰，神职人员不断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有的大主教竟在黑夜里组织暴徒谋杀其下属主教，主教也以同样手段谋杀其“顶头上司”大主教。不仅教区的教士腐化堕落，那些自命清高、标榜弃绝世俗的修道僧也同样恶劣，修道院的清规戒律多已废弛。教会的腐败，教士们的堕落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教会的道义威信大大低落。第二，世俗君主通过控制主教叙任权来控制教会，出卖神职，同时利用神职的空缺时期，把教会收入据为己有。许多封建诸侯也在自己的领地内自建教堂，控制这些基层教会的神职

人员（神甫和助祭）的任命权，并享有该教会的收入。这一切现象都是教会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教皇与国王之间、教区主教与世俗诸侯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基于上述原因，在天主教会内部，兴起了克吕尼运动。

910年，修道僧伯尔诺（850—927年）在法国勃艮第境内的克吕尼新建一座修道院，鼓吹整顿修道院组织，提倡严守清规，要求教士脱离家庭，不许婚娶，以防止教会的土地财产通过教士亲属转至世俗封建主手中。克吕尼修道院的呼声得到西欧各地不少修道院的响应，他们逐渐串连起来，结成“克吕尼派”。克吕尼派在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该派的主张由整顿修道院的组织纪律，进而发展为要求调整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反对国王和诸侯任命神职，反对俗人干涉教会事务，主张主教的叙任权改归教皇；又鼓吹抬高教皇地位，不仅要求各国教会绝对服从教皇统治，还主张国王、诸侯都应听命于教皇。这些主张非常适合教皇的胃口，所以教皇积极支持克吕尼运动，借以打击世俗君主的权力。

11世纪中叶教皇尼古拉二世任职时期（1058—1061年），克吕尼派修道僧喜尔德布兰是教皇的得力助手。根据他的建议，教皇于1059年在罗马的拉特兰宫召开宗教会议，决定把选举教皇的权力授予罗马教廷的高级教士——枢机主教（红衣主教），从而摆脱了过去皇帝任命教皇的惯例，皇帝只是名义上任命一下而已。

1073年，喜尔德布兰即位为教皇，即著名的格列高里七

世（1073——1085年在位）。他野心勃勃，打着“改革”旗号，拼命加强教皇权力，曾亲自草拟阐释教皇地位及权力的《敕令》27条。《敕令》中称：“惟有罗马主教才能享有‘世界主教’^①之权利”（第2条）；“惟有他一人享有使用帝王仪仗之权”（第8条）；“惟有教皇一人具有任免主教的权力”（第3条）。格列高里七世不仅强化教皇对教会的控制，而且提出“教会高于国家”的原则，他在《敕令》中又规定：“一切王侯均应向教皇一人行亲足礼”（第9条）；“教皇被〔上帝〕赋予废黜帝王之权”（第12条）；“教皇有权解除人民对邪恶君王的效忠誓约”（第27条）。根据上述神权思想，格列高里七世依靠克吕尼派的支持，加强了教皇对天主教会的中央集权统治。1074年，他将那些不服从教皇命令的德意志主教予以免职。1075年，他正式公布教皇《敕令》，剥夺皇帝对主教的叙任权。

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对教皇的《敕令》置之不理，还同教皇争夺意大利北部米兰大主教区的控制权。米兰大主教的职位空缺已久，教皇和皇帝都争着派自己的亲信去接任。亨利四世不仅任命一名泰德尔多僧侣担任米兰大主教，还派埃伯尔哈德伯爵率军队侵入意大利。双方关系骤然紧张起来，终于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

教皇格列高里七世于1075年12月致函亨利四世，对他提出严正警告：若不改正错误，将把皇帝废黜。亨利四世则针锋相对，纠集不听命于教皇的教士，于1076年举行德意志宗

^① 教皇由罗马主教发展而来，直至今日教皇仍兼有“罗马主教”头衔。

教会议，写了一封侮辱教皇的复信，矢口否认格列高里七世的合法地位。信的开头说：“朕，亨利，受命于天的国王，致书现在并非教皇而是假僧侣的喜尔德布兰。”信中把教皇臭骂一顿之后又强调说，皇帝的权力是来自上帝的，你喜尔德布兰“既不敬畏上帝，又不尊重上帝所选立的君主”，“应当受到咒诅”；最后明确宣布要废黜格列高里七世，说：“你这个受咒诅的人……应当放弃你所僭窃的职位，立即从使徒的宝座上滚下来。让别人登上圣彼得的宝座吧，他将宣扬圣彼得的健全的教义，而不是披着宗教外衣实行强暴。朕，亨利，奉天承运的国王，兹会同我们的主教们向你发出命令：滚下来！滚下来！接受千秋万古的咒骂。”

格列高里七世心里明白，亨利四世虽然气势汹汹，但他在国内地位不稳。他曾受农民起义的打击，还有许多政敌，大多数德意志封建主、修道僧和部分德国主教都反对皇帝，许多意大利城市也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不满。教皇利用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发表通谕，宣布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处以绝罚，并解除全体臣民对皇帝效忠的誓约。那些热中于封建割据的德意志诸侯认为这是削弱中央政权的大好时机，教皇对皇帝的这种处置成了他们公开反对皇帝的口实。1076年10月，反对德国皇帝的诸侯们在特利布尔（沃尔姆斯附近）举行会议，要求亨利四世“暂时放弃皇帝职位”，向教皇忏悔，痛改前非，争取在1年内获得教皇的恩赦，否则他们将另选一名皇帝。亨利四世在国内面临着即将爆发诸侯叛乱的危险。他别无选择，只好立刻带着少数随从，越过阿尔卑斯

山,到意大利去觐见教皇,请求教皇恕罪。1077年1月25日,他到达白雪皑皑的亚平宁山中的卡诺莎城堡,当时教皇作为托斯卡那女侯爵马蒂尔达的客人居住在那里。高傲的格列高里七世有意羞辱这位不可一世的皇帝,拒不接见他。亨利四世不得不忍气吞声,除下一切属于国王尊荣的表记,披上一件悔罪时穿的毡衣,赤着双脚,站立在城堡门外的雪地里苦苦哀求了3天。格列高里七世终于答应赦免亨利的罪过,恢复他的教籍。后来这一戏剧性的场面成了一个典故——“卡诺莎觐见”,这个词则成了屈辱投降的同义语。

但卡诺莎的“恕罪”并未带来和平,只是教皇同皇帝决



“卡诺莎觐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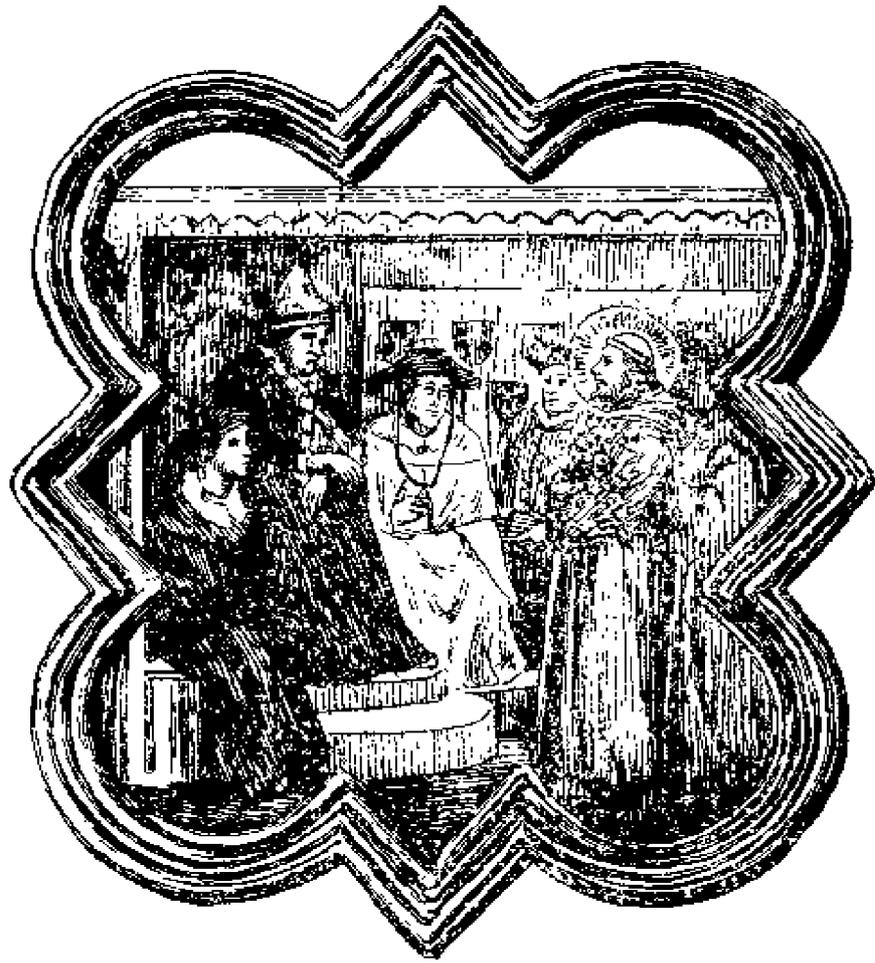
斗的第1个回合而已。当亨利四世回到德意志后，就重新集聚力量，准备东山再起。另一方面，教皇鼓动反对亨利四世的诸侯选出一名新皇帝卢德福。于是在两个德意志皇帝之间展开一场内战，结果亨利四世战胜卢德福，并乘胜进军意大利。1084年，罗马被占领，教皇格列高里七世逃出罗马，1085年死于南意大利。以后的教皇和皇帝虽然都换了人，但教俗之争仍未结束，经过多次较量后，双方达成协议。1122年9月23日，教皇加里斯都斯二世和德皇亨利五世签署《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亦译称“窝牧教约”）。双方同意德意志主教和修道院长不再由皇帝任命，而由教士自己选举产生，但选举时应有皇帝或他的代表在场；新选出的主教，首先由德国皇帝赐予“权标”，象征其领地上的世俗统治权力；而后由教皇赐予“指环”（权戒）和“牧杖”，象征其宗教权力。然而这一教约的签订只是教皇与皇帝的暂时妥协，矛盾并未解决，此后双方仍继续进行争夺权势的斗争。

12世纪30年代，德意志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霍亨斯陶芬王朝。50年代即位的“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是个野心勃勃的皇帝。他为了加强“神圣罗马帝国”对意大利的统治，进而想控制罗马教廷，曾多次率军队进攻意大利。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联合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城市和南方的西西里王国共同反对德皇。1176年，腓特烈一世的军队被伦巴底各城市击败，被追求和。1177年，正值“卡诺莎事件”100周年之际，德意志皇帝再次屈服，重演了“卡诺莎匍匐”的故事，到威尼斯朝见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拜倒在他的面前，吻其短靴，

行了“亲足礼”。随后同伦巴底同盟军签订和约，承认伦巴底各城市的自治权。趁此时机，以教会法学家著称的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1179年召开第三次“拉特兰公会议”，制定《教皇选举法》，规定教皇应由枢机主教团（红衣主教团）的2/3的多数选举产生，其目的在于杜绝世俗贵族干预教皇的选举。这个选举法在教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基本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亚历山大三世死后10多年，著名的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上台执政，在教会内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同时，他使用各种手段，压倒西欧许多世俗君王，迫使他们向教皇称臣纳贡，教皇权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罗马教廷成为欧洲封建统治的国际中心。

英诺森三世，原名罗大略，出身意大利贵族世家。此人野心很大，他当选为教皇后，继承和发展格列高里七世的神权政治观点，妄图在天主教世界建立一个以教皇为首脑的大联邦。他的教义是：“主耶稣基督交给彼得治理的不仅是整个教会，而且是整个世界。”既然他梦寐以求地充当世界霸主，就竭力鼓吹教皇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代表，故帝王都应成为教皇的附庸，他们只能从教皇手里领受世俗统治权力。他有几句十分得意的话：“地上的政权归君王，天上的政权归教皇。”“教皇的政权是太阳，君王的政权是月亮。象月亮要从太阳那里借光一样，君王要从教皇那里获得自己的政权。”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全力以赴地实践这种神权政治思想。当时各天主教国家之间及各国内部矛盾重重，整个西



教皇英诺森三世
批准圣法兰西斯法规

欧政治形势有利于教皇实现其政治野心，况且英诺森三世本人是个善于利用矛盾，玩弄权术的铁腕人物，所以他能获得较大的成功。

教皇的贪婪的手首先伸向德意志。当时德国皇帝亨利六世（红胡子腓特烈之子）刚死，两个贵族集团（威尔夫家族和霍亨斯陶芬家族）争夺政权，选出两名皇帝（鄂图四世和

腓力普)。英诺森三世故意挑动德国内战,自己坐山观虎斗。当双方打得两败俱伤时,教皇趁机将德国势力驱逐出意大利,收复了过去被德意志和意大利封建主侵夺的教皇辖地。当教皇在意大利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便直接介入德意志内部斗争,支持其中一派,为鄂图四世加冕。后因教皇与鄂图四世不和,则又宣布开除鄂图四世的教籍,并唆使法兰西国王出兵打败鄂图。随后,教皇一箭双雕,把他保护下的西西里王国幼主腓特烈二世推上德意志皇帝宝座。腓特烈二世有一半德国血统,一半意大利血统,其父是前德意志皇帝亨利六世,其母康士坦斯乃西西里王国的女继承人,所以他对德意志和西西里都享有王位继承权。由于英诺森三世是他幼年时的监护人,故腓特烈二世即位为德意志皇帝后便自称是教皇的封臣。英诺森三世达到了其预期的目的,他可以通过腓特烈二世左右德意志和西西里两国的政治。

英诺森三世在干涉德意志内政的同时,另一只手伸向英格兰。原来,英国政府与罗马教廷因主教叙任权问题进行过长期斗争,1106年双方一度妥协,曾商定:(1)英国的主教人选由国王指定,然后由大教堂教士选举,上报教廷,由教皇正式授职;(2)新任主教应以封臣身份向英国国王宣誓效忠。一个世纪后英诺森三世任教皇时,争执又起。1205年,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死亡,该大教堂教士背着英王约翰自选一名大主教,提请教皇授职。英王震怒,强迫坎特伯雷教士重新选一名国王中意的人,也同样报请教皇任命。教皇玩弄权术,竟然违反教廷与英国政府过去的协议,不顾国王指定的人选,

另委派多年在教廷任职的英籍神甫斯提芬·朗顿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英王约翰拒绝接受，于是教皇又祭起他的法宝，宣布废黜英王约翰，解除英国臣民效忠国王的誓约，甚至把英国的王位转授给法国国王。约翰不服，决心与教皇分庭抗礼，下令没收英国教会财产，以断绝经济往来相威胁，同时驱逐那些不服从国王的主教。但由于英国国内矛盾重重，约翰王在政治上十分孤立，加之教皇挑唆法国国王及苏格兰王对英国开战，使约翰陷于内外交困的窘境，终于在1213年向教皇屈服，承认朗顿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恢复教会财产，并承认英王为教皇的侍臣，每年向罗马教皇缴纳侍臣国贡赋1000英镑。

对于法国，因法国国王拒绝接受教皇驳回他的离婚案件，英诺森三世又祭起他的另一个法宝——发布“禁令”（停圣事），禁止法国境内举行一切宗教仪式，剥夺了全国臣民进行公共祈祷、领圣事和办理丧葬仪式的权利，引起全国臣民对国王的强烈不满，结果，法国国王只好暂时屈服于教皇。

此外，英诺森三世的魔爪还伸向其它天主教国家，除英国外，阿拉冈（西班牙东北部的一个封建国家）、葡萄牙、波兰、丹麦等国国王都先后被迫屈从他的意志，向他称臣纳贡。罗马教皇俨然是凌驾于欧洲各国君主之上的太上皇。

英诺森三世还利用其最高司法权来控制西欧各国。在中世纪，天主教会掌握着西欧各国的立法和司法机关的大部分职能。英诺森三世重新修订的《教会法》是当时西欧各国通用的法典；各国的教会法庭常凌驾于国家法庭之上；高级教士在

世俗封建主们的纷争中往往充当仲裁者；在罗马还设有教皇法庭，它实际上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法院，受理来自西欧各国的上诉案件。教皇可以借教皇法庭干预各国的内政，巩固罗马教廷的权威地位。

英诺森三世发动第4次十字军东侵，又组织十字军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异端运动，同时批准建立打破国界的托钵僧团体“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英诺森三世的直接继承者洪诺留三世甚至还委派托钵僧团体在西欧各地设立宗教裁判所（异端审判法庭），打着反对“异端”的旗号，残酷镇压市民和农民的反封建运动，迫害进步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教皇的这些活动更进一步加强了罗马教皇在整个天主教世界的政治领导地位。

总之，在十二三世纪时，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已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国际封建组织。在到处是封建割据的西欧，罗马教廷成为分散的封建势力的组织中心。英诺森三世时代，罗马教皇的权势已发展到顶峰，他以最高主宰者的姿态出现于国际政治舞台上，西欧各国的封建君主纷纷拜倒在教皇脚下。在教皇同德意志皇帝长达两个世纪的争夺权势的角逐中，教皇斗倒了皇帝，打垮霍亨斯陶芬王朝，促使德意志封建王权一蹶不振，长期陷入分裂割据状态。

然而从长远的历史趋势看，王权终将胜过教皇权，教会终将从属于国家权力。教皇权的鼎盛以及教皇权压倒王权只是暂时现象，英诺森三世时代的表面成就是极不巩固的。一进入14世纪，在新的权力斗争中，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斗倒

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罗马教皇便从其权势的顶峰猛然滑落下来。

十四五世纪时，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一些西欧国家内部的经济联系加强了，开始出现统一的国内市场，为民族国家的形成，为王权的加强奠定了经济基础。英、法等国的国王与新兴的市民阶级结成联盟，反对封建割据，加强国王的中央集权，同时也反对教皇干预他们的国内事务，力图摆脱教皇的控制和影响，于是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世俗君主与罗马教皇又展开新的角逐。

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为了削弱教会权力，起用一批世俗法学家充当法官，把一向操纵司法机关的教会神职人员排挤出去；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困难，他不顾教会历来享有的豁免权，向法国境内的教会和教士的财产征收捐税，并因禁抗缴捐税的巴密埃主教。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于1296年发布通谕，禁止一切世俗君主对该国的教会和神职人员征税。腓力四世对教皇的通谕置之不理，严禁法国金钱出境，切断了罗马教廷的一大股财源。同时，国王的法学家还制造舆论说，一国的教会应服从该国政府，它的财产应向国家纳税；教士犯法，应交国家法庭审理。另一方面，教皇一再重申，教皇是基督教世界之首脑，其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故教权高于国家政权，教皇应领导国王。教皇还派使节到法国，申明如国王不服从教皇，将要开除腓力四世的教籍。教皇还命令所有法国主教到罗马开会，研究法国教会的有关事宜。1302年，腓力四世召开法国历史上的第1次三级会议，会议支持国王，

并禁止法国主教到罗马开会。由于腓力四世在国内得到广泛支持，故在与教皇的角逐中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他不仅把教皇使节逮捕监禁，而且还派间谍罗加列到罗马，收买拉拢教皇的反对派贵族，把火烧到教皇的后院里去。1303年，卜尼法斯八世避居罗马附近的阿南尼城堡，罗加列带着一批武装人员闯入教皇住宅，对教皇进行辱骂和殴打。几周后，这位不可一世的教皇便离开了人世。人们形象地说，卜尼法斯八世“爬上教皇宝座时象只狐狸，他掌权时象一头狮子，而死的时候却象一条狗”！卜尼法斯虽然雄心勃勃，唯我独尊，步英诺森三世的后尘，拚命加强教皇权势，但此时教皇的对手已不是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而是王权业已强大起来的法兰西，教皇在西欧政治舞台上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305年，教廷的红衣主教团在腓力四世的压力下，选举波尔多大主教、法国人贝尔特朗·哥特(Bertrand de Got)为教皇，取名号为克雷门五世。这位新教皇仰承腓力四世的鼻息，于1309年把教廷从罗马迁至法国东南边境的阿维农城。从克雷门五世开始的7任教皇都居住在这里，前后共70年(1378年教廷迁回罗马)，史称“阿维农教皇”。

历代“阿维农教皇”都是法国人，他们受法国政府钳制，对法国国王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克雷门五世把卜尼法斯八世谴责腓力四世的通谕全部撤消，同意腓力四世对法国教会

征税。在处理“圣殿骑士团”^①问题上，教皇也按法国国王旨意配合行动。“圣殿骑士团”是法国国王的债主，法国国王欠下它大笔债款而未偿还。1307年，腓力四世以消灭“异端”为名对圣殿骑士团进行突然袭击，逮捕所有在法国的圣殿骑士，有的判处火刑，有的监禁，有的被驱逐出境；他们的财产全部被没收。1312年教皇正式宣布解散属于他管辖的“圣殿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在其他国家的财产也被那些国家的世俗王侯夺去了。法国国王达到了他的目的，消灭了债主，摆脱了债务，还夺得它的庞大的财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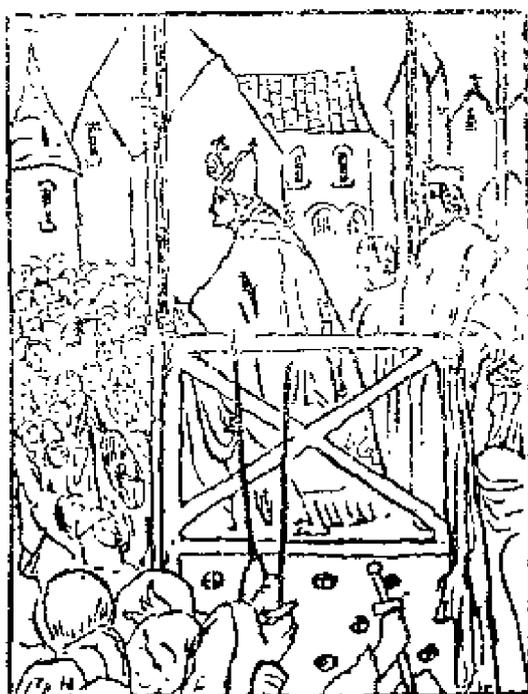
上述情况说明，教皇权势已经由盛而衰，在教皇与世俗君主的长期角逐中，最后的失败者是罗马教皇。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尽管罗马教皇与西欧世俗君主为争夺权势不断发生冲突，但二者相互勾结，共同对劳动人民实行专制统治，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天主教会不仅是西欧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也是西欧封建主对外侵略掠夺的工具。

① “圣殿骑士团”是十字军东侵时期建立的一个天主教军事修会组织。最初由几名法国破落骑士发起组织，1128年由教皇批准成立，总部设立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圣殿中，故名“圣殿骑士团”。这一组织是以保卫十字军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和保卫朝圣者的名义建立的，后来由于劫掠、王公贵族的捐赠和教皇给予种种特权而发财致富，成为欧洲早期的银行家之一。它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势力很大，引起国王和其它修会的不满，1312年被教皇下令解散（参见本书下一部分“十字军东侵”）。

五 “十字军东征”——教皇 发动的侵略战争

1095年秋，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从意大利来到法国南部的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大主教14名，主教和修道院长600名，其他还有封建主、骑士、商人和许多被驱使来的农民。会议结束那天，乌尔班二世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西欧基督徒组织起来，远征东方的“异教徒”，发动了一场历时近两个世纪的侵略战争——“十字军东征”。因为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每个十字军参加者都在衣服上缝有一个红十字作为标记，故名十字军。



“十字军东征”是罗马教皇煽动十字军东侵

教廷、西欧封建主和商人对中东地区进行的侵略性远征，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中海东岸的伊斯兰教国家。这场侵略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涂上宗教的色彩。罗马教廷以维护基督教之名，煽动基督徒反对穆斯林，号召他们从“异教徒”

中手“夺回主的陵墓”，“解救圣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境内，是座历史名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把这座古城奉为自己的圣地。基督徒依据《新约圣经》的神话，相信救世主耶稣曾进入耶路撒冷传教，并在该城遇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在这里“复活”“升天”，故耶路撒冷有所谓的“主的陵墓”，成为基督教的圣地。基督教诞生以前，耶路撒冷早已是犹太人的圣城。在古代，这里曾是统一的以色列——犹太王国和分裂后的犹太王国的首都，相传著名的所罗门王还在此地建造圣殿，故耶路撒冷是古代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后来，因连续遭受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国和罗马帝国等异邦的侵扰和蹂躏，多数犹太人逐渐流散异地。经过长期的历史变迁，巴勒斯坦的主要居民已不是犹太人而是阿拉伯人了。7世纪前半期，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上兴起，不久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均并入阿拉伯帝国版图之内。在这些地区，基督教和犹太教虽继续存在，但多数居民已信奉伊斯兰教。穆斯林依据神话传说，相信穆罕默德52岁时，曾在一个夜晚由天使陪同，乘“天马”从麦加飞至耶路撒冷，并在这里登霄，遨游七重天，参观了“天堂”和“火狱”，黎明前又从耶路撒冷乘“天马”飞回麦加。据称，耶路撒冷的“飞马墙”和萨赫来圆顶清真寺的巨石^①都与穆罕默德夜行登霄

^① 萨赫来清真寺中这块巨石长17.7米，宽13.5米，高1.2米。伊斯兰教称，穆罕默德踩着这块巨石，乘上天马升上七重天。于是穆斯林将此地视为圣地。“萨赫来”原意为“岩石”，该寺因此得名。

的神话有关；加之在623年以前，伊斯兰教曾一度以耶路撒冷作为礼拜朝向，所以该城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地之一。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将耶路撒冷视为自己的圣地，这种情况在古今历史上往往被某些别有用心 的政治势力所利用，他们制造矛盾，挑起事端，借以发动侵略战争。

本来，欧洲的基督徒到耶路撒冷朝圣，来去是自由的。虽然从7世纪起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带已归入阿拉伯帝国版图，但居于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对基督徒是宽容的。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基督徒成群结队，跋山涉水到耶路撒冷朝圣的人不绝于途。只在11世纪最后几十年间，情况稍有变化。1000年前后，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塞尔柱突厥人在中亚兴起，并不断西进。1055年占领巴格达，推翻阿拔斯王朝。不久后又从拜占廷帝国手中夺取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还占据了埃及法提玛王朝在亚洲的领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形成塞尔柱突厥帝国。但这个帝国的统一并不巩固，1092年后迅速分解为一些独立的封建领地。由于突厥封建主间不断进行混战，使一些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在兵荒马乱中遭到破坏，也给由陆路来的基督教朝圣者增加了旅途的困难，然而这种情况与宗教迫害无关，况且当时从海路来的基督教朝圣者仍可顺利到达圣城耶路撒冷。塞尔柱统治者并未迫害从西方来朝圣的善男信女，只向他们征收一定的捐税，这与西欧朝圣者途经基督教国家拜占廷时缴纳一定的过境税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基督徒所谓的“主的陵墓”那块地方，一直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可是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

人的目的，煽起宗教仇恨，夸大事实，甚至故意编造许多关于基督徒如何受塞尔柱人迫害的谎言，提出从异教徒手中“夺回主的陵墓”、“解救圣地耶路撒冷”的号召，发动了十字军东侵。

罗马教皇打着神圣的宗教旗帜发动侵略战争，近现代某些资产阶级历史家也赋予十字军东侵以宗教战争的性质，说它是两种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是“十字架反对新月^①”的战争；有的人还美化这场侵略战争，说十字军是为基督教的胜利而战，是中世纪西方人民深厚的宗教精神的表现云云。其实，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夺回主的陵墓”和“解救圣地耶路撒冷”，只不过是罗马教廷的一种蛊惑人心的口号而已。教廷利用这些口号，煽起基督徒的宗教狂热，驱使广大信众为教俗封建主的侵略和掠夺打仗卖命。促使罗马教皇和西欧封建主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不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立，而是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存在着的尖锐矛盾。

11世纪时，西欧各国城市兴起，国内外贸易发展起来，东方的各种精制商品源源不断运入西欧，西欧各国封建主的物质享受贪欲随之膨胀。但从封建领地上所得的剥削收入，远不能满足他们的奢望，于是他们时刻梦想占有更多的土地和财富。同时由于西欧封建主实行长子继承制，世袭领地全部传给长子，其余的儿子都成为“无地骑士”（光蛋骑士）。这些光蛋骑士从小过惯了奢侈豪华的生活，但没有继承遗

^① 伊斯兰教国家的旗帜上多半有“弯月”作为标志。

产，收入微薄，许多人债台高筑，从而干起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勾当。所以不论是有领地的封建主或是无土地的光蛋骑士都向往着到富庶的东方去发一笔横财。这是西欧封建主向东方侵略扩张的根本动因。

西欧的富商大贾，特别是意大利各城市（威尼斯、热那亚等）的商人之所以积极参与十字军东侵活动，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他们企图夺取东部地中海的商港和市场，挤垮竞争对手——拜占廷和阿拉伯商人，以便在地中海贸易中，稳操胜券，占据优势地位。

十字军前后共有 8 次大规模的东侵。在头几次东侵中，有相当多的西欧农民参加。农民参加十字军并不奇怪。9 世纪时，西欧封建制度最后形成。11 世纪时，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越来越重。他们除服劳役纳地租外，还要缴纳人头税、领主的养兵税、法庭税、市场税、桥梁税和教会的什一税等。沉重的税收，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同时封建主无休止地进行割据战争，无地骑士到处抢劫，自然灾害不断侵袭，农业生产严重破坏，饥馑连年。农民无以为生，有的外出逃荒，有的被迫起义，不少人渴望着摆脱困境，到那遥远的东方谋取一条新的生活出路。天主教会利用广大农民谋求新的生活出路的迫切愿望和虔诚的宗教感情，把他们吸引到东侵的队伍里来。这样，既可壮大十字军的力量，为封建主的侵略战争效力，又可将农民对封建主的不满情绪转移到东方的异教徒身上，这到一举两得的目的。

十字军东侵是由罗马教皇亲自发动的。在分裂割据的西

欧，封建主之间矛盾重重，没有一个世俗君主能够统一各国的骑士。由于罗马教廷是西欧封建统治的国际中心，因此，只有教皇才能充当十字军的组织者的角色，把西欧各国、各社会阶层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涌向东方。罗马教皇发动十字军东侵，一方面是迎合西欧封建主阶级掠夺土地财富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目的——即通过侵略战争增加教廷的财政收入，并进一步提高教皇的地位，扩大天主教会的势力范围。罗马教皇一向梦想充当世界霸主，既想征服地中海东岸的伊斯兰教国家，使穆斯林改宗；更想乘机控制拜占廷帝国及东正教会，建立其基督教世界的一统天下。1054年东正教会与天主教正式决裂后，罗马教皇的权势正步步上升。野心勃勃的教皇正在等待时机，有朝一日要把东正教会一口吞掉。

此时的东方局势恰恰对教皇实现其野心计划十分有利，拜占廷帝国日益衰落，其领土不断被塞尔柱人占领，首都君士坦丁堡也受到塞尔柱军队和其他异族军队的威胁。在这紧急关头，拜占廷皇帝亚历克塞一世不得不向罗马教皇和西欧各国君主求援。

拜占廷皇帝的求援，正中罗马教皇的下怀，给教皇发动侵略战争找到口实。十字军正是喊着“拯救东方的基督教兄弟”的响亮口号，举着“保卫基督教”的神圣旗帜踏上征途的。当然，拜占廷统治者万万没有料想到，他们向西方求援是引狼入室，因为十字军在侵占地中海东岸伊斯兰教国家之后，竟然把矛头指向自己的“东方基督教兄弟”，攻灭了

拜占廷。这是后话。

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利用拜占廷求援的大好时机，于1095年11月在法国南部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宣传鼓动组成十字军，拉开了十字军东侵的序幕。

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群众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煽起宗教狂热，制造民族仇恨。他说：突厥人已向你们东方的基督教兄弟发动进攻，“我们救主的圣墓被不洁净的国家占领、玷污”；他们“屠杀和俘虏了很多人，毁坏了许多教堂，正在上帝的国度中大肆蹂躏。”“由于这个缘故，我现在恳求你们，勸(xù)勉你们……我作为基督的使者向你们勸勉，督促一切等级的人——骑士、步兵、富人、穷人……”，“但愿你们彼此间不再争吵仇视，而共同踏上去圣墓的征途”，“从那个邪恶的种族手中夺回圣地吧！”教皇在演说中慷慨许愿，说凡参加十字军的人，一旦“丧失性命，他们一生的罪孽即将在那一瞬间获得赦免”，灵魂得救，升入永生的天堂。教皇还以现实的物质利益引诱人们出征，他绘声绘色地说耶路撒冷“是上帝曾经赐予以色列的后裔的”，那是“大地的中心”，“遍地流奶与蜜”，“其肥沃和富饶超过其它一切土地，如同天堂”；我们“这边所有的不过是忧愁和贫困，那一边有的是欢乐和丰足”。他既刺激大小封建主的发财贪欲，又诱骗家贫如洗的农奴，说参加东征可以得到人身自由和肥田沃土。教皇的鼓噪引起强烈的反响，与会的人们疯狂呐喊：“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旨意！”许多人当即在衣服上缝上一个红十字标记，表示愿意参加

远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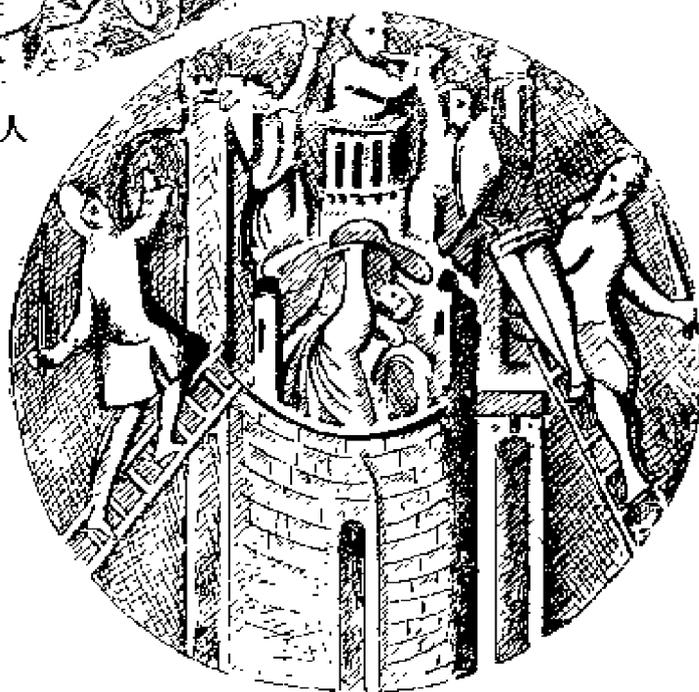
在教皇和天主教会的诱骗下，一些贫苦的西欧农民首先集结起来。他们多年来被饥饿和债务弄得走投无路，为了摆脱农奴制度的桎梏，迫不及待地要移居“东方乐土”建立新的生活。他们遗弃了低矮的茅屋，出售破旧的家具和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带着一家老小，有的步行，有的坐着双轮牛车，成群结队地踏上“征途”。他们等不得骑士队伍的集结，提前几个月出发了。1096年2月，法国北部、中部以及德意志的首批农民队伍，沿着莱茵河、多瑙河向亚洲进发。随后还有几批来自西北欧、英国和西班牙的穷人队伍。这些农民队伍，既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又缺乏武器装备和粮饷，并且拖儿带女，队伍里还夹杂着一些光蛋骑士和流氓无赖。他们一路走，一路抢劫，因而遭到保加利亚和拜占廷的激烈反抗，所以在行军途中便被消灭大半，剩下的三四万人于夏末到达君士坦丁堡。拜占廷皇帝为了避免他们在这座富丽堂皇的京城抢劫，不等主力部队（骑士队伍）到达便匆忙把他们送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支杂乱的农民十字军一踏上小亚细亚的土地，便被突厥人围歼，大部阵亡，能保全性命逃回欧洲者不过3000人而已。数以万计的西欧贫苦农民就这样被罗马教皇引上灾难的道路，白白送死，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第一次十字军东侵的主力部队是法、德、意8国的骑士十字军。他们从1096年秋天出发，分4路行军，1097年春在君士坦丁堡会合，总数不下10万之众。他们会师不久，便渡过海峡攻陷突厥人罗姆素丹国的首府尼西亚；随后穿过小亚

细亚占领爱德沙；1098年攻陷安提阿克；1099年7月15日最



十字军追击塞尔柱人



十字军击打安提阿克

后占领耶路撒冷。十字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他们攻进耶路撒冷后，7万居民尽遭杀戮，全城的金银财宝被抢劫一空。据弗尔舍·沙特尔《耶路撒冷史》记载：

“没有一块地方萨拉森人（即阿拉伯人）可逃避刽子手的屠杀。其中很多人被射死在所罗门的屋顶上……又有很多人从屋顶滚下。在这庙里，屠杀了将近万人”。“如果你站在那里的话，你的脚直至大腿上，会染着死人的鲜血。还有什么可说？他们中谁也不能保持生命。妇女与幼孩，均不得幸免。”那些贪财的骑士们还“剖开死人的肚皮，为要取出他们生前吞下的金币……”由于死人太多，他们便“把尸体堆积起来，然后烧为灰烬，以便容易找到这黄金。”“在这样大流血之后，十字军士兵散到市民的住宅中去，占夺住宅中的一切东西……很多穷汉遂变为富翁。”又据歧柏特记载，一个十字军统领在东侵中大发横财，说他的“金条和金币在库房里堆积如山，好象农民茅屋里的萝卜青菜”。十字军在“圣城”的野蛮暴行，证明了保卫“圣地耶路撒冷”这面宗教旗帜只不过是西欧封建主侵略掠夺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十字军的头目们在他们占领的地中海东部海岸地区，先后建立起4个封建国家，即爱德萨伯国、安提阿克公国、耶路撒冷王国和的里波里伯国。这几个封建国家，一概按西欧的封建制度组建而成：各国的领土均分为若干男爵领地，男爵领地之下再分为许多骑士采邑，十字军的骑士都成为这几个新建国家的大小封建主。封建主把西欧封建农奴制度强加给东方各族人民。凡本地居

民，不论是阿拉伯人、犹太人，或是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不论是穆斯林、犹太教徒，或是东方基督徒，通通沦为这些西欧骑士的农奴。他们既受残酷的剥削，又受民族压迫与宗教歧视之苦，故对十字军封建主恨之人骨，常揭竿而起，进行反抗。

天主教会十分关注十字军国家的巩固，罗马教皇亲自批准建立几个“僧侣骑士团”，派往东方。其中有主要由法国人组成的“圣殿骑士团”、主要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医院骑士团”以及主要由德国人组成的“条顿骑士团”。这些骑士团是天主教的军事组织，成员多是西欧各国的骑士，按天主教修会的样式组成。入团以后，同修士一样不得结婚成家，必须严守僧侣清规，绝对服从上级。各骑士团直属教皇领导，执行军事任务，从西欧派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镇压当地居民反抗，维护十字军国家的统治。

然而，十字军国家并不因此而巩固。12世纪前半期，突厥人的各素丹国开始团结起来，收复失地。1144年，摩苏尔总督率军占领爱德萨伯国，威胁安提阿克。耶路撒冷向西方求援，西欧各国骑士在教皇赞助下组织第二次十字军东侵（1147—1149年），但失败而归。

12世纪后半期，阿拉伯民族英雄萨拉丁（1138—1193年）自称素丹，把一些伊斯兰教小国统一起来，以埃及为中心建立阿尤布王朝。这个新国家曾强盛一时。萨拉丁率军多次击败十字军国家，1187年活捉耶路撒冷国王和圣殿骑士团团团长，同年又光复耶路撒冷，使十字军领地大大缩小。耶路撒

冷陷落的消息，尤如一个晴天霹雳，使西欧封建统治者们心惊肉跳。教皇乌尔班三世（1185—1187年在位）闻此凶讯，惊愕而死。新教皇格列高里八世一上台，立即号召组织第三次十字军东侵（1189—1192年）。

第三次十字军东侵的头领是西欧 3 个大国的封建君主——德意志皇帝红胡子腓特烈、英国国王狮心理查和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他们同床异梦，各行其是，而且与拜占廷也有矛盾。拜占廷虽是个基督教国家，但它的当权者对西欧三国贪婪的骑士怀有戒心，暗自与萨拉丁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十字军。1189年 8 月，德国十字军约 3 万人最先出发。他们通过拜占廷领土时，沿路抢掠，引起当地居民的忿恨。拜占廷政府则在途中设置障碍，使十字军通行困难，直到1190年 3 月底才横渡海峡进军小亚细亚。在小亚细亚，十字军一路上不断受突厥人的袭击，拜占廷又拒不接济粮草。他们在炎热和饥渴中行进，人马困乏。1190年 6 月，在行军渡河时，年过花甲的德意志皇帝红胡子腓特烈落水溺死，德国十字军遂迅速分解，大部分人未到巴勒斯坦便半路返国了。

英、法两国十字军出兵较晚，1191年才到达地中海东岸地区。由于两国矛盾尖锐，一面联合作战，一面明争暗斗，故十字军除攻下阿克、雅法等几个港口城市外，别无所获。最后，不得不与萨拉丁妥协：承认耶路撒冷归属埃及；十字军仅保留从推罗到雅法的狭小的海滨地带，并获准基督徒进入耶路撒冷朝圣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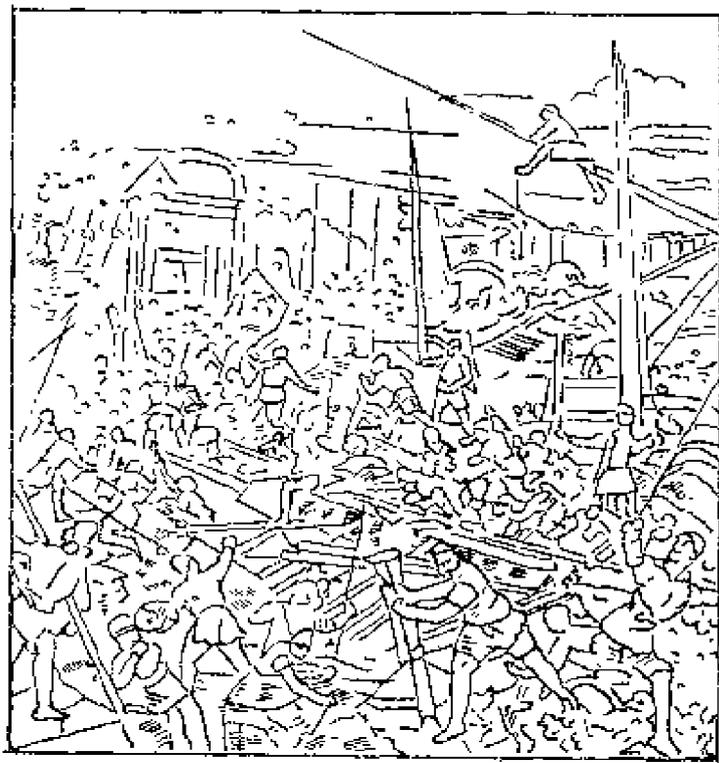
第三次十字军兴师动众，却徒劳无功。此后，西欧封建

主仍念念不忘他们失去的东方“天堂”，策划着卷土重来。13世纪初，由教皇英诺森三世出面，号召组织第四次十字军东侵（1202—1204年）。由法国国王和德意志皇帝共同推荐孟菲拉侯爵卜尼法斯为东侵的首领。这次十字军的原订计划是从意大利启程，渡海南下，进攻埃及，捣毁阿尤布王朝的心脏，再夺取巴勒斯坦，重建耶路撒冷王国。然而十字军的参加者各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在威尼斯商业贵族和罗马教皇的影响下，十字军放弃进攻埃及穆斯林的计划，而把进攻矛头转向基督教国家拜占廷。

十字军渡海作战，非依靠威尼斯提供航船不可。但由于威尼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保持着频繁的贸易联系，不愿与埃及为敌。与此相反，由于拜占廷竭力排斥威尼斯商人，到12世纪末，两国关系恶化。威尼斯贵族为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企图借助十字军的力量狠狠打击拜占廷。于是他们施展各种手段促使十字军改变主攻方向。威尼斯商人的意图正好符合罗马教皇的心意。这时罗马教皇的权势已发展到顶峰，显赫一时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在西欧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充当霸主角色。他认为，吞并东正教会和控制拜占廷帝国，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恰巧这时拜占廷国内发生王位之争。1202年春，失势的一派请求罗马教皇援助他们打倒“僭位者”，交换条件是愿将东正教会奉献给教皇。精明的罗马教皇决不坐失良机，立即授意十字军出兵“帮助”拜占廷的“合法”继承者登上皇帝宝座。十字军头目和威尼斯商业贵族进行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后，决定立即向拜占廷进

军。

1203年6月，运载十字军的威尼斯船队突然出现在拜占



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

廷首都君士坦丁堡城下。1204年4月12日，十字军攻破城门，冲入城内。次日，君士坦丁堡全部落入敌手。这些穷凶极恶的西欧骑士在这座繁华的古城里任意烧杀抢掠。随军的天主教神甫也脱下法衣，加入骑士们的行列。他们明火执仗，冲进王宫、教堂、修道院、仓库和私人住宅，奸污妇女，抢劫财物。不论是金银财宝，或是教堂祭器和艺术珍品，凡能携走的就洗劫一空，不能带走的则砸烂或烧毁。结果，许多历史悠久的古代建筑和雕刻横遭破坏，藏书丰富的

君士坦丁堡图书馆化为灰烬。经过这场浩劫，十字军的战利品堆积如山，而这座自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来就繁荣昌盛的千年文化古城却毁于一旦，变成满目疮痍的废墟！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十字军进一步征服拜占廷帝国的大部分领土。这时，他们把收复圣地耶路撒冷的计划抛到九霄云外，而将“东方的基督教兄弟”踩在脚下，在拜占廷这个“上帝的国度”建立起十字军统治的“拉丁帝国”（1204—1261年）。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积极支持它，派红衣主教出使君士坦丁堡，并派天主教神父去接管各地教堂，甚至不惜使用暴力强迫东正教徒改奉罗马天主教。然而，十字军始终不能压服东正教徒，拜占廷人民不断进行武装反抗。1261年，拉丁帝国被推翻，被十字军一度攻灭的拜占廷帝国得以恢复。

第四次十字军东侵虽照旧打着“圣战”的宗教旗帜，但既没有进军巴勒斯坦夺回“主的陵墓”，也没有进攻控制耶路撒冷的埃及阿尤布王朝，却去征服信仰同一上帝的国家拜占廷。铁的事实表明，十字军“保卫基督教”是假，到东方进行侵略和掠夺才是真！

在“十字军东征”史上，还有一段千古奇闻，那就是“儿童十字军”的故事。

第四次东侵以后，十字军运动逐渐转入低潮。这时，天主教会别出心裁，散布一种迷信观念，说成年人身上多有罪孽，难以完成解救圣地耶路撒冷的任务，只有“纯洁无瑕”的儿童，能凭其虔诚信仰得到“神恩”，感动上帝创造“奇

迹”，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墓”。于是，一个年方12岁的法国牧童司提芬粉墨登场了。1212年3月，他来到巴黎的一座修道院，宣称自己是上帝的“使者”，说上帝在他“梦中显现”，指示他统率儿童十字军去解救“圣地”。在教会积极赞助下，这位少年“先知”由一队骑马的卫兵簇拥着，坐着马车到各地招摇撞骗，向听众吹嘘他是“受命于天”的，所以“大海在他面前会分得开”；他能“如履平地一样在海面上行走”，前去收复圣地。这种欺骗宣传迷惑了不少人，仅3个月时间，就有3万名受骗的儿童愿意走上去“圣墓”的道路，聚集于法国南部的马赛港。唯利是图的高船主答应载送儿童十字军飘洋过海。在航行途中，有两艘大船在飓风中沉没海底，其余5艘船虽安全驶抵埃及，但船上这些年幼无知的“基督战士”却被黑心的船主全部卖作奴隶。同年，德国也组成一支有两万名儿童的十字军。他们由科隆出发，沿莱茵河向南行进，翻越阿尔卑斯山……在途中，有2/3的儿童饥渴而死，剩下的人虽历尽艰辛，到了意大利，但不久即溃散了。由天主教会导演的“儿童十字军”这齣闹剧就此收场。

此后，罗马教皇和西欧封建主又组织了4次十字军东侵，第五次（1217—1221年）、第六次（1228—1229年）和第七次（1248—1254年）都是进攻埃及；第八次（1270年）是侵略突尼斯，但都失败而还。到1291年，十字军在东方强占的土地丧失殆尽，教皇发动的这场历时近200年的战争，以侵略者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高居于西欧封建社会顶端的罗马教皇，不仅发动十字军

侵略东方各国，还利用十字军这一反动工具镇压西欧各国人民的反封建运动。在下一段历史中，读者将进一步清楚看到这些基督教卫道士的狰狞面目。

六 “异端”运动的兴起 和官方教会的镇压

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篇章里，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往往打着宗教旗帜，以基督教的“异端”运动形式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历史现象呢？因为罗马天主教会是西欧封建制度的社会支柱：（1）它的教义和神学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给封建制度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2）天主教会本身便是大封建主，高级教士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3）当时的“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由此可见，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962年中文版第33—34页）。由于基督教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广大群众都是基督徒，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第251页)。所以中世纪农民或城市市民的反封建斗争通常采取基督教的“异端”运动的形式。

所谓的“异端”是基督教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派别对异己派别或异己分子的贬称。在西欧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会声称，凡拒绝接受天主教正统教义或拒不承认教会、教皇的权威的，都是“异端”。反抗封建压迫的农民或市民，他们蔑视正统教义，撇开正统教会，独树一帜，自成一派，与天主教会相抗衡。他们被天主教会判为“异端”，遭受官方教会的镇压和迫害。因而“异端”教派与正统教派的矛盾斗争便成为欧洲中世纪社会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基督教异端教派与正统教派的斗争贯穿整个封建社会。早在封建社会初期，东方基督教中便产生保罗派异端运动。

七八世纪时，拜占廷帝国的封建关系逐渐形成。官僚贵族和僧侣贵族不断兼并农民土地，自由农民失去人身自由，沦为教、俗封建主的农奴，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在小亚细亚一带便产生了反对封建主剥削压迫的保罗派。保罗派成员多半是农民和城市市民。他们抗交赋税，拒服兵役，同时反对正统教会，要求恢复原始基督教时代那种教徒间的平等关系，民主选举长老，通过宗教的平等实现社会的平等。他们的教义思想深受摩尼教^①影响，认为世界分为两部分：一是上

^① 摩尼教是产生于伊朗的一种古代宗教，3世纪时由摩尼所创。其教义带有善恶二元论性质，称宇宙中有善神(光明之神)与恶神(黑暗之神)在不断斗争；世界原由善神所创造，但已被恶神腐蚀侵袭；善人死后可获得幸福，恶人则须堕入地狱受苦。摩尼教7世纪时传入中国，亦称“明教”。

帝的王国，即是善；一是魔鬼的王国，即是恶。他们说正统教会及其庞大的财产属于魔鬼的王国，所以极力反对正统教会的教阶制度，否认主教和神甫的权力；反对教会拥有庞大财产和教士的奢侈腐化行为；主张简化宗教仪式和取消修士制度等。保罗派的观点在拜占廷帝国各阶层人民中得到广泛响应。8世纪前半期，演化成大规模的“圣像破坏运动”。他们要求废除崇拜圣像和圣徒遗骸的陋习，因为它是正统教会扩大影响和聚敛钱财的重要手段。

当时在拜占廷帝国左右政权的军事贵族，嫉妒教会的富有，企图借机夺取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便参加到人民大众的运动中来。726年，皇帝利奥三世为满足军事贵族的要求，禁止偶像崇拜，下令拆除一切圣像，并惩治圣像崇拜者。后来的皇帝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在位）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使全帝国教堂中的圣像几乎全部被清除；同时下令没收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分配给军事贵族；封闭寺院，强迫修士结婚，把修道院改为一座座帝国的兵营。上述政策措施加强了军事贵族的地位，给正统教会（拜占廷教会）以沉重打击，也使西方的天主教会上层集团感到震惊。这时，西欧的天主教会同东方的拜占廷教会尚未决裂。不仅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为首的拜占廷教会拚死反对“圣像破坏运动”，而且罗马教皇也声嘶力竭地谴责这一运动，以开除教籍的办法威胁反对圣像崇拜的人。因而在拜占廷帝国的统治阶级中遂分裂成拥护圣像者和反对圣像者两大派。

皇帝和军事贵族对保罗派群众改革教会的要求并无支持

的诚意，占夺教会的土地财产才是他们的目的。当这批军事贵族变成大地主后，便疯狂奴役和掠夺领地上的农奴。821年，小亚细亚地区爆发以托马为首的农民起义，反抗封建主的压迫剥削，保罗派群众大部分参加了起义行列。起义军声势浩大，甚至把首都君士坦丁堡包围了1年之久。帝国政府靠分化瓦解政策和吁请保加利亚王国援助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面对着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拜占廷帝国政府力图迅速弥合统治阶级内部因圣像破坏运动而引起的裂痕。843年，摄政的皇太后狄奥多拉制止圣像破坏运动，并召集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恢复圣像供奉。于是军事贵族与拜占廷教会和解，携手合作，共同镇压保罗派群众。9世纪后期，保罗派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泰夫里卡地区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他们曾多次打败官军，并一度建立共和国。拜占廷帝国政府经过多年苦战，竭尽全力终于攻占起义运动中心泰夫里卡。人民起义虽失败，然而保罗派异端运动的火种并未被扑灭。10世纪时，它的思想从小亚细亚流传到巴尔干，汇合入保加利亚农民异端运动中。

9至10世纪，基督教成为保加利亚的国教。这时，保加利亚封建关系业已形成，教会成为封建大地主之一。教、俗封建主不断兼并农民土地，破产的自由农民逐渐失去人身自由而普遍农奴化。农民群众无法忍受教、俗封建主的横征暴敛，或流亡他乡，或揭竿而起，杀死地主，毁其庄园……不断高涨着的反封建斗争以波高美尔异端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波高美尔派（或译称“鲍格米勒派”，又名“神恩派”）

是10至13世纪间流行于保加利亚的基督教异端教派。他们自称“波高美尔”，其原意为“爱上帝者”。该派教义思想是保罗派的继续发展，他们相信上帝生2子，一是耶稣基督，另一是撒旦（魔鬼）；耶稣基督代表善，撒旦代表恶，善与恶在不停顿地斗争；人世间的压迫剥削是恶的产物，终将被善所消灭。因此，他们反对正统教会的封建特权和剥削，主张没收和分配教会土地财产；反对教阶制度和各种圣事（只保留婚配礼），主张恢复原始基督教的平等。10世纪时一名敌视波高美尔派的神甫科兹玛曾说，波高美尔派“教导本派信徒不要服从政府当局，谴责富人，仇视国王，谩骂长老，责备领主，认为替国王效劳是卑鄙的；他们教唆奴隶不要为自己的主人做工”。保加利亚教、俗封建主因此惶惶不可终日，对这一异端教派进行血腥的镇压。许多波高美尔派信徒被迫流亡国外，该教派的思想也随之传播到东南欧各国，甚至流传到西欧，给予法国一带的阿尔比派异端运动很大影响。

11至13世纪间，反封建的异端运动在西欧形成高潮，出现著名的阿尔比派异端运动。

中古中期，西欧地区形成异端运动的高潮是与城市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有着密切联系的。10至11世纪，西欧各国城市陆续兴起。新兴的城市力求摆脱封建领主的控制和取得自治权，城市市民及平民便同本地区的封建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许多教区主教就是城市所在地的封建领主，由于他们站在城市自治运动的对立面，故正统教会便成了众矢之的。从11世纪起，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等城市经济较发达的地

区，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异端运动显得特别活跃。他们的斗争矛头从揭露教会的腐败，发展到否定某些教义、仪式，甚至否定教皇的神圣地位。他们的斗争方式也从秘密宣传发展到公开的对抗。

12世纪后半期，在法国南部出现了一个异端教派——韦尔多派。他的创始人韦尔多原是里昂城里一个家财万贯的富商。据说他为了反对教会的腐化，主张赤贫，便从《圣经》里寻找理论依据。《马太福音》第19章记载着耶稣曾教训一个少年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他身体力行耶稣的“遗教”，变卖全部家产分给穷苦百姓，并组织一批穷教徒自由传道。他和他的门徒仿效耶稣和使徒的榜样，过着简朴生活，布衣蔬食，穿着木鞋，从一地走到另一地，不带行囊，无固定住所，食宿全靠广大信徒的布施，故人们又把韦尔多派称为“里昂穷人派”或“木鞋派”。起初，他们的宣传只限于过清贫生活、反对神职人员的腐化，还没有否定罗马天主教会。后来，由于罗马教皇禁止该派自由讲道，并将他们逐出教门，他们只得自行建立组织，订立自己的圣礼仪式，进行秘密活动。从此他们开始否定教会的权威，否认教会对拯救信徒的灵魂的“特殊作用”，声称斋戒、弥撒、祷告和施舍对死人获救毫无益处，同时还鼓动群众拒绝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尽管韦尔多派遭到教会的取缔和镇压，但继续传播着，除一部分信徒并入阿尔比派中以外，还传至意大利北部，并在瑞士西南部和萨伏依山区的农民中广泛流行，后来更传到

西班牙、捷克等地区，16世纪汇合入宗教改革的洪流中。

与韦尔多派同时，在西欧出现另一个更为强大的异端教派——阿尔比派。阿尔比派主要盛行于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地区，因阿尔比城是他们的活动中心，故名。阿尔比派和前述的波高美尔派都属于卡特里派（纯洁派）的分枝，故二者的思想极近似。阿尔比派相信善恶二元，善神创造灵魂，恶神创造肉身，肉身束缚灵魂，故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将灵魂从罪恶世界中解放出来。他们说现实世界里的一切都是恶神创造的，天主教组织及其财产本身就属于罪恶世界，教皇本人就是个魔鬼，故不承认正统教会能使人得救，否定天主教的一切礼仪，实行一种“安慰礼”^①。他们还主张取消教会及修道院。阿尔比派的思想观点实质上是苦难群众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一种抗议。他们的观点得到城镇市民及平民的热烈响应，法国南部的一些中、小贵族为要夺取教会土地财产也参加到运动中来。到12世纪后期，阿尔比派信徒与韦尔多派逐渐合流，他们在法国南部人多势众，甚至压倒正统教会。当时天主教著名的神学家、克莱沃修道僧伯尔纳颇有感触地叹息说：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地区，“教堂里没有信众，信众没有神甫，神甫不受尊重，基督徒不信基督，圣地不再圣洁，圣事不再神圣，节期无人遵守，儿童不受洗礼……”天

^① 阿尔比派施行的“安慰礼”是由主礼者对受礼者按手后，将《约翰福音》放在受礼者头上，表示圣灵已降临他身上，罪已赦免，获得拯救，成为“全徒”（完全人、义人）。在法兰西，“全徒”又称为“善人”（bons hommes）。

主教会在那里的统治几乎濒于崩溃的边缘。

12世纪后半期，异端教派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迅速发展，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封建运动，教、俗封建统治者感到极度恐慌，特别是教皇如坐针毡。1179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召集宗教会议，宣布对阿尔比派及其同情者处以绝罚，但不能制止异端运动的发展。英诺森三世继任为教皇后，便对阿尔比派实行暴力镇压。1209年，他依靠具有掠夺欲望的法国封建主，组成讨伐阿尔比派“异端”的十字军。十字军头目是教廷使节亚马利克和法兰西北部的封建主西门·德·孟福尔男爵。

南侵的十字军遭到阿尔比派的顽强抵抗，他们苦战4年（1209—1213年）才占领了法国南部。当十字军攻陷比塞埃城时，难以辨别谁是天主教徒，谁是阿尔比派“异端”分子，教皇特使便指示说：“把他们全部杀光，让上帝去分辨谁是他的子民。”这伙杀人匪帮冲进城后，“不管身份，不管年龄，不管性别，一律都不饶，死于刀下的几乎有两万人……整个城市被劫掠和烧毁”。十字军每占领一地，随军的修道僧都把被指控为“异端”分子的人处以火刑。

但人民不可侮。尽管十字军占领了法兰西南部地区，阿尔比派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1218年图卢兹地区爆发起义，恶贯满盈的十字军头目西门·德·孟福尔被起义人民杀死。南下的封建主们不得不向法兰西国王求援，于是从北方开来新的讨伐军，又经过多年的战争，才完全征服法兰西南部土地，并将它并入国王的领地之内。

为了维持天主教会在西欧的封建统治，教皇还批准建立两个修道僧团体——“方济各会”（法兰西斯派）和“多明我会”（多米尼克派），作为镇压异端运动的特殊政治工具。13世纪初，这两个修会刚成立时，规定不置土地产业，其成员麻衣赤足，周游各地，以乞食为生，故人称“乞食僧团”或“托钵僧团”。他们混入各阶层群众中，宣传所谓“济贫福音”，标榜赤贫，以挽回教会威信。同时，方济各会重视办慈善事业，企图以小恩小惠拉拢社会下层群众；多明我会则注重办教育和远出传道，企图把阿尔比派信徒争取过来，重新皈依天主教。罗马教皇批准成立托钵修会的目的，不仅利用他们从思想上瓦解“异端”运动，而且把他们作为异端审判法庭的骨干。多明我会成立不久，即受教皇委派，主持西欧各地的异端审判法庭。

“异端审判法庭”亦称“宗教裁判所”，它是天主教会侦察和审判“异端”分子的机构。罗马教皇洪诺留三世（1216—1227年在位）鉴于各地主教镇压“异端”不力，于1220年通令建立异端审判法庭。1233年，教皇格列高里九世（1227—1241年在位）再次强调上述措施，此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纷纷成立起这种机构。各地的异端审判法庭，直属教皇，审判官由教皇任命和管辖，地方主教和世俗政权不得干涉。多明我会修道僧主持异端审判法庭，充当教皇的忠实鹰犬，残酷屠杀人民。他们双手沾满鲜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称是“主的猎狗”。有意思的是“主的猎狗”一语的拉丁文“domini canes”与多明我会的拉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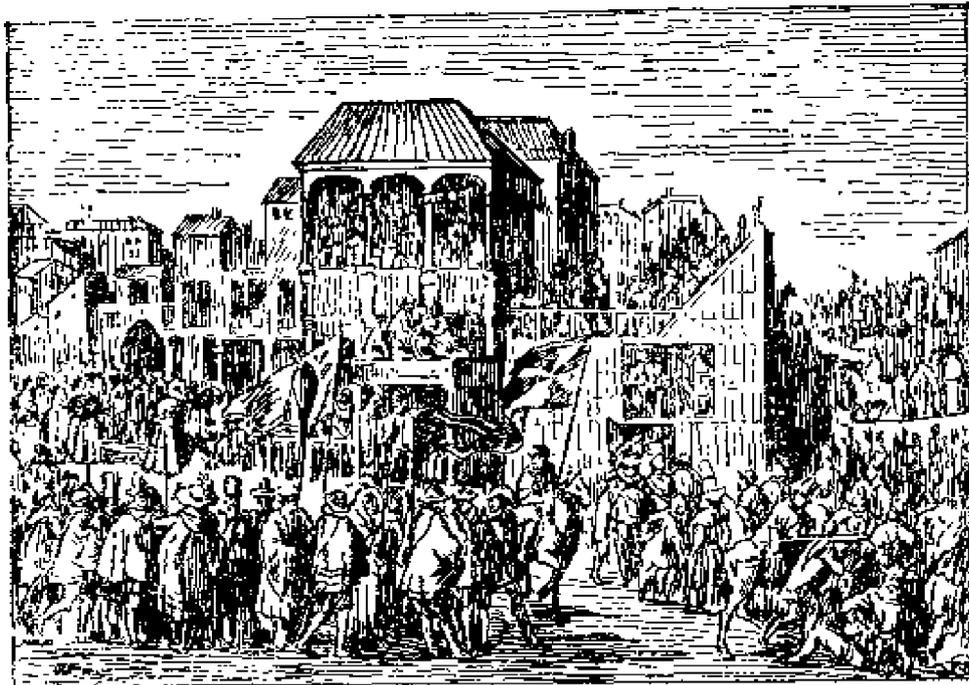
宗教裁判官红衣主教

斐南多·宁奥·德·古叶伐拉像

世俗政权执行，被判死刑者是在火刑柱上烧死。凡被定为“异端”的人，财产一律没收。按意大利的惯例，没收的财产 $1/3$ 归告密者， $1/3$ 归异端裁判所， $1/3$ 归当地的行政官员。所以不仅宗教法庭的审判官能够借迫害“异端”而增加收入，告密者也可以专门于诬陷别人的勾当而发财致富。这样一来，不仅大批革命者在火刑柱上被夺去生命，即便是虔诚的信徒，只要被人诬告，随时都会大难临头，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会名Dominicani语音十分近似。

异端审判法庭可以说是西欧封建社会中最黑暗的场所。这种机构设在各地的修道院里，有监狱和刑讯室。法庭随意抓人投入黑牢。审讯是秘密进行的，不让被告人知道原告和证人的姓名；审案以假定有罪为出发点，只许别人检举，不许本人申辩，一切有利于被告的证词均不能成立，因此法庭任意罗织罪名，严刑逼供，强迫认罪，屈打成招。无论何人，一旦被指控为“异端”，就难于幸免。法庭判决后，交



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

罗马教廷虽然用尽一切罪恶手段残酷镇压阿尔比派，但不能制止异端运动的蔓延。14至15世纪间，在英国，特别在捷克，又出现异端运动的新高潮。

七 威克里夫——“宗教改革的启明星”

14至15世纪，欧洲城市的工商业有进一步的发展，在某些先进城市里“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2页）。近代资产

阶级的前身——城市市民的力量逐渐壮大，强烈要求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由于封建剥削的加深，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与此同时，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日趋腐败，更激起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对。14世纪后半期，首先在英国产生宗教改革的思潮；到15世纪上半期，捷克人民掀起了反抗德意志封建主和天主教会的群众运动，即胡司战争。

宗教改革思潮最早出现在英国，决非偶然现象。因为在英国，不仅社会下层群众极度憎恨压迫剥削他们的教会封建主，连国王及国会也对教会不满。教会占有大量土地财产，不仅不向国家纳税，还把搜刮来的大量金钱运出英国，送交罗马教廷。而且，自英王“无地约翰”时代起，英国成为教皇的侍臣国，每年要向教皇缴纳1000英镑的侍臣国贡赋。当英国王权强大起来后，国王力图使英国及英国教会摆脱教皇的羁绊。特别自1309年起，教廷迁至法国边境的阿维农，接连7任教皇都是法国人，教皇事实上成为法国国王的傀儡；而英、法两国是多年宿敌，势不两立，所以当英吉利民族意识开始形成时，英国人更加憎恨教皇。英王爱德华三世在国会支持下，于1353年宣布禁止英国臣民将诉讼案件移交教皇法庭，不论初审或复审，只能由国家法庭审理，外国法庭不得干涉；英王还禁止英国金银流入阿维农教皇金库。英国的世俗贵族支持国王反对教皇，因为他们希望夺取教会地产来扩大自己的领地。所以在英国，从王公贵族到市民和农民群众，都普遍对天主教会不满。在这种背景下，英国较早地出

现宗教改革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克里夫。

约翰·威克里夫（1324——1384年）生于英国约克西尔，曾就学于牛津大学巴略勒学院，毕业后任教授并一度任过该院院长。1374年他被国王委任为卢特威司教区长，并任



约翰·威克里夫像

国王侍从神甫；同年，又奉命出使，作为英王代表与教皇代表在布鲁日进行谈判，解决英王与教皇之间的分歧（如教会神职的任命权问题及侍臣国贡赋问题等）。此次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从1376年起，威克里夫公开抨击天主教会及教皇，反对教皇干涉国家政权，反对教会占有大

量土地财产，积极支持兰开斯特公爵发动的没收教会财产的运动。

威克里夫的言论严重危害天主教会的利益，1377年，伦敦主教传讯威克里夫，但在国王及贵族支持下他拒绝到教会法庭受审。同年，教皇格列高里十一世连发5道谕旨，责令坎特伯雷大主教缉拿法办威克里夫，但牛津大学教授声援他，伦敦市民集会拥护他，英王及贵族庇护他不受逮捕，天主教会始终奈何他不得。

恰在这时，天主教会面临着新的危机。1378年，格列高里十一世一死，天主教出现两个教皇并存的局面，一个住阿维农，另一个住罗马。两个教皇都自称正统，天天互相对骂，宣布开除对方的教籍。他们各有各的教廷，各有一班人马。西欧任何一个地方主教或修道院长空缺时，两个教皇都同时派人去接任，两个教廷又同时向各天主教国家征收捐税。一部分天主教国家政府支持阿维农的教皇，另一部分天主教国家又支持在罗马的教皇，整个天主教世界陷入大分裂局面，于是教会在群众中的威信急剧下降。威克里夫趁此时机，用拉丁文及英文撰写文章，积极宣传自己的宗教改革思想。

首先，他反对教皇权力至上论，支持国王维护英国的主权。他认为国王的权力来自上帝，并非来自教皇；没有教皇，教会同样可以存在；广大教徒群众才是教会的主体，教皇充其量是教会的名誉会长而已；如果教皇醉心于攫取最高世俗统治权力，凌驾于国王之上，并聚敛钱财，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为“基督把恺撒的物归给恺撒，并不觊觎世俗权力，而教皇却反其道而行之，故他不是基督的代理人，而是敌基督^①了”。威克里夫提出明确主张：英国教会应脱离罗马教廷的控制，隶属于本国政府，成为国家教会；英国的大主教不能由外国人担任；英国的财富不能流入教皇金库；教会可以用本民族的语言作礼拜。

① “敌基督”意为反对基督者，尤其指打着基督旗号反对基督的假基督徒。

第二，他目睹教会的腐败和弊端，认为真正的教会应该是廉俭的教会，应该遵循“福音书的律法”，实践使徒时代的简朴生活；反对教会拥有庞大的土地财产，并认为教会征收的什一税应改为自愿捐献。如果神职人员生活腐化，任意挥霍教会财富，那么，国王和贵族剥夺教会的财产便是合理合法的。

第三，为了使教会变成廉俭教会，威克里夫主张简化宗教仪式。他大胆批判天主教正统的神学理论，攻击“化体说”（亦称“变体论”，即在领圣体仪式中的无酵面饼和葡萄酒转化为耶稣的“圣体”和“圣血”的说法），同时抨击弥撒仪式中俗人仅能领“圣体”而把“圣血”留给教士的不平等做法。他也否认秘密忏悔、崇拜圣像等礼仪，并认为任何一个善良公正的俗人都可以同教士一样接近上帝，无须通过教士的帮助便可获得上帝的恩赦。他还认为，在信仰上，最高权威不是教会，而是《圣经》。为了方便广大群众阅读和理解“福音书的律法”，他亲自将《新约全书》由拉丁文译成英文，随后他的弟子又将《旧约全书》译成英文。

威克里夫的思想主张明显地反映了市民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恩格斯认为他是中世纪城市异端的杰出的代表。“城市异教——这才是中世纪真正公开的异教——主要是反对僧侣，攻击他们的富有和他们的政治地位。正如现在的资产阶级要求一个廉价的政府一样，中世纪市民首先要求一个廉价的教会。”（《德国农民战争》中文版第35页）威克里夫提倡建立廉价教会和民族教会的主张在市民中深得人心，影响深

远，他是15和16世纪一切反对天主教会的改革者们的启蒙先生。所以，历史学家将他誉为“宗教改革的启明星”。

威克里夫的思想主张在英国农民和平民中也得到广泛的响应，因为他否认教士的特殊地位及反对教会征收捐税同样符合下层人民的利益。一批拥护威克里夫观点，主张过清贫生活的贫穷教士，仿效古代的使徒，穿着粗布道袍，拿着手杖，2人1队地周游英国各地，不经教会任命便自由传道，在下层群众中形成一个异端教派——罗拉德派（“罗拉德”Lollard是荷兰语“喃喃祈祷者”的意思）。罗拉德派的核心成员都是威克里夫的信徒，但思想比威克里夫激进。他们不仅主张改革教会，还代表农民和平民的意愿，主张改造社会：不仅反对教会占有土地，也反对世俗封建主的压迫剥削，要求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约翰·保尔是穷教士的代表人物，他在群众中反复宣传说，人类原来就是平等的！他提出一句名言：“在亚当种田、夏娃织布的时候，谁是贵族？”他揭露英国当时的社会矛盾，为农民群众的悲惨处境鸣不平。他说道：“为什么我们生来就该当农奴？世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领主除了会支使我们替他们劳动，给他们挣钱花以外，从哪里证明他们比我们高贵呢？他们穿着天鹅绒和骆驼毛镶皮的外衣，而我们只能用破布片来蔽体！他们有美酒、香料和上等面包，而我们只有糠秕、烂草和清水！他们起居在精致的厅堂里，而我们却风里来，雨里去，终年在田野里劳动。可是我们劳动的果实却被他们拿走了。如果我们不做好他们指派的工作，就要遭到鞭打……让我们到国王那

里去！让我们告诉他，我们是怎样受着奴役，是怎样希望过另一种生活，不然，我们就会自己想出路。”他还鼓动群众抗交教会什一税，号召大家把教会榨取穷人的血汗而积累的财富夺回来！约翰·保尔的宣传说出了穷苦农民的心里话，对在苦难中挣扎的下层群众很有启发，为14世纪英国农民起义作了思想准备。恩格斯把约翰·保尔和捷克的塔波尔派一样，作为中世纪农民和平民异端的代表。天主教会则十分仇恨他，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开除他的教籍，并把他投入监牢。

1381年，英国农民抗缴苛重的人头税，爆发大规模的起义，起义席卷英国大部分地区，伦敦亦被占领，英国国王躲进伦敦塔中，被起义农民围困起来。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是农村泥瓦匠瓦特·泰勒。起义者从狱中救出约翰·保尔后，也把他推选为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义农民要求废除农奴制度和领主的封建特权，其中激进的人还要求没收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分给农民，消灭一切等级差别。瓦特·泰勒起义爆发后，国王、国会和天主教会联合起来，共同镇压起义的农民。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起义者进行分化瓦解并进行欺骗，起义领导人瓦特·泰勒和约翰·保尔先后遇害，起义终被残酷镇压下去。

1382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召开宗教会议，将威克里夫派的思想主张定为“异端”，禁止他公开活动。1384年除夕日，威克里夫与世长辞。然而天主教会不肯就此罢休，到1414年，威克里夫已去世30多年了，天主教会统治集团还在德国

南部的康斯坦茨举行的宗教会议上宣判他为“异端首领”，下令烧毁他的著作，并挖走他的遗体，焚尸扬灰。然而火是烧不掉威克里夫的深远影响的！他的思想不仅在隐匿民间的罗拉德派中继续保存着，对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发生影响；而且越过英吉利海峡，传到欧洲大陆，播下宗教改革的火种。15世纪上半期，欧洲宗教改革的先行者约翰·胡司便从威克里夫的思想得到启示，引导捷克人民用革命行动谱写了一部反对天主教会及德意志封建主的英雄交响乐——胡司运动。

八 胡司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的先声

在欧洲大陆的中部，有一块美丽富饶的盆地，叫做波希米亚。10世纪时，西斯拉夫人的一支——捷克人开始在这里建立起封建国家。

波希米亚盆地土壤肥沃，矿藏丰富。捷克人民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使它成为中古中期欧洲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自十一、二世纪以来，随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和三圃制的推广，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在工商业方面表现尤为显著。14世纪时，捷克已有约100个城市，手工业门类多达200个。除麻织业、呢绒业外，采矿、冶金及相关的手工业特别发达。金、银、锡、铁、铅等金属开采较早，13世纪时，捷克的银矿开采量位居欧洲第一，捷克铸造的

银币——格罗希通行于欧洲各国。对外贸易也十分兴旺，捷克商人东与俄罗斯、南与地中海的意大利、北与波罗的海之滨的立陶宛、西与濒临大西洋的尼德兰都进行着广泛的贸易。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14世纪末的捷克在欧洲名列前茅。

捷克是德意志的近邻，德意志封建主阶级早就对波希米亚这块肥肉垂涎三尺。捷建国后不久，德意志封建主便利用捷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把魔爪伸了过来，干涉捷克内政。11世纪时，捷克公弗拉提斯拉夫为在国内争权夺势，要求德意志君主承认其统治权力，德皇亨利四世于1086年授予他“国王”称号。此后，捷克便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在12至13世纪间，让成千上万的移民象潮水般地拥入捷克，又象蝗虫一样地遍布波希米亚各地。

向捷克大量移民是德意志封建主侵略捷克的隐蔽方式。首先移居捷克的是德意志的教士和修道僧，他们到处修建教堂和修道院，传播天主教。捷克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长等）几乎都是德意志人，只有象乡村神甫或助祭等低级教士才由捷克人来补充。当时处在神圣罗马帝国卵翼下的捷克王公贵族竭力为德国教士效劳，大肆向教士们捐献土地和布施，使教会变成捷克最大的地主，仅以布拉格附近的斯特拉霍夫修道院为例，15世纪初，它在寺院附近拥有10个村庄，在弗尔塔瓦河对岸有4个村庄，在奥尔热河流域还有16个村庄。其它的修道院也大体如此。捷克教会几乎占有全国1/2的耕地，又招徕许多德国骑士，把捷克农民

聚居的村庄赠与他们，让他们以武力维护德意志教、俗封建主的利益。

在波希米亚的城市里，捷克国王允许德意志商人和手工业主自由经营工商业，并让他们享有自治权和法律特权。他们形成城市贵族，控制了捷克的城市管理权和经济命脉。他们不仅压榨城市平民（帮工、学徒和破产行东等），同时也排挤和打击新兴的捷克中产阶级。此外，捷克国王还拱手将捷克矿山的开采权奉送给德国矿主，让他们掠夺捷克资源，残酷剥削捷克矿工。

德国人大规模移殖的结果，使捷克国内形成一个德意志教、俗封建主、城市贵族和矿山主组成的特殊集团，他们作威作福，俨然成为捷克的“主人”，而捷克人民倒反“象流亡者一样住在自己的国内”，他们遭受着双重的压迫：既受本国封建主的剥削压迫，又受德意志封建主的剥削压迫。正在成长中的捷克中产阶级也同德意志贵族存在着尖锐矛盾。故在中古中期的捷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14世纪末，上述种种矛盾呈现白热化状态。15世纪初，一场反对天主教会、反对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的革命运动终于爆发，这就是以捷克宗教改革家胡司的名字来命名的反封建运动——胡司运动。

这场反封建运动是从反对天主教会开始的，因为天主教会不仅是最贪婪的封建剥削者，而且教会上层尽是德国人。在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中，捷克籍教士组成一个革新派，其领导人便是胡司。

约翰·胡司于1369年诞生在捷克南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在乡村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1391年入布拉格大学，先后在文学院及神学院学习。结业后任该校的讲师及教授，1402年被选为校长。这时他还兼任索菲亚王后的解罪神甫和布拉格的伯利恒教堂的神甫，开始传教活动。

这位爱国者、宗教改革家生活在捷克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度尖锐的时代。早在童年时期，人民的贫困和悲惨处境便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记。及长，他目睹教会的腐败和洞悉祖国的苦难，深感进行改革的必要。他不仅在大学里活动，还利用伯利恒教堂神甫的身份，以通俗易懂的捷克语向各阶层居



约翰·胡司像

民积极进行宣传。他以大量确凿的证据无情揭露修道僧的荒淫放荡和神甫们的贪婪行为，用铁的事实证明主教和修道院长们的奢侈豪华生活为王公贵族所不及。他的宣传内容从揭露教士的罪恶逐步转到对天主教会的根本改造上，在大学里和教堂中广泛传播英国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思想。

他同威克里夫一样，认为改革教会的首要问题是取消教会的土地占有制。只有没收教会的地产，才能清除贪婪、放荡的教士，恢复“真正的”基督教会。他形象地比喻说：“狗为争骨头而互相狂咬，拿走骨头，狗便走开；所以把教会财产没收，教堂里便找不到贪婪的神甫了。”第二，要求废除烦琐豪华的宗教仪式，否认教皇可以赦罪，否认向神甫忏悔是罪得赦免的必要条件；在教义上他虽未反对“化体说”（变体论），但他赞成在圣餐仪式中，领“圣体”的平民信徒（无神职的一般信徒）应同教士一样领受酒杯中的“圣血”。第三，他还主张用本民族语言（捷克语）作礼拜和传道，同时要求教会神职人员要服从本国政府。

他的宗教改革思想与威克里夫的学说一样，从阶级性来说，属于城市中产阶级的“异端”，但他的宣传同样得到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的广泛支持；那些同德国贵族有矛盾的捷克中、小贵族也表示拥护，连捷克国王温茨劳斯四世也一度支持胡司。因此，胡司的思想学说成为捷克民族的爱国运动的一面旗帜。

胡司的活动遭到德国贵族的仇视和教会上层集团的猛烈攻击。起先，教会限制和排挤他，后来则禁止他讲道。1409年，教皇亚历山大五世下令开除他的教籍。然而胡司仍在各阶层居民的支持和保护下继续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宣传活动。

1412年，新上任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同教皇国毗邻的拿不勒斯王国发生战争，教皇发表通谕说：凡为教皇出征的人，一切罪孽均得赦免。同时，为筹集军费，曾派出特使到捷克贩

卖赎罪券。胡司激烈反对教皇的可耻行径，公开揭露说：“教皇无权动用武力”；“金钱不能代人赎罪，人是否得救是上帝预定的，教皇的赦罪无任何效用。”在胡司及其战友们的宣传鼓动下，群情激愤。这年6月的一天，布拉格民众上街示威游行，反对教会出售赎罪券。游行队伍里有两名大学生装成娼妇，扮演教皇，脖子上挂着教皇兜售赎罪券的告示，在人群中引起阵阵轻蔑的笑声。随后，群众公开烧毁教皇的告示。天主教会认为，这一事件是对教皇的莫大侮辱，捷克政府也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便逮捕和处死了3名示威游行的参加者。当局的这种暴行激起群众更大的不满，胡司公开同教皇决裂，宣称教皇不是基督在世的代表，而是叛徒犹大^①。这时，教皇再次宣布开除胡司的教籍。

捷克人民反教会斗争的情绪不断高涨，吓坏了捷克的封建统治者，最初曾支持胡司的捷克国王转而对胡司施加压力。1412年底，胡司被迫离开布拉格，转入南方继续进行活动。他一面从事写作，认真校对捷克文的《圣经》译本；另一方面，他更加接近人民，用大量的时间深入农民群众中讲道。他对劳动群众的痛苦处境深表同情，谴责封建贵族欺压农民，并号召大家起来反对教皇，同教皇决裂。胡司的敌人曾指控他“在大庭广众面前”讲道，公开要求“拔出宝剑，捍卫上帝的律法”。

^① 犹大是《圣经》故事中出卖耶稣的人。他原为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后以30块银币将耶稣出卖给犹太教统治集团，为逮捕耶稣的人带路，故人们常以“犹大”作为叛徒的代称。

天主教会上层集团和西欧各国封建统治者对胡司运动的发展感到震惊，他们决意联合起来共同镇压捷克人民。当时，西欧天主教会大分裂，3个教皇同时并存。由德意志皇帝西吉斯孟倡议，于1414年在德国南部的康斯坦茨召开宗教会议，重新统一天主教会，并策划镇压胡司运动。皇帝派出两名特使“邀请”（其实是诱骗）胡司参加宗教会议，声称可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并让他阐明自己的观点。胡司估计到此行凶多吉少，行前，他号召捷克人民继续斗争，同时向大家保证他将在会议上坚持自己的原则。

1414年11月，胡司到达康斯坦茨出席会议，可是罗马教皇主持的会议不准胡司发言，还剥夺他的人身自由，把他关进修道院的监牢中。有时也让他在会议上露面，但只许他静听别人对他的指控，不许他作任何申辩，完全把他置于受审判的地位。

面对着封建统治者的巨大压力，胡司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后退半步。在他给狱外的战友们的一封信中写道：“有一位博士曾来开导我，说宗教会议对我的控诉都是为我好；凡是对我的指责，都应接受。他怕我不懂，还补充说：‘就算是宗教会议说你只有一只眼睛，尽管你明明有两只眼睛，你也应当同意宗教会议的意见，附和说：不错，我只有一只眼睛。’我回答了这位博士：‘即使全世界都说我只有一只眼睛，只要我还象现在这样清醒，我决不会昧着良心去随声附和！’在杀害胡司的头一天，德意志皇帝又派几名教士到狱中，要胡司作出最后抉择。胡司回答：决不放弃自己的观点！”

1415年7月6日，教皇使节宣读对胡司的判决，以“异端”罪名判处死刑，褫夺神职，交付世俗政权行刑。当胡司被押赴刑场时，反动当局如临大敌，派1000名士兵警戒。在火刑堆前，这位改革家、捷克人民的伟大儿子严辞拒绝向神甫悔罪，昂首屹立，唱着歌在烈火中英勇就义。天主教会害怕广大群众把胡司当作殉道圣徒加以崇拜，故将骨灰和火刑堆下的泥土全部挖起来运走，撒在莱茵河中。

胡司在国外遇难的噩耗传回祖国，整个波希米亚盆地沸腾起来了。捷克各阶层居民义愤填膺，掀起反对天主教会和德意志贵族的新浪潮。1415年9月，布拉格市民举行多次集会，抗议教皇和皇帝西吉斯孟的暴行。捷克的452名上层人士联名写信给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抗议杀害胡司，并明确表示一切有争议的宗教问题，他们只服从布拉格大学的决议，表明捷克教会的独立性。许多捷克中、小贵族还乘机夺取教会（特别是修道院）的土地。同时，不论在城镇或乡村，愤怒的人民群众，冲进天主教堂和修道院，驱逐德国教士，捣毁教堂中的圣像和祭器；他们不顾康斯坦茨宗教会议的禁令，实行俗人以酒杯领圣餐的宗教仪式，还自己选举胡司派的牧师以取代德国神甫。从1417年起，零星的农民暴动频繁发生，捷克南部地区的农民运动特别活跃。胡司派的乡村教士常把农民聚集到山上或旷野里进行讲道或露天礼拜，他们号召广大农民拒绝向教会缴纳地租和什一税，有的还提出消灭一切封建领主的口号，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中。

气势磅礴的人民运动使捷克国王温茨劳斯吓破了胆，他

按照教皇和皇帝的旨意于1419年下令在捷克全境恢复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召回被人民从布拉格赶走的天主教神甫，恢复天主教会的教区；同时又免除一批市议员的职务，任命拥护教皇的天主教徒来代替他们的职位。1419年7月，国王的卖国求荣及倒行逆施激起布拉格人民起义；同时数以万计的农民也在捷克南部的塔波尔集结，庄严宣誓要用剑来保卫“上帝的正义”，举着胡司思想旗帜的捷克农民战争爆发了。

胡司战争(1419—1434年)是胡司运动的最高潮，是捷克人民反对天主教会和德国封建主的民族解放战争。参加战争的成员十分广泛，由于起义者阶级地位的不同，在斗争中，胡司党人自然形成两个派别：塔波尔派和圣杯派。

塔波尔派是运动中的激进派别，由于他们最初的活动中心在塔波尔，故名。该派成员主要是农民、城市平民和矿工。他们响应乡村教士的号召，从各地向塔波尔集中，至1419年7月22日，已集聚了42000多人。塔波尔派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斗争纲领，但他们的主张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那些在斗争中自发涌现出来的乡村传道者引导农民群众首先把矛头对准顽固的封建堡垒——天主教会。他们否认教皇、教阶制度和教会组织，主张建立民主平等的宗教公社，人人都可以当牧师，妇女也不例外。他们否定天主教的主要教义，不信炼狱^①，不信圣徒遗物及斋戒的赎罪效用，

^① “炼狱”一名“涤罪所”。天主教称，在地狱之外，还有所谓的炼狱，是一般罪人死后暂时受苦、洗涤罪过的地方。该教认为，好人犯有小罪，可不下地狱，但死后必须先由炼狱中受熬煎，到生前罪愆洗涤干净，才能升入天堂。

否定各种圣事，只承认圣餐礼，并主张任何一个俗人都能给教徒受圣餐。他们还反对教会一贯宣扬的“忍耐”、“顺从”等虚伪的宗教道德，号召人们起来反抗，用生命来保卫“神的思想”。乡村教士们还以原始基督教的“千年王国”的理想鼓舞人们的斗志。他们说：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是不会长久的，正义的千年天国很快会在人间建立起来。在那里，“将没有国王，没有统治者和臣民的区分；一切贡赋和捐税均被废除……私有制也没有了，人们要象兄弟姊妹那样生活下去。”他们在行动上还作过公有制生活的实际尝试。当他们集中到塔波尔时，都把带来的粮食、金钱和多余的衣物放进公共的大木桶里，不分“你的”和“我的”，大家都可以随意取用。他们的观点与实践，反映出农民的平均主义意识，也表现了劳苦群众对封建制度的憎恶和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憧憬，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圣杯派是运动中保守的派别，他们不敢触动封建制度，只愿采取温和手段实现国家和教会的独立。其基本纲领反映在1420年拟定的“布拉格四条款”中，主要内容是要求捷克独立和建立民族教会；禁止外国人担任官职和拥有土地；没收教会财产；用捷克语作礼拜和让胡司派教士自由传道，以新的胡司教会代替正统的天主教会。由于他们在宗教生活上强调在圣餐仪式中“给俗人以圣杯”，故被称为“圣杯派”。圣杯派代表捷克中产阶级和中、小贵族的利益，他们希望借用下层群众的力量驱逐德意志教、俗封建主，但他们

又害怕群众的过激行动。当他们的愿望基本实现时，便同封建势力妥协。

胡司战争的爆发使罗马教皇和德意志皇帝惊恐万状，在1420年至1431年的11年间，他们先后5次组织十字军侵入波希米亚，镇压捷克人民。虽然圣杯派和塔波尔派存在分歧，但大敌当前，战争之初，尚能联合对敌。在约翰·杰式卡带领下，共同击溃头3次十字军的进攻。杰式卡于1424年牺牲后，塔波尔派军队在大普罗可普和小普罗可普指挥下，又打退第四次和第五次十字军的侵犯，并转入反攻，打入德国境内。然而，正当塔波尔派部队不断取得胜利时，动摇不定的圣杯派妥协了。

没收了部分教会财产和驱逐了城市中的德国贵族，已达到圣杯派预期的目的。在击败第三次十字军进攻以后，他们就不愿再继续作战。这时，封建反动势力乘机拉拢他们，以便孤立和消灭塔波尔派。1433年，在巴塞尔宗教会议期间，德国教、俗封建主与圣杯派达成协议，确认俗人可以同神甫一样用酒杯领圣餐，同意已被没收的教会财产不必退还等。随后，圣杯派在巴塞尔会议支持下，把斗争矛头转向塔波尔派。1434年5月，两派在里旁发生大战，大普罗可普和小普罗可普均英勇牺牲，塔波尔派全军覆没。轰轰烈烈的捷克农民战争终于失败，胡司运动至此结束。

胡司战争最后失败了，然而胡司运动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作为一次反天主教会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它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沉重打击了德国封建主在捷克的统治，德国

皇帝不得不承认胡司教会的独立，外国人不得干涉捷克的宗教事务；胡司宗教改革还大大促进了捷克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此外，胡司运动的影响与意义远远超出波希米亚的地理范围，胡司的学说和塔波尔派的思想传播到欧洲各国，为16世纪更大规模的反封建反天主教会斗争作了思想准备，可以说胡司运动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先声。

近世基督教

一 马丁·路德和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

16世纪的欧洲发生了剧烈的震荡，新兴的资产阶级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封建的社会政治运动。他们举着宗教改革的旗帜，对西欧封建制度的社会支柱——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进行猛烈冲击，削弱了它在欧洲的封建神权统治；同时摆脱天主教会组织的羁绊，建立起资产阶级或新兴民族国家统治者需要的新教各派教会。这就是基督教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篇章——宗教改革运动。

恩格斯说：德国的宗教改革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中的第一次“大决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391页）。又说：“宗教改革——路德的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急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9页）这场改革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6世纪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从德国开始的。1517

年10月31日，在德国维登堡大教堂门口，人们熙熙攘攘，挤着观看贴在门上的一张用拉丁文写的墙报，标题是《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全文列为95条。这是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写的抨击天主教会贩卖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以下简称《论纲》）。在人群里，那些通晓拉丁文的大学生把《论纲》的内容用德语向大家高声解释着。人们议论纷纷，奔走相告，消息迅速传到各地，得到热烈的响应。马丁·路德的《论纲》就象火星落到火药里一样，迅速引起燎原之火，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了。

宗教改革运动首先在德国爆发，决非偶然现象。15至16世纪时的德国，封建制度仍占统治地位，但经济有了显著的进步。在许多生产部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日渐增多；采矿业较为发达，当时全国矿工人数已达数十万之多。德国地处东、西欧和南、北欧的交通要冲，过境贸易兴盛。然而德国经济上的致命弱点是发展不平衡和有严重的分散性；大



马丁·路德像

城市多分布在边境地区，对外贸易超过国内贸易；国内各地区间经济联系并不紧密，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没有出现象英国的伦敦和法国的巴黎那样的全国性经济中心。经济上的分散性造成德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德意志名义上存在

一个皇帝，但他不能控制各地的封建诸侯。全国除七大选帝侯（德国皇帝由这七大诸侯选举产生）外，还有10几个大诸侯，200多个中小诸侯，还有数以千计的帝国骑士。他们在各自的领地内享有独立的行政、司法、征税和铸币的特权，俨然是个“独立王国”。他们各霸一方，互相争战不已，以致全国没有安全畅通的交通道路，各地又关卡林立，币制极不统一，严重阻碍着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德国政治上的分裂，一方面延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则给罗马教皇控制和掠夺德国提供了方便条件。自十四十五世纪起，英国和法国都形成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王权强大起来，对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他们在他们国内的掠夺有了一定限制。但德国则不同，它徒有帝国虚名，却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来牵制罗马天主教会，致使罗马教皇能把它作为主要的掠夺对象。

天主教会占有德国 $1/3$ 的土地，是德意志最大的封建地主。帝国有 $1/5$ 的诸侯是高级教士，在7个选帝侯中便有3个是大主教。这些教会封建主，支持分裂，反对统一，凭借手中权力宰割德国。他们使用各种手段，征收贡赋和什一税，又利用宗教迷信，出卖圣职、“圣徒遗物”和“兜售赎罪券，对德国人民进行着敲骨吸髓的剥削。16世纪初，罗马教廷每年从德国榨取的钱财多达30万古尔登（德国的金币），相当于1497年德国皇帝全年征收的帝国税的21倍。德国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罗马教廷金库，教廷年收入的 $1/2$ 是来自德国，故当时人们把德国称为“教皇的奶牛”。这种情况激发了德意志人的

民族意识，天主教会成为德国社会各阶层共同痛恨的对象和众矢之的。到16世纪初，革命条件逐渐成熟，整个德国成为一个反对天主教会神权统治的火药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德国是罗马教廷贩卖赎罪券的主要市场。反对教会贩卖赎罪券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线，点火者便是年轻的神甫马丁·路德。

1483年11月10日，路德诞生于埃斯勒本的一个农民家庭。出生次日接受洗礼，并按那一天所纪念的圣徒名号，取名马丁。马丁·路德不满周岁时，全家人迁往冶铁中心曼斯菲尔德，他父亲汉斯·路德在那里当矿工。十几年后，汉斯·路德自己建起了一座小型熔铁炉，雇佣工人劳动，上升为小企业主，并被选为本镇议会议员。马丁·路德从小在家庭和学校里受着传统的天主教宗教教育。18岁那年（1501年），路德进入爱尔福特大学，系统学习经院哲学，1505年取得硕士学位。他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一名律师，1505年他开始在爱尔福特大学攻读法律，但才几个月他便违背父命，弃绝世俗，进入爱尔福特地方的奥古斯丁修道院出家为僧，这使他的父亲十分烦恼。马丁·路德在修道院过了数年清心寡欲的苦修生活，并修完神学课程，1507年被授予神甫职称，1512年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当上维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并兼任教区副主教，监管奥古斯丁修会的11所修道院。

路德在自传中提到，他在青年时代接受传统神学教育的同时，也曾受捷克宗教改革家胡司的思想影响，这一点对路德后来形成自己的宗教改革理论有所裨益。到罗马的旅行也

使他受到一次教育。1510年至1511年间，路德受奥古斯丁修会派遣，到罗马处理公务。他怀着朝圣者的虔诚感情前往罗马，可是在那里逗留1个月，耳闻目睹这座“圣城”的各种腐败现象，使他感到震惊。他在自传里写道：“很难描述，而且不可能相信，那里的龌龊究竟达到了什么地步，如果有地狱的话，那么，罗马便是地狱。罗马本是神圣的城，而现在已经变为肮脏的城了……基督徒愈接近罗马，就愈变坏。谁第一次往罗马去，他去找骗子；第二次，他染着骗子的习气；第三次，他自己就成为骗子了。”由于圣城罗马给他留下十分恶劣的印象，所以他说：“我宁愿放弃几千几个银币，只求不看到罗马。”这表明路德对天主教会的信念发生动摇了。从此，他开始根据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与要求，逐步形成自己的教义理论。

在1513年至1516年间，路德在讲授神学的过程中，从《新约圣经》里得到启发，酝酿着他后来宣传的“因信称义”的神学理论。“因信称义”一词来自《新约圣经》。使徒保罗在《新约·罗马书》中反对遵守犹太律法和传统礼仪才能称义的说法，认为只要依靠上帝的恩宠和人的信仰，便能被上帝称为义人。路德接过《新约圣经》中“因信称义”的口号，强调一个人的灵魂能否得救，得称义人，主要靠个人的虔诚信仰，而不靠“善功”，故无需实行斋戒、朝圣、施舍和购买赎罪券等善功圣事，当然也就不需要依靠教会和教士们的帮助和干预了。

这种新的教义思想与天主教的传统教义是对立的，因为

天主教会历来强调“除教会外，别无救恩”，说一个人必须接受教士所施行的各种圣礼，经过教会的帮助才能赎罪。马丁·路德的思想与天主教传统教义的矛盾，不久就在教会贩卖赎罪券问题上演化为公开的冲突。

教皇为了搜刮民财，在1500年、1501年、1504年和1509年都发售过赎罪券。1517年，教皇利奥十世借口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又发售新的赎罪券，并派遣一名特使约翰·特



16世纪初教士贩卖赎罪券情况

兹尔到德国各地宣传兜售。特兹尔每到一地，都要举行宗教游行和在大教堂中集会。教堂中央竖立着一个刻有教皇印记的红色赦罪十字架，十字架前，放着一个巨大的钱柜。当这位教皇特使登台演说时，总是吹嘘赎罪券的功效何等灵验，说什么“上帝已将赦罪的全权授予教皇”；谁购买了教皇

发售的赎罪券，不但他以往的罪已得赦免，“即使是未来的罪也可得到赦免”；“现在天堂的大门已经敞开”，当任何买主的金钱“落进钱柜叮咣一响的时候，他死去的亲属的灵魂马上就从炼狱飞升天堂”。为了尽快地将钱弄到手，特兹尔还吓唬听众说：“现在你们即使只有一件衣服，也应当脱下来卖掉，火速购买赎罪券，因为不久上帝将要追查忽略救恩的人了。”他的胡言乱语遭到许多人的反对，马丁·路德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提出质疑。

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在维登堡大教堂门上贴出他的《九十五条论纲》，要求对赎罪券问题进行辩论。他写道：赎罪券可以免罪的说法是错误的，“任何基督徒，只要他能诚心忏悔‘其罪孽将会全部被赦免，无需乎赎罪券’；“当钱币投入钱柜中叮咣作响时，不能赦罪，只能增加贪婪爱财的欲望”；既然“教皇比最富有的家族更富有，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钱来修建圣彼得教堂，而要花费可怜的信徒们的钱呢？”路德劝告基督徒说：“他们除非有很多余款，否则就应该把钱留下来作家庭的必需开支，决不可浪费在购买赎罪券上”；“如果他们看到一个贫困潦倒的人无动于衷，而把金钱拿去购买赎罪券，那末他所得到的不是教皇应许的赦罪，而是上帝的忿怒。”

当然《论纲》的内容是温和的。路德不敢公开反对教皇，只公开反对赎罪券贩子们的胡言乱语。可是他对教会贩卖赎罪券的丑恶行径提出的挑战，迎合了德国各个社会阶层的普遍需要，犹如一道闪电，引爆了德国这个火药桶，从而

拉开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

路德的《论纲》是宗教改革运动发难的纲领。各地的人们纷纷前来索取《论纲》的德文译本，大学印刷所应接不暇，于是人们竞相传抄，不到1个月便传遍德国和西欧。整个德意志沸腾起来了，“一方面农民和平民把他的反对僧侣的号召和关于基督教的自由的说教看成起义的信号，另一方面较温和的市民和一大部分低级贵族参加了他的运动，甚至诸侯也被卷入了这个潮流”（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中文版第40页）。路德简直没有料想到他的《论纲》会在全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而他本人一时竟成了运动的中心人物。

由于路德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他的胆量逐渐大了起来。教皇下令要他撤回《论纲》，但他断然拒绝了。1518年夏，教皇勒令路德到罗马受审，但由于萨克森选侯的庇护，使审判路德的事不了了之。1519年夏，马丁·路德接受天主教神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约翰·艾克的挑战，在维登堡大学200名学生的护送下前往莱比锡与艾克进行辩论。在辩论中，路德当众表明教皇主持的康斯坦茨会议宣判胡司为“异端”是不公正的，因为胡司的主张中包含有基督教的真理。他公开为胡司翻案实际上是证明教皇和宗教会议干过错事，打破了对教皇的迷信，撕下教皇“永无谬误”的面纱。最后，路德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圣经》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艾克如获至宝，把路德抨击教皇的言论整理成定罪材料上报教皇。1520年6月15日，教皇签署开除路德教籍的谕令。

客观形势迫使路德一步步走上与教皇决裂的道路。当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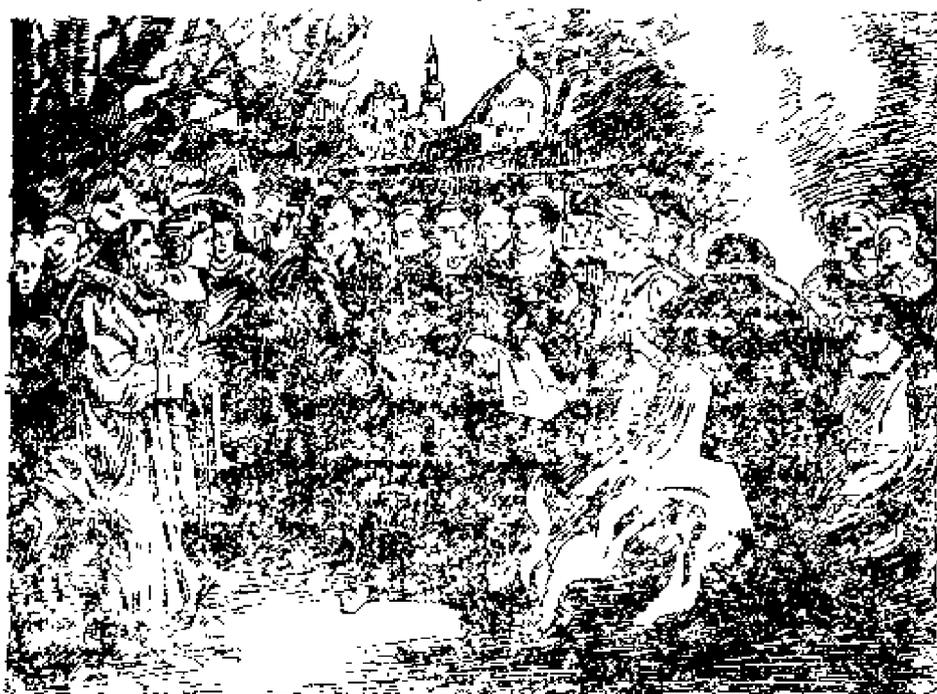
听说罗马教廷下令要开除他的教籍的消息后，于1520年下半年接连发表3篇重要文章——《路德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的公开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和《论基督徒的自由》。路德在后面两篇文章中，全面阐发了他的宗教改革思想。他论述了“因信称义”说（“信仰得救”论），谓信徒唯靠信仰而得救；他否定天主教会的权威，认为《圣经》才是信仰的主要依据，人人都可阅读《圣经》和解释《圣经》，与上帝直接交往，用不着神甫和教会作中间媒介；既然靠虔诚信仰便能得救，因而烦琐复杂的宗教仪式是多余的，应予废除（除洗礼和圣餐礼保留外，其余各种圣事均被否定）；他还主张教堂和修道院的数目必须减少，教士可以结婚，学校教育也应改良等。这些思想主张集中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所向往的“廉价教会”的要求。

《路德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的公开书》的内容则偏重在政治方面。书中抨击教权至上论，论证世俗权力来自上帝，世俗王侯可以用国家权力约束乃至惩罚教皇和各级教士。他谴责罗马教廷在德国搜刮财富。主张拒绝向教廷纳贡和取消教廷的最高司法权，以便使德国教会从罗马教廷的控制下独立出来。这封公开信可以称得上是路德的政治纲领，是德意志的独立宣言，具有积极意义。当然也说明了路德的宗教改革不是依靠广大民众，而是寄希望于世俗诸侯，这正是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

1520年10月，教皇开除路德教籍的通谕已送到德国，宣布路德是“异端”分子和“魔鬼”，下令烧毁他的著作。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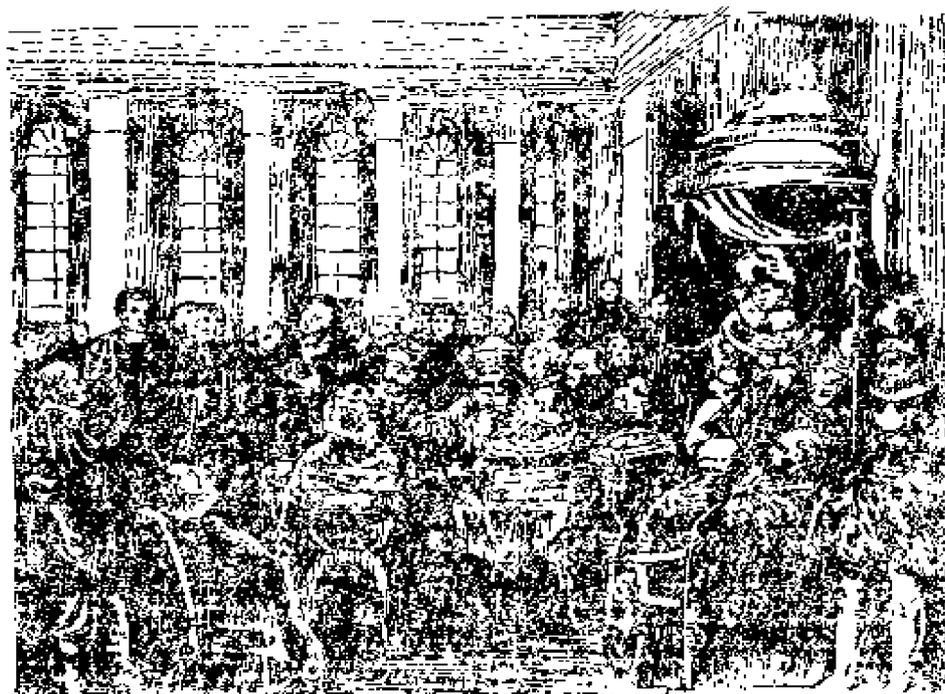
路德这个摇摆不定的博士却对教皇抱着幻想，给教皇利奥十世写了一封致敬信。信中虽指责教廷官员的腐败，但对教皇本人表示好感，称教皇为“父亲”，把利奥十世比喻为“坐在狼群中的羔羊，如同在狮群中的先知但以理”。然而教皇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将方兴未艾的宗教改革运动镇压下去，对路德的“致敬”不屑一顾。到这时，路德才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反对敌基督者的教谕》，骂教皇是“反基督的异端分子”。1520年12月10日，路德在维登堡当众烧毁教皇的通谕和教会法典，表示同教皇决裂。他的这一断然措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他的威望日益提高。

这时，教皇要求德意志皇帝出面扑灭宗教改革运动。



路德当众烧毁教皇通谕和教会法典

1521年初，皇帝查理五世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议会，决定召路德到会听审，要求他公开承认错误，进行忏悔。路德答应赴会。行前，有人用胡司受骗赴会而被害的事提醒他。路德回答说：“胡司虽被烧死，但真理犹存。虽然沃尔姆斯的魔鬼多如瓦，我仍要到那里去！”他从维登堡启程赴沃尔姆斯，沿途群众莫不夹道欢迎。4月17日，路德到会。由于参加会议的许多诸侯对罗马教廷搜刮他们领地上的财富十分不满，在德国皇帝面前大发牢骚，对罗马教皇提出102条意见。会议上的这种气氛无疑给路德打了一针强心剂。4月18日，路德手捧《圣经》，在会上侃侃而谈，拒不认错，说：“除非以《圣经》为依据证明我是错误的外，我决不放弃我的任何主张”，“我现在不后退，将来也不会后退，这是我的



路德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上慷慨陈辞

立场。”皇帝不敢随意处置路德而得罪诸侯，只好先把路德放走。当他安然离去1个月后，才下令缉拿他。这时，路德早已躲进萨克森选侯的瓦特堡中，隐姓埋名，用德文翻译《圣经》去了。路德翻译《圣经》对统一德意志民族语言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前后，随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德国形成3个政治集团：一是保守的天主教集团，包括皇帝、高级教士和天主教诸侯等，他们反对宗教改革，支持罗马教廷。一是以路德为代表的温和的改革派，包括新兴资产阶级、低级贵族和新教诸侯，他们反对天主教会的特权，主张没收教会财产，支持路德改革，建立脱离罗马教皇控制的廉俭教会。一是以农民和平民为主体的人民的宗教改革派，他们试图通过宗教改革进行社会变革，消灭封建剥削和私有制。运动之初，他们拥护路德。在改革运动深入发展时，他们不得不与路德分道扬镳。

1521年，宗教改革的思想已深入德意志各个角落，各阶层人民广泛投身运动中。人民群众的激烈行动远远超出了路德的温和改革的轨道。爱尔福特和维登堡的大学生们冲击教堂，攻击神甫；有些城市的平民群众在圣诞节之夜闯入教堂，砸烂长明灯，唱民歌小调扰乱弥撒仪式；许多低级教士也转向宗教改革一边，不少神甫和修士、修女冲破清规戒律，自行结婚，自动还俗；在图林根地区，劳动群众甚至在酝酿武装暴动了。

可是这时的马丁·路德却害怕群众的激烈行动，特别害怕人民起义的爆发，因而置身群众运动之外。1522年1月，

路德发表他的《劝基督徒勿从事暴乱书》，说“上帝禁止叛乱”，“叛乱确实是由魔鬼挑动的”。他还生怕革命群众借用他的名义，在这篇文章中强调说：“请不要提起我的名字来，也不要称他们为路德派。”表示自己与革命群众划清界限。当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燃烧起来时，马丁·路德毫不踌躇地抛弃下层人民，倒向封建贵族一边。1525年5月，他写了一篇题为《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书》的宣言，号召封建主们对起义人民进行武装镇压，公开宣称要象“打死疯狗一样”地消灭“农民暴徒”，“绝不可对农民乱发慈悲”。因此恩格斯评论说：这时的路德“对人民充满了仇恨，而且达到疯狂的程度，这就使它永远成为路德这个名字的一个污点。由此可见，他在开始自己一生活动的時候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后来却完全投靠人民的压迫者，为他们服务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5页）

革命人民对路德的妥协背叛感到失望。自1521年以后，便同路德分手了。他们在托马斯·闵采尔的带领下，独立地开展人民的宗教改革运动。闵采尔（约1490——1525年）出身于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从小勤奋好学，少年时期便倾向革命。据说他在中学读书时就组织过秘密团体反对马德格堡大主教。17岁起，先后在莱比锡、美因兹等大学研习哲学，接受人文主义的思想影响。宗教改革运动开始时，他积极支持马丁·路德。1520年他来到工业重镇茨维考，在一所教堂中担任神甫。他平易近人，广泛接触工人农民，了解群众的疾苦，领会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另一方面，他鉴于这时马了·

路德宗教改革的调子越唱越低，便坚决站在人民一边。公开批判路德的保守。这时，在群众中秘密流传着一个新的教派——“再洗礼派”（因不承认天主教会强制儿童所受的洗礼，主张成年后需要再次受洗，故名）。该派成员主要是农民和城市平民。他们极度仇恨封建制度及其社会支柱——天主教会，借用原始基督教的“千



托马斯·闵采尔像

年王国”的思想材料，宣传应在现实世界上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闵采尔同再洗礼派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从他们身上吸取教益，同时又帮助再洗礼派形成自己的教义。1521年春，闵采尔和再洗礼派发动茨维考工人起义，失败后被迫离开德国到了捷克的布拉格，与胡司党人取得联系，并从塔波尔派思想中吸取养料。这时，他更鲜明地提出要用暴力手段实现社会改造的主张，把宗教改革引向农民起义的革命道路。

1522年，闵采尔回到德国，在图林根地区的阿尔斯特德城当神甫，利用讲道机会进行革命宣传。这时他的宗教改革理论已经成熟，并将路德远远地抛在后面了。路德强调“因信称义”，并说信仰的唯一依据是《圣经》；而闵采尔

则认为信仰就是“理性”（即判断推理的思维能力），是“理性在人身中活跃的表现”，因此人人（包括非基督徒在内）都可以有理性，人人都可有神性，人人都可升天堂，而且天堂要建立在现实世界上，“既无所谓来世的天堂”，“亦无所谓来世的地狱”。他还认为《圣经》对信仰来说是必要的，但《圣经》的启示决非唯一的准确无误的真理，其中也可能有谬误之处，因为耶稣基督“也曾和我们一样地是人，他只是先知和师表”而已。闵采尔的宣传，把基督教来世天堂的欺骗和来世地狱的恐吓一一揭穿了，人们对耶稣基督和《圣经》的迷信也被一一否定，基督教的神圣和神秘的外衣被他一层层地剥得精光。恩格斯说：闵采尔的“神学哲学理论不仅攻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且也一般地攻击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他在基督教外形之下传布一种泛神论，他的泛神论和近代推理思考方法相当接近，个别地方甚至着了无神论的边际。”（《德国农民战争》1975年版第45页）

闵采尔的最大特点是把宗教改革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他的政治纲领是“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早经预言的千载太平之国”。闵采尔所说的天国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和人民群众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理想社会。恩格斯说：“正如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德国农民战争》第46页）闵采尔无情地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老爷们的伪善，他说：“请看，高利贷、偷窃和盗劫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老爷和诸侯们。他们想要什么，便霸占什么：水里的鱼，空中

的鸟，田野中的植物——这一切都被认为该属于他们。然后他们（诸侯们）向穷人说教，说上帝戒人们偷盗。可是老谷们并不认为他们必须遵守这种禁条。他们压迫全体百姓，破坏和掠夺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整个世界。如果谁从他们那里拿走一点点东西，那就要处以绞刑，而那位说谎博士（指路德）还附和说‘阿门’！”闵采尔号召人民群众用暴力手段推翻不合理的制度，要“拿着铁杖把这些旧壶破罐横扫一遍”，说“整个世界必须忍受一次大震荡，这是关乎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卑贱的人翻身的事情”（《德国农民战争》第48页）。这位平民革命家不仅进行宣传，而且组织群众，他联络各地教友，创建“基督教同盟”这一秘密团体，吸收农民、矿工和城市平民参加，共同进行斗争。闵采尔的革命活动对德国农民战争的爆发起了推进作用。

1524年夏，德国南部的士瓦本地区的农民因拒绝向贵族纳税和服役，首先发动起义，德国农民战争爆发了。翌年春，起义席卷整个士瓦本，组成6支起义军，共三四万人，声势浩大。但由于各路起义队伍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均被封建主的军队各个击破而失败。在士瓦本起义后，萨克森和图林根地区也爆发大规模的起义运动。1525年3月，闵采尔在缪尔豪森城领导人民起义，推翻城市贵族统治，建立“永久市政会”这一革命政权，使该城成为德意志中部和北部的革命运动中心。起义烽火在图林根和萨克森各地燃烧起来。起义人民占领城市、封建庄园和修道院，没收和分掉封建主的土地财产，封建主的政府机构一律关闭。当士瓦本农

民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时，闵采尔号召各地起义农民联合作战，共同抵御封建主军队的进攻。5月中旬，闵采尔率领1支8000人的起义队伍在弗兰肯豪森与敌人决战，因寡不敌众，起义军在进行顽强抵抗后失败，闵采尔受伤被俘，最后英勇就义，为德意志的反封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随后，其它地区的起义陆续被镇压下去，“德国人民进行的最伟大的革命尝试，以忍辱失败而告终了”（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107页）。

在世界历史上，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中的第一次“大决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391页）它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统一的德国和消灭封建制度。由于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不坚决和农民战争的失败，这一历史任务没有完成，德国仍然是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原来各地诸侯与农民起义军缔结的协定被一一撕毁，农奴制度普遍恢复，广大农民重新陷入封建领主的奴役中；市民的改革要求也受到挫折，“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43页）。各地新教教会的领导权落入新教诸侯之手，诸侯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权势大大增强。这些因素严重阻碍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然而16世纪德国的反封建运动也“有一定的成功”，“这是这个运动的宗教伪装的成功”（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1895年5月21日）》，转引自《德国农民战争》1962年版第160页）。宗教改革和汹涌澎湃的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天主

教会势力，他们的许多教堂和修道院被焚毁，土地财产被没收；德意志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抛弃了天主教而改信路德新教，新教教会与天主教会分庭抗礼，罗马教皇独占德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路德派新教教会是依靠一部分诸侯的扶持建立起来的。这批诸侯在农民战争期间，趁机夺取了当地天主教会的财产。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便标榜新教，在各自领地内建立新教教会，自己成为该教会的首脑。1530年，在路德指导下，由梅兰希顿起草了路德新教的信仰纲要，即《奥格斯堡信纲》，重申“因信称义”思想和简化宗教仪式的主张，并明确规定路德派教会的首脑是新教诸侯。于是路德派教会



新教神学家梅兰希顿像

成为德意志北方新教诸侯加强封建割据的政治工具，与皇帝和南方的天主教诸侯争夺权势。

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企图削弱新教诸侯的势力，1529年在斯拜尔召集帝国议会。会上，天主教诸侯居优势，重申1521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反对异端的命令，决议禁止夺取天主教会财产并恢复天主教的特

权。出席会议的路德派信徒提出抗议，在抗议书上签字的有萨克森、勃兰登堡等地诸侯和一些城市代表，故路德派被称为Protes Tantes，德语意为“抗议者”，后“抗议者”一词成为一切反对天主教会的新教各派的通称，汉语译为“新教徒”。

1531年，德国的新教诸侯组成“士马尔卡登同盟”，反抗皇帝。在16世纪的40年代，新教诸侯同皇帝经过长期混战后，于1555年缔结“奥格斯堡和约”，在“和约”中，皇帝承认了路德新教。“和约”依据“教随国定”的原则（即“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承认各邦诸侯有权决定他本人及其臣民信仰旧教（天主教）或者信仰路德新教，路德新教在德国取得了合法地位（其他派别的新教仍属非法）。这一和约的签订是路德新教最后确立的标志。

路德教派是新教中第一个大宗派，称为“路德宗”或“信义宗”。早在16世纪30年代，路德新教已传入丹麦、挪威和瑞典，并受到这些国家的保护。此外，在英、法、波兰和匈牙利等国也赢得一些信徒。路德新教的流传，说明欧洲的民族国家日益摆脱教皇的羁绊。就这个意义讲，天主教会遭到了失败，适合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的新教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二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和 “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16世纪前半期，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后，改革的浪潮

迅速席卷整个西欧，瑞士、英国和法国都相继发生宗教改革，其中以瑞士的改革最引人注目。

在马丁·路德改教的同时，瑞士的苏黎世城出现了慈温利的改革。稍后，日内瓦城又兴起加尔文的改革。加尔文的改革十分成功，比路德改革彻底，充分体现了宗教改革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恩格斯评论这段历史时指出：路德最后将宗教改革的成果出卖给了封建诸侯，“但是，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当德国的路德教变成诸侯手中的驯服工具的时候，加尔文教在荷兰创立了共和国。”后来英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1页）。

为什么瑞士的宗教改革能获得丰硕成果？因为这里有适宜于宗教改革种子生长的肥沃土壤。瑞士地处南欧与北欧的交通要道上，自中古中期以来，兴起许多城市——苏黎世、巴塞尔、伯尔尼和日内瓦等，工商业兴旺发达。从15世纪起，这些城市开始出现许多分散的手工工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较早，市民的力量较为强大，宗教改革有稳固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在整个瑞士，封建关系比欧洲其它地区显得薄弱。16世纪初，瑞士名义上仍属神圣罗马帝国管辖，但实际上是个由许多独立的州组成的松散的联盟。联盟疆土包括13个州（6个农业森林州和7个城市州），另有一些联盟的领辖地。联盟没有固定的中央政权机关，仅有1个各州代表组成的联盟议会，讨论决定全联盟的共同事务，各个州独立自

主地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特别是苏黎世等城市享有充分的自治权，设置有比较民主的市议会，使这些城市成为欧洲各国激进的宗教改革家们最好的活动场所。自15世纪以来，人文主义思潮在瑞士的流行，也为宗教改革作了思想准备。

瑞士的一部分农业森林州完全被教、俗封建主控制着，农民生活困苦，常被天主教封建势力（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利用，充当雇佣兵，为外国封建主打仗卖命。各城市的市民反对雇佣兵制，厌恶天主教会的腐化，对教、俗封建主的压制和剥削极度不满，宗教改革成为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



慈温利像

瑞士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先在苏黎世城，后来才转移到日内瓦。

当马丁·路德在德国诞生后几个星期，即1484年1月1日，另一名宗教改革家在瑞士威尔德豪斯的一个富裕农民家里呱呱坠地，他便是苏黎世宗教改革的核心人物乌尔利希·慈温利（1484—1531年）。

慈温利18岁时进入巴塞尔大学读书，受到

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150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并被任命为格拉鲁斯教区神甫。他在这个教区任职期间，几次陪同本教区青年组成的雇佣兵队到意大利作战。他作为随军神甫，目睹雇佣兵制的种种弊端，痛感废止这种制度的必要。1516年11月，他转到艾恩济得伦村庄布道。由于这里有一座圣母马利亚圣像祭坛，经常香客云集，每年有数以10万计的朝圣者前来朝拜。圣母神坛入口处写满了“在此地一切罪愆均可全部赦免”之类的标语或题词，把无穷无尽的“赦罪”效能归功于童贞女马利亚的神像。年轻的人文主义者慈温利对香客们讲道时，竭力反对这种拜圣像的迷信，提出废除“朝圣”活动的主张。他因此在社会上开始博得名声。

1518年底，慈温利被选为苏黎世大教堂的“民众神甫”（指不属任何教派的教士）。1519年初，他一上任就积极宣传宗教改革，强烈反对天主教会在瑞士贩卖赎罪券。在他的鼓动下，市民们把赎罪券贩子参孙·伯尔纳轰走了。市议会还作出相应的决议，禁止在苏黎世州销售赎罪券。1520年，他抨击教会的什一税，主张改为教徒的自愿捐献。他反对教皇从瑞士招募雇佣兵，促使苏黎世市政当局于1521年5月明令禁止本州居民应召入伍。他反对天主教的斋戒。本来教会规定斋期应减食，星期五禁食肉，但他故意违犯教规，于1522年大斋期（复活节前的40天内）的头几天，和他的朋友一道，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吃香肠，表示向教会挑战。他还反对教士独身，并宣布说他早已同一个年轻的寡妇安娜·来恩哈特秘密结了婚。

慈温利的改革宣传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同时也遭到天主教保守分子的反对，教区主教、修道僧群起而攻之。苏黎世的教会属康斯坦茨主教管辖，主教派专员到苏黎世，企图镇压宗教改革运动，因而在该城展开了宗教问题的大论战。为准备辩论，慈温利于1522年写成《六十七条目》，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与天主教针锋相对，以《圣经》的权威代替教会的权威，强调《圣经》才是信仰的基础；强调人是否得救在乎信仰，而不在于善功圣事，故猛烈抨击教皇权位、修道发愿（男女修士发誓安贫、守贞和听命）和教士独身的制度；否定斋戒、圣徒崇拜、朝圣、告解和赎罪券的“赦罪”效能，并宣称“炼狱”是世人捏造出来的谎言。他的宗教观点与马丁·路德的有相似之处，但比路德激进。路德还保留了天主教原有的肖像、祭坛、风琴及礼拜堂的装璜等，慈温利则一概加以否定。关于圣餐礼，他既反对天主教的“化体论”（变体论），否认弥撒仪式的献祭性，又反对马丁·路德的“同体论”。他认为圣餐仪式中的饼和酒并未转化为耶稣的肉和血，故举行圣餐仪式不是以耶稣的血肉为祭品的献祭礼；也不是象路德所说的那样饼酒与耶稣的血肉联合为同一体。慈温利强调：举行圣餐仪式，仅是以饼、酒作为耶稣的血肉的象征，缅怀耶稣基督为拯救世人而牺牲受难。所以，慈温利的教义思想比路德更为理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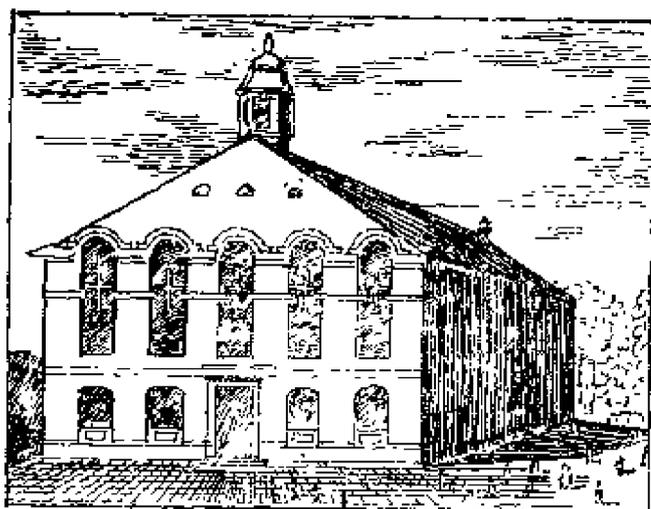
从1523年起的一二年间，苏黎世市议会主持了4次宗教问题的大辩论，有全州的几百名教士参加。经过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激烈辩论，市议会明确表态，认定慈温利的主张是正

确的，并宣称，天主教的许多礼仪和制度在《圣经》中没有根据，应予改革。此后，苏黎世的宗教改革在市政当局的领导和监督下进行，慈温利任市议会的宗教事务顾问，他的教义成为全州国民必须遵行的准则，保守分子如不遵从，就要被驱逐出境，于是苏黎世州成为信奉新教的城市共和国。

在苏黎世，天主教烦琐复杂的典礼仪式被废弃：弥撒献祭、忏悔礼、涂油礼被取消；礼拜由拉丁语改用德语（苏黎世属瑞士的德语区），讲道构成礼拜的主要内容；施洗和行丧葬礼收费的陋习被取缔；教堂里的圣母像和耶稣受难的十字架苦像被拆除；墙上刷上雪白的石灰，抹掉偶像崇拜的壁画；圣徒遗物被埋掉；教堂里的风琴、祭器全被搬走；神职人员不再穿圣服；修士、修女离开寺院还俗，结婚成家；修道院的财产被没收和变卖，用来兴办学校。在组织上，新教教会与天主教会完全脱离关系，由本教区信徒选举出的牧师来管理。慈温利把教会建成新兴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廉俭教会。

慈温利的宗教改革不仅在苏黎世州进展神速，并且很快被瑞士其它城市州所接受，伯尔尼、巴塞尔等城市都成为新教州。慈温利还想以武力进一步推行新教，但遭坚持天主教信仰的各农业森林州的贵族集团的反对，双方终于发生武装冲突。1531年卡匹勒一战，苏黎世军失败，慈温利在战斗中牺牲。此后，慈温利新教的对外传播受到限制，瑞士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转移至日内瓦。

日内瓦是瑞士西南边境的一个著名城市，地处意大利通往法国和尼德兰的商路交叉点上，不仅是个过境贸易和银行



新教教堂外景

信贷业务中心，也是个发达的手工业中心。随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市民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可是15世纪时，日内瓦仍受着萨伏依公爵（萨伏依是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封建公国）和日内瓦主教的封建统治。他们践踏市民的权利，市民不断展开斗争。16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士的伯尔尼州和弗里堡州等结成联盟，出兵帮助日内瓦市民打败萨伏依公国军队，日内瓦市民从此取得市政机关的权力。在斗争中，许多贵族豪绅离开日内瓦，主教也被驱逐，市民阶级在政治上处于绝对优势。日内瓦市民迫切要求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这就是加尔文在日内瓦成功地推行宗教改革的政治基础。

加尔文是法国人，1509年7月10日生于巴黎东北不远的诺阳城。他父亲是诺阳主教的秘书兼主教区总教堂的律师，还经理当地财政，颇有名气。加尔文从未受过圣职，但凭他

父亲的社会地位，从12岁开始，便弄到几种教会职务，领取薪水到学校读书。他先后在几所大学攻读文学、神学和法律，并接受了人文主义和路德新教思想的影响。1533年起，积极参加新教团体的活动。1534年冬，因受迫害逃离法国，次年春辗转来到信仰新教的瑞士巴塞尔城。

在寓居巴塞尔期间，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思想已发展成熟，1536年写成著名的《基督教原理》一书。这本名著在多次重版时，形式上虽有变化，但基本内容和主题思想并未改变。它系统地阐述了这位改革家的教义理论，后来成为加尔文教派的基本教科书。



加尔文像

加尔文同马丁·路德一样宣扬信徒“因信称义”的理论，否定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但加尔文态度坚决，行动果敢，为马丁·路德所不及。路德不愿过多地触动天主教的教义和制度，加尔文则极端反对天主教，毫无妥协余地。他宣称唯有《圣经》才是准确无误的“真理”，否认天主教散布的“教皇永无谬误”的说法。他认为：教会的一切典章制度，凡是《圣经》中没有根据的，必须一概否定并全部涤除干

净。他力图证明新教比天主教更符合《福音书》精神，更符合古代基督教的传统。

加尔文神学思想中有一个主要学说，即“前定论”（预定论）。他发展了古罗马神学家奥古斯丁的前定学说，宣称：一个人能否得救是上帝预先就安排定的；说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便将世人分成“选民”与“弃民”两类，“选民”是命中注定的成功者、得救者，而“弃民”则是命中注定的失败者，不能得救者；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便是“选民”和“弃民”的标志。按照这种“理论”，谁在自由竞争中发财致富，飞黄腾达，就说明他是上帝的“选民”，必能得救；如果谁在现实生活中贫困破产，受苦受穷，被迫出卖劳动力，受人剥削，是个“失败者”，那么他必定是“弃民”。加尔文特别强调上帝的绝对权威，说世界上一切皆取决于上帝的旨意；上帝预定的事，任何人无法得知，也无法改变，人无能力解救自己。因此人一生穷苦，是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的事。加尔文用这种宿命论的观点为资产阶级的起家辩护，又以这种宿命论的观点，要求劳动群众忍受剥削，安分守己。所以，他的前定论十分适合资产阶级的胃口。

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一向宣传所谓“清贫福音”，要人们重后世，轻看今生的财富，而加尔文却鼓励人们自我奋斗，去追求无穷无尽的财富，说财富是蒙上帝之恩而获得成功的标志，至于用什么手段去发财则不予限制。他不反对贷钱取利，也不反对殖民侵略和掠夺。同时，加尔文的前定论还使封建贵族的高贵出身和等级特权失去意义，因为

在他看来，出身门第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得救。无论出身如何，只要能发财致富，飞黄腾达，便有资格在社会上居于领导地位，跻身统治阶级的行列。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正殷切期望政治上掌权，经济上发展。所以，恩格斯说：“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成为他们进行反封建斗争的革命理论。《基督教原理》一书的拉丁文本出版问世不久，便被译成欧洲各种文字广泛流传。在1630年以前，曾用9国不同文字，全文再版74次，部分再版14次。在西方资产阶级崭露头角的岁月里，加尔文的著作真可谓风靡一时。

1536年夏天，加尔文来到日内瓦，受市议会聘请主持宗教改革工作。

加尔文初到日内瓦时，当地市民改革派已按慈温利的精神进行改革活动，废除了一些天主教的陈规陋习，并着手改组教会组织。不同思想政治倾向的派别为改革教会问题进行着激烈辩论。社会上层中的保守分子（即“放浪派”）反对改革，要求恢复旧习俗。在改革派内部，反映平民群众利益的再洗礼派十分活跃，他们激进的言行又为资产阶级所不容。在这种情况下，从日内瓦主教及萨伏依公爵手中夺得政权的新兴市民，便雇请加尔文帮助他们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

加尔文拟订《教会信条》、《教理问答》等条规，由日内瓦市议会通过后，作为市民社会生活准则强制推行。他简化了宗教仪式，减少了许多宗教节日；还规定星期日禁止娱乐活动，平日不许唱歌跳舞，不许穿漂亮服装。他还憎恶乞

丐，反对施舍，要求每个信徒都要献身于自己的职业活动，勤奋工作，轻视享乐，注意积攒一文钱、一厘钱。加尔文的这种教条以变态和离奇的方式，反映了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要求。他们崇拜金钱，渴望发财，既表现出贪婪成性，又表现出极端的吝啬。

改革过程中并非风平浪静。加尔文的初步改革措施遭到一批市民的反对。1538年，加尔文被他的反对派排挤出日内瓦，只得在外地流动讲学。1540年，另一派得势，又邀请加尔文回日内瓦主持改革工作。他于1541年9月13日回到日内瓦，此后23年中，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苦心经营加尔文教派的日内瓦共和国，成了这个共和国的政教领袖。

加尔文的政治观点，首先是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他宣称封建君主实行暴虐统治，践踏上帝的法律，侮辱教会，所以他们将受上帝的严厉惩罚，而上帝惩治暴君的工具就可能是他们自己的臣民。这种理论在进行反封建革命的时代，在资产阶级向封建主夺权的过程中，无疑具有进步的意义。但加尔文毕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只承认王国政府的下属机关、教会和国会（或“三级会议”）有反抗暴君的权利，而对反映下层群众利益的再洗礼派的革命行动则进行压制。关于新教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加尔文认为教权与国家政权都是上帝所命定的，二者应密切配合；由于牧师们最能领会《圣经》启示中上帝的旨意，故政府应受新教教会的节制，采纳牧师的意见，服从牧师们的决断，并由牧师们来解释和执掌“上帝的律法”。在这种政治思想指导下，日内瓦被建

成一个由加尔文教会控制的神权共和国。

在加尔文统治时代，日内瓦既是个共和国，整个城市也是一个加尔文派的大教会。在这里，除加尔文派以外，其它教派一律属于非法，故日内瓦的全体公民都是清一色的加尔文教徒，每个公民都必须受加尔文教会的管理和约束。加尔文对教会组织进行改造：它与天主教会割断关系，不再隶属于教皇；也不象德国路德教会那样隶属于诸侯。它取消了天主教会那种封建等级式的教阶制，而按民主共和制原则建设新教组织。各个教会都是“选民”的团体，由教徒选举出长老、牧师来管理。教会管理人员有4种：“牧师”在教堂布道；“教师”管理教会学校；“执事”掌管慈善机关；“长老”是教会的中心人物，他们大多是从企业家或富商中选出，其职责是维持秩序，维护教会的纪律。各教区的长老和牧师共同组成宗教公会，定期举行会议，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保持宗教的统一。加尔文在逝世前一直是该会议的主席，成为教会首脑。日内瓦的政权机构是市议会，市议会有牧师参加；加尔文以教会首脑身分经常出席市议会，是市议会的实际决策者。此外，由若干名长老、牧师和市议员联合组成宗教法庭，受理各种案件，判决后交由市政当局执行刑罚。

加尔文神权政府的统治异常严厉，随时派出侦探严密监视居民的一言一行，只要发现一点微不足道的过失都要严加惩治。如教徒参加一次跳舞会就必须到教堂当众悔罪；年轻妇女穿华丽服装就要连同她母亲一起拘押两天，甚至谁在听牧师布道时发笑也要受罚。加尔文政府特别不能容忍在日内

瓦有“异端”思想或异己教派的存在。过去当他们反对天主教会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曾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帜，可是当他们执掌政权后，却把“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帜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残酷镇压代表平民、农民利益的再洗礼派，或处死刑，或驱逐出境，对其他异己教派的人也不能容纳。据统计，16世纪中期，日内瓦城共16000人口，但仅在5年之内（1542—1546年）就有57名所谓的“异端”分子被处死，另有76人被驱逐出境。这些判决都是加尔文亲自批准的。更令人震惊的一次事件是杀害科学家塞尔维特。

塞尔维特是一位西班牙医生兼生理学家，他首先发现人体血液大循环系统外还存在小循环系统，这在科学上有重要贡献。他长期居住在法国的维恩城（在里昂南不远），曾热情支持宗教改革运动。但他的宗教观点越出路德和加尔文的轨道，秘密撰写并匿名刊行一篇文章《论三位一体的谬误》，对《信经》中的传统教义“三位一体”论作了批判，认为上帝只有一位，耶稣是人而不是神。塞尔维特曾将他的这种大胆的想法写信告诉过加尔文，加尔文却以憎恶的眼光紧盯着他，并居然与反动的天主教会携手合作，将他的信件作为证据向天主教异端裁判所告密。于是塞尔维特在法国维恩被逮捕下狱，并判死罪。后来他越狱逃跑，在前往意大利途经日内瓦时，加尔文下令将他逮捕，送交宗教法庭审判。加尔文坐在法官席上，坚持判处塞尔维特死刑。1553年10月27日，这位科学家当众被火焚死。

加尔文在日内瓦实行资产阶级一派专政，对待异己思想

观点同天主教会一样地实行专制主义政策，难怪人们称日内瓦为“新教的罗马”，称加尔文为“日内瓦的教皇”。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取得成功，这是“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在瑞士的胜利。事实表明，加尔文教义思想及教会组织形式非常适合资产阶级建立本阶级统治的需要。而且他利用日内瓦的资产阶级政权，兴办学校，培养出大批牧师，到欧洲各国传播加尔文教义，扩大宗教改革的影响，许多国家出现了加尔文教信徒。于是继路德宗(信义宗)之后，在新教里，形成第二个大宗派——加尔文宗(长老宗)。

加尔文教在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新兴资产阶级正酝酿革命的国家里特别流行，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理论武器。16世纪中期，尼德兰各阶层人民集结在加尔文教旗帜之下，组成一个民族战斗联盟(包括资产阶级、手工业工人、农民和低级教士等)，他们拿起武器，反抗西班牙王的专制统治。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革命终于取得胜利。1581年，北方各省宣告独立，正式成立联省共和国。尼德兰革命是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在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打开一个缺口，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

恩格斯充分肯定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历史意义，他写道：加尔文“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

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2页）在后面的历史篇章里我们将会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正是从“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理论”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1页）。

三 英国国教的产生及 清教运动的兴起

当宗教改革运动的烽火在欧洲大陆遍地燃烧时，英王亨利八世和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王也相继在大不列颠岛上打起宗教改革的旗号，把罗马教廷对英国教会的领导权夺过来，使英国教会与天主教会脱离关系，变成由国王领导的英国国教会——安立甘教会。安立甘宗与路德宗、加尔文宗并列为基督教新教的三大主要宗派。

英国宗教改革的显著特点是由国王夺取教会的领导权，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使教会成为加强专制王权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们必须从专制王权说起。

西欧许多国家在封建社会初期和中期，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王权微弱。到封建社会末期，在英、法等国，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出现统一的国内市场，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国王的中央集权奠定了牢固基础。在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英国王权空前强大起来。英王亨利七世（1485—1509年）极力打击旧贵族的封建

割据势力，解散他们的家臣，把他们的城堡夷为平地，又成立“星室法庭”，惩办那些不驯顺的贵族。

都铎王朝的君主们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尽量拉拢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新贵族或圈地养羊，或经营工商业，把自己的利益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国王从他们当中大量提拔官吏。这时的资产阶级（手工工场主、大商人和银行高利贷者）力量还不够强大，愿意在封建王权的卵翼下求得发展，而国王则需要依靠他们，以便弄到金钱维持庞大的统治机构。因此，这个时期的国王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保护工商业，奖励航海事业，并通过召开国会的方式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联盟。双方就这样在互相依存中求得发展。然而英国王权的巩固和发展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摆脱罗马教廷的羁绊。

天主教会听命于罗马教皇，它在英国占有大片地产，又凭特权聚敛财富，将大量英国钱财输送到罗马教廷金库。英国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对罗马教廷的搜刮难以忍受，权势业已强大起来的英国国王特别不能容忍教皇干涉英国的宗教与政治事务。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则觊觎教会财富，等待时机抢夺教会财产。这些因素导致英国国王自上而下地推行宗教改革。早在14世纪时，“宗教改革的启明星”威克里夫便主张教会不能服从教皇，应归国王管辖。到16世纪，英国国王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蓬勃兴起的形势下才将威克里夫的这种主张变成现实。

16世纪20年代，罗马教皇迟迟不批准英王亨利八世的离

婚请求，这一非常事件成为英王改革教会的导火线。

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即位之初，出于外交上的需要，同他的寡嫂卡特琳结了婚（卡特琳是西班牙王室的公主）。他们婚后生了6个儿女，但多夭折，唯有玛利公主长大成人。起先，英国和西班牙关系较好，亨利八世曾援助西班牙与法国作战。但1525年以后，英、西两国开始争夺海上霸权，矛盾不断增长，亨利八世便借口无男嗣继承王位，要与卡特琳离婚，准备在离婚后娶英国贵妇波麟安为王后。亨利八世派遣约克大主教兼国王的枢密大臣屋尔西去同罗马教皇磋商，请求教皇解除他与卡特琳的婚约。教皇感到十分为难，因为卡特琳是西班牙王兼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的姑母，



亨利八世像

而意大利此时正处在德国皇帝的控制之下，教皇怎敢得罪查理五世而批准英王离婚呢？由于教皇支吾其词，始终不肯同意亨利八世解除婚约，英王便恼羞成怒，同教皇撕破面皮，公开决裂，并开始推行宗教改革。

亨利八世认为约克大主教屋尔西未办成他的离婚案是与教皇串通一气，蓄意谋叛，于1529年撤消其枢密大臣职务。1530年11月30日，

屋尔西在被解往法庭受审途中死去。这位红衣主教还兼任罗马教廷驻英国的代表，他在英国被革职和受审，是英王对教皇权威的第一次挑战。1531年1月，亨利八世指控英国所有教士接受教皇代表的命令是对国王的背叛，于是对他们罚款10万英镑，并强迫教士们承认国王是英国教会的唯一首脑。1532年，又强迫教士会议承认：未经国王同意，教会无权召开新的宗教会议，无权制订新的教规；现行教规必须由国王指派的专员审查，凡是与国家法令相抵触的条文应一律废除。国会还通过决议：英国的宗教法庭改为国王法庭，由国王审判教徒；禁止任何英国人向教皇上诉，取消教皇法庭对英国国民的最高审判权。1533年，国王下令禁止英国教会向罗马教廷缴纳年贡。同年，亨利八世任命亲信托马斯·克兰麦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责成他宣布国王本人与卡特琳的婚约无效，并由他来主持国王同新王后波麟安的婚礼。1534年，国会通过“至尊法案”（“最高权威法”），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在世间的唯一最高领袖”，拥有任命教会各种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也有矫正各种“异端”及“流弊”的权力，对否认国王的宗教权威者以叛国罪处死。“至尊法案”并非一纸空文，1535年夏，两位知名人士——枢密大臣、卓越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摩尔和主教约翰·斐塞尔就因为否认国王为“英国教会的元首”而被送上断头台。至此，英国教会的领导权完全转入国王之手，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割断关系，变成国家教会，称“安立甘教会”。安立甘(Anglican)意为“英格兰的”，安立甘教会即英国国教，汉译

为“圣公会”。

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国王、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乘机抢夺修道院的财产。亨利八世时，英国有修道院800多座。每座寺院都有大量土地财产；修道僧生活腐化，道德败坏，臭名昭著，而且一贯追随教皇，反对英王。1536年，英王对修道院发起攻击。他派出调查团搜集材料，揭露修道院的丑行，制造舆论。收到调查报告的国会议员通过决议，封闭376所较小的寺院。1539年又通过新法案，封闭一切修道院，其财产全部没收。政府将没收来的财产，少量用于兴办学校，绝大部分为王室所得，亨利八世由此获得5000万英镑的收入。国王将寺院土地大量赏赐给他宠信的人，或廉价出售给官吏、贵族和商人，他们又把它转卖给乡绅和农业资本家，发展成资本主义农场。

亨利八世的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给罗马教廷以沉重打击，教皇保罗三世虽宣布开除他的教籍，但他仍“我行我素”，置若罔闻。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成就主要表现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在思想信仰和教会体制方面却进步甚微。天主教会的主教制及重要的教义、仪式依旧保留下来，甚至亨利八世有时还自命为一个“虔诚的大公教徒”（即天主教徒）。他担心人民群众在宗教改革道路上走得太远，故制止路德和加尔文思想在英国自由传播。1539年，他指使国会通过《取缔分歧意见六条款法案》，对否认原天主教主要教义的人要严加惩处；如忽略圣事或否认圣餐中饼酒的“化体说”的人要列为“异

端”，处火刑烧死。重申神甫必须坚持独身；禁止普通信徒在圣餐仪式中饼酒同领；强制实行向神甫私下认罪等。1543年，亨利八世又发布命令，禁止人民群众自由阅读《圣经》。因此，与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相比，亨利八世的英国国教（安立甘宗）是基督教新教中最保守的派别。它与天主教的主要区别只在于教会的最高首领不是教皇而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实际上是利用人民大众要求革新宗教的愿望，打起改革的旗号，把英国教会转化为英国专制王权的政治工具。

亨利八世死后，幼主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在位）继位为王。他的摄政会议成员大部分是从剥夺教会财产中获得利益的新贵族，他们辅佐爱德华六世继续进行宗教改革。1547年，国会决议取消了亨利八世颁布的镇压“异端”的《六条款法案》，放宽政策，准许有限的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于是路德的、慈温利的和加尔文的思想学说在英国传播开来，并对英国国教发生一定影响。英国国教的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参照天主教、路德教和加尔文教教理的仪式编写出国教的《公共祈祷书》，经政府批准后采用。在这一《公共祈祷书》中，尽量简化宗教仪式，用英语作礼拜，以《圣经》作为信仰的根基。与此相适应，他草拟的《四十二条信纲》是英国国教基本信条的最初蓝本。总之，在爱德华六世时期，英国国教在改革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但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1553年爱德华离开人世，玛利女王（1553—1558年在位）上台执政后，天主教势力在英国一度复辟。

玛利身为英国君主，却与英国的劲敌西班牙王室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她虽为亨利八世的女儿，但却是西班牙王室的近亲，她的生母正是亨利八世一直要离弃的王后卡特琳。玛利登基后，于1554年与笃信天主教的西班牙王腓力二世结婚，使英国的政治与外交受西班牙的牵制，卷入西班牙对法国的战争，1558年英国丧失了法国境内的加来港。玛利女王的这项外交政策在国内本来就不得人心，但她还公开反对宗教改革，复辟天主教。她强迫国会废除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的改革条例，与罗马教廷弃嫌修好，向教廷递送一份请求恕罪的《请愿书》，重新承认罗马教皇为教会首脑，接纳一位教廷使节进驻英国，并恢复罗马教廷在英国的征税权。她在英格兰重新起用天主教会的主教，恢复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并残酷迫害新教徒。新教徒中以“异端”罪被判火刑烧死者近300人（包括知名人士克兰麦、大批加尔文派和再洗礼派的信徒），还有不计其数的人死于狱中。故人们称女王为“血腥的玛利”。

玛利女王只统治了5年便死去，亨利八世与波麟安王后所生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继位为王（1558—1603年在位）。她否定玛利女王的宗教政策，全面恢复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法案，重立安立甘教会为英国国教。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旨在加强英国专制君主的统治权力，但也考虑到要为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所能接受，其改革内容大体有如下几方面：（1）1559年，在女王授意下，国会通过了《最高权与统一的新条例》，再次否定罗马教皇对英国

教会的领导权，规定英国教会直接归国王管辖，伊丽莎白女王为“教会的元首”，全体神职人员必须向女王陛下宣誓效忠，否则革职查办。

(2) 在教会组织上，保留传统的主教制，避免其它新教那些较民主的组织形式。

(3) 将克兰麦编写的《公共祈祷书》略加修改后，正式确定为安立甘教会礼拜仪式的标准，其它任何教派的礼拜仪式一概废止。(4) 女王亲自审定国教教义，将克兰麦草拟的《四十二条信纲》修改成《三十九条信纲》，

1571年由国会通过后，正式作为英国国教的官方教义，一直沿用至今。

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时，安立甘教会的国教地位最后确立。它充当英王对人民群众进行专制统治的工具。国王强制人民信奉国教，其它一切教派均无合法地位。效忠于国王的国教神职人员严密监视群众的思想行动。按女王命令，凡一个月不遵国教教堂礼拜者罚款20英镑；对坚持天主教信仰和不愿按国教仪式礼拜的新教徒，第一次没收财产，第二次判处1年徒刑，第三次终生监禁。她对“异端”分子的残酷镇



伊丽莎白一世像

压，比亨利八世有过之而无不及。

国王的暴虐统治必然导致广大人民展开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同时，过去一度与国王结成联盟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也开始同国王发生齟齬。在都铎王朝初期，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羽毛未丰，需要国王的扶持与保护。但到16世纪后半期，随工商业的发展，他们的力量日益壮大，就没有必要再寄人篱下，仰赖国王了。从伊丽莎白晚年到斯图亚特王朝，国王将许多商品的专卖权出售给宫廷宠臣，限制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发展。所以从1597年起，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国会不断向国王提出抗议，开始了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既然英国国教是专制王权的驯服工具，那么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必然会以宗教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清教运动在英格兰兴起。

英国国教是国王为强化专制统治的需要建立起来的，而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所需要的却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廉俭教会，故对伊丽莎白女王不彻底的宗教改革政策感到不满。从16世纪60年代起，英国出现一些不遵从国教的信徒，叫做“不从国教者”。其中多数人主张教会独立，摆脱国王的控制，并以加尔文教精神对国教的组织、教义和仪式作彻底改造。他们指责国教是“一片腐败”，要求“纯洁”、“净化”教会，“清除”国教中的天主教影响，精简宗教仪式，取消教堂中华丽的装饰品、圣像、祭坛、彩色玻璃和大风琴音乐等；还反对封建王公的骄奢淫逸，主张过“清俭廉洁”的生活。基于这些主张，他们被称为“清教徒”。清教徒

(Purita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purus,原意为“清洁的”、“纯净的”。

随加尔文教在英国的广泛传播,到16世纪七八十年代,清教徒数目迅速增加。1572年,许多资产阶级清教徒向国会提出改组教会的要求,主张废除主教制,采用加尔文教会的长老制。他们的主张在下议院得到广泛的支持。在英格兰各地,清教徒纷纷脱离英国国教,建立不受国王管辖的教会组织。各地清教徒从本地富裕教徒中选举出长老和执事,与牧师共同管理一个地方的教会事务,又由各个教会的长老代表组成宗教会议,为清教徒教会的最高权力机关。随着斗争的发展,至16世纪末,清教徒开始分化为两派。一派为长老派,继续坚持实行长老制。该派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上层利益的温和派。另一派是独立派,代表中、小资产阶级,中、小新贵族和城市贫民的利益。独立派强烈要求废除商品专卖权,要求自由发展工商业。反映在宗教问题上,他们要求每个地区教会或每个教堂独立自主,不设教务行政上的各级总机构,各教堂由教徒群众共同管理,以民主方式选聘牧师领导礼拜和布道;在教义上,主张教徒可以自由解释《圣经》,各教区可自行决定礼仪等。这是基督教教会体制中的“公理制”(即公共管理)的起始。

清教就是英国的加尔文教。恩格斯指出:“加尔文的教会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1页)当时英国

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用清教徒组织与国王控制的国教教会相对抗，实质上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路。伊丽莎白及随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历代国王都极端仇恨清教徒，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致使数以万计的清教徒流亡海外，部分逃亡荷兰，部分逃往北美洲殖民地。

1620年9月12日，一批逃避迫害的清教徒，男女老幼共102人，搭乘“五月花号”商船，从英国西南海岸的普利茅斯港启程，在大西洋上航行，向预定的目的地——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进发。但遇风浪，船被迫改变航向。经过9个星期的艰苦航行，于11月21日在今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科恩角登陆。他们在海边搭起简陋的木屋，定居下来，建立起清教徒的第一个殖民地，并命名它为“普利茅斯村”。当他们刚踏上北美土地时，缺衣少食，生活十分困难，多亏附近印第安土著居民的接济才度过到北美后的第一个严寒的冬天。第二年，他们在印第安人帮助下学会种植玉米、荞麦和饲养火鸡，获得了丰收。为了庆祝丰收并感谢上帝的“恩典”，他们制作南瓜饼、玉米点心和烤火鸡，大开筵席，举行游艺活动。此后，年年庆祝，并推广到北美各地。这就是美国全国公民的盛大节日——“感恩节”的来历（感恩节日期屡有更改，最后定为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乘“五月花号”商船流亡北美的这批清教徒，在英国饱受国王封建专制政权迫害之苦，向往着到陌生的土地上自由地建立新生活。他们在流亡北美的航行途中，接加尔文的观

点拟订了一个建立新生活的政治纲领——《五月花公约》。1620年11月11日，他们在航船上庄严宣誓，约定在新的土地上要组织清教徒的“公民团体”，制定“公正而平等的法律、法令、规章……官职”，人人保证服从和信守这样的法律。后来他们在普利茅斯村组成清教徒的“公民团体”，按《五月花公约》条规治理这块殖民地达半个多世纪。《五月花公约》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在后来的美国《独立宣言》及《美国宪法》中有所体现，故人们说清教徒的《五月花公约》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治纲领。

17世纪初，虽有不少清教徒被迫逃离英国，流亡海外，但大多数清教徒仍留在国内，继续进行反封建斗争。1640年，举世闻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披着宗教外衣的革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把清教作为战胜国王的旗帜，利用清教进行宣传和组织群众。清教徒，特别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曾在革命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所以，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家常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清教徒革命”。在复杂而又曲折的革命进程中，各个阶级和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又常以清教各派、英国国教和天主教间的相互斗争表现出来。经过反复较量，最后，当斯图亚特复辟王朝企图恢复宗教改革前天主教的统治地位时，资产阶级、新贵族及部分封建土地所有者，不论是国教信徒或清教徒，都联合起来，发动政变（1688年），推翻复辟王朝，建立起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君主立宪政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至此结束。新的统治者威廉三世于1689年颁布国会通过的

《容忍法》，除确定安立甘教会的国教地位外，还承认其它新教各派的信仰自由。英国国教本身，在17世纪革命过程中几经变迁，也明显地加尔文教化，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宗教。

17世纪英国革命结束后，资产阶级跻入英国统治阶级的行列，“商人或工厂主本人，对自己的伙计、工人和仆役来说，是站在主人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取得尽量多和尽量好的劳动；为此目的，就必须把他们训练得驯服顺从。他自己是信教的，他的宗教曾经是他用来战胜国王和贵族的旗帜；不久他就发现这同一个宗教可以用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那些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主人的命令”。业已掌权的资产阶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而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依然是宗教”。因而他们“确信有必要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绪”，“年复一年地继续把成千上万的金钱花在向下层等级宣传福音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3—394页；401页；398页）。此后，从宗教改革中产生的基督教新教各派就充当起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来了。

四 “无可奈何花落去”—— 天主教会的徒劳挣扎

封建社会必然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代替，这是不以人们的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可是，西欧最顽固的封建集团——罗马教廷，为维护自身的封建政治特权和剥削利益，竟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在16至19世纪的社会大变动时期，曾掀起一股股逆流，以百倍的疯狂反对革命和任何进步的变革。然而螳臂挡不住历史车轮的前进，宗教改革运动和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取得成功；意大利人民也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把衰老腐朽的教皇国送进坟墓，连罗马教皇的世俗统治权力也被剥夺了。天主教会的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教皇无可奈何，不得不退居梵蒂冈，躲在深宫内院里“向隅而泣”。

在最近几个世纪中，天主教会是怎样节节败退，每况愈下的呢？天主教会在近代经历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16世纪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削弱了罗马教廷的封建神权统治，使天主教会在西欧的势力范围大大缩小，陷入严重的危机中。教皇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纠集西欧一切封建反动势力，对宗教改革运动进行反扑。

教皇的第一个重大反动措施是批准成立一个新的修会组织——“耶稣会”。它在教皇导演的反宗教改革的闹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耶稣会的创始人是西班牙的一名贵族军官伊纳爵·罗耀拉（1491——1556年）。他青年时代是个凶狠好斗的军人。1521年在潘普洛纳城与法军作战时伤折右腿，经治愈后，成为跛子，不能再继续戎马生涯，遂改而从事宗教职业，成为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卫道士。这时，新兴资产阶级的宗教改革运动方兴未艾，那些与教廷有矛盾的国王也乘机夺取本国教

会的领导权，摆脱教皇的羁绊。罗耀拉眼看罗马教皇的统治摇摇欲坠，而天主教原有的各修会组织又腐败无能，遂网罗一批西班牙贵族，按军队的形式，于1534年创建一个誓死保卫教皇的修会组织——耶稣会（一名“耶稣连队”）。他们向教皇请命，准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使用任何手段与



伊纳爵·罗耀拉像

背离天主教会的新教徒作殊死斗争。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正式批准成立耶稣会。1541年，罗耀拉当选为该会第一任总会长。

耶稣会既从事宗教活动，又从事政治斗争。它的宗旨是：重振罗马天主教会，重新树立教皇的绝对权威。该会自称是为“愈显主

荣”而战斗的“耶稣连队”，即在“一切为扩大上帝的荣耀”的旗号下，剪除各种背离罗马教皇的“异端”派（路德、慈温利、加尔文及其追随者），夺回天主教失去的思想阵地，并在全世界不断扩大“上帝的国”（即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为达到上述目的，耶稣会士什么丑事都干得出来。他们的一句格言是“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耶稣会允许会员撒谎、破坏誓言、诬告、贿赂、放毒、暗杀……，各种罪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一切罪行，只要宣称其动机是为了维护天主教的利益，都被认为是正确的。

耶稣会有严密的规章和严峻的纪律。它的成员要经过15年以上的严格训练。初入会时，同其它修会的修士一样发3个誓愿，即誓守清贫、贞洁和听命。然而经过一段时期的训练后，还要发第四个誓愿，即宣誓效忠罗马教皇。耶稣会向会士灌输“教皇至上”的思想，宣扬教皇高于国王，声称教皇是“牧人”，国王仅是“牧羊人的狗”。耶稣会的“理论家”罗伯特·拜拉明要求人们绝对服从教皇的意志时曾说：“如果教皇命令作恶，或禁止修德，教会就必须坚信作恶是好事，修德是坏事；否则教会就犯了违背良心的罪，因为教会必须服从教皇的判断，遵照教皇的指示办事。必须坚信，凡教皇指示的便是善，凡教皇禁止的便是恶。”根据同一精神，在耶稣会组织中，每个会士必须绝对服从上级。《耶稣会章程》明文规定：“每名会士应勉励自己，完全服从上帝通过他们的长上实行的统治，听从长上的指挥，如同自己是一具死尸那样，可以任意摆布；或者如同老人的手杖，服事掌握它的主人，听凭主人任意使用。”罗耀拉解释说：“如果教会认为白的是黑的，应当相信这是对的，耶稣会士应把自己的上级视作基督本身。”因此全体耶稣会士必须服从总会长。总会长亦称“将军”，他对所有的会员都有绝对的统治权，故人们称他为“黑衣教皇”。他常住罗马，指挥着世界五大洲的耶稣会组织。全世界的耶稣会组织分成若干省区，每个省区包括几个国家。省区会长领导该区耶稣会组织，严密控制下属会员，要求他们定期作“信仰汇报”，详细报告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各省区会长又定期向总会长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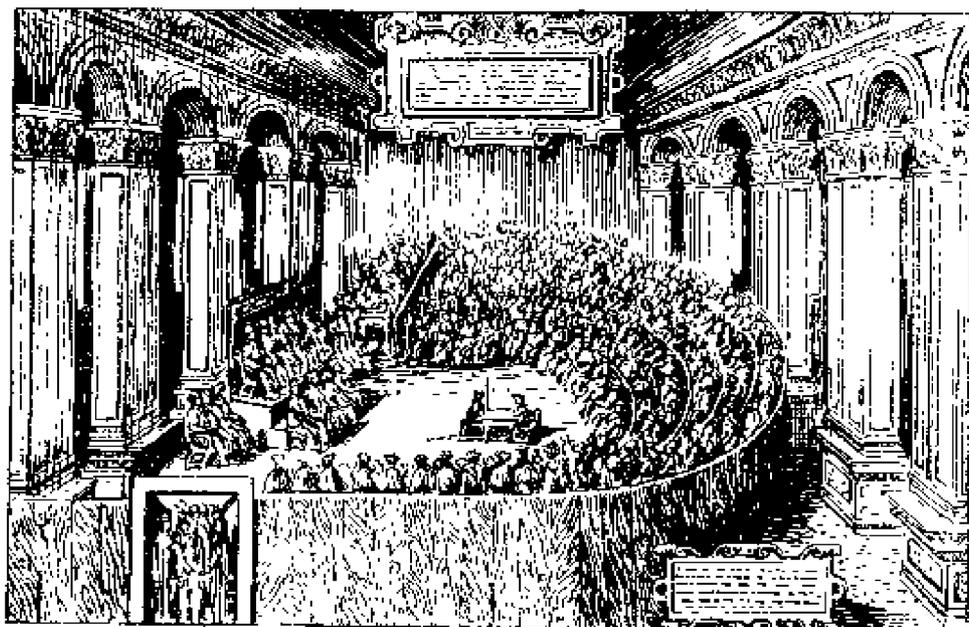
情况。这样层层统御，所有的耶稣会组织都服从总会长统一领导，由总会长遥控指挥。18世纪初，耶稣会总会长塔姆布林曾得意洋洋地对人说：“……我在这间屋子里（指总部办公室）不仅指挥着巴黎，而且指挥着中国；不仅指挥着中国，而且指挥着整个世界。”

耶稣会成立后，充分发挥其罗马教皇的“黑衣卫队”的作用。耶稣会士与其它修会的修士不同，他们不住修道院隐修，也不穿僧衣，而是随机应变，以各种身份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中，与俗人自由来往。不少人跻身上层社会，结交权贵，在各国宫廷中充当忏悔神甫或宗教顾问，对国王施加影响，以便抑制新教的发展，巩固天主教在这些国家中的地位。对那些不愿听任教皇摆布或支持新教的国王，耶稣会则施展各种阴谋予以打击甚至暗杀。1594年，他们企图谋杀倾向于新教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17世纪初，英王詹姆士一世继续推行英国国教，否认教皇权威。英国耶稣会会长便策划于密室，图谋在詹姆士一世到议会开会时将他炸死。由于阴谋败露，未能得逞。另外，人们还指控耶稣会曾企图杀害荷兰统治者威廉·奥兰斯基、葡萄牙国王乔治一世、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等。

耶稣会士的足迹遍天下。为弥补宗教改革中失去的信徒和教会财富，耶稣会士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传教十分卖力，成为殖民主义者的得力助手。耶稣会帮助西班牙、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在中、南美洲、非洲和亚洲许多地区建立起殖民统治，同时扩大了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和增加了教会财富。

为了同新教各派争夺思想阵地，耶稣会特别重视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在西欧各国开办耶稣会大学、神学院和其它学校；同时成立许多印刷出版机构，出版神学书刊，扩大天主教的思想影响。在某些新教有所发展、天主教失去优势的地区，由于耶稣会控制了那里的宣传大权，使天主教会在地恢复统治地位。德意志南部和东南部、波兰、匈牙利的情况都大致如此。

罗马教皇除利用耶稣会这一反动政治工具外，还在意大利北部的特兰托召开天主教宗教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1)在不违背天主教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腐败的教会组织作某些改良，以便振兴教会，稳定教皇的集权统治；(2)弥合教会内部的裂痕，纠集天主教势力与宗教改革运动对抗，



特兰托宗教会议

扑灭“异端”。会议从1545年12月开场，时断时续，历时18年，至1563年才宣告结束。会议通过多项重要决议：判定新教各派为“异端”，谴责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学说；肯定天主教传统的教义、仪式完全“准确无误”，必须严格遵行，不许调和或作任何改变；再次确认教会和教皇的权威地位，称唯有教会才有权解释《圣经》，教皇是教会的最高首脑。决议中说：“教皇是一切法令的唯一代表，如有誉议既成习惯和教会制度的，当受咒诅！”故天主教会的一切传统和陈规陋习都依然如故，连臭名昭彰的赎罪券都照样出售。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挽回教会的威信，重申了神甫必须坚持独身的规定。

根据特兰托会议精神，天主教会对新教采取各种镇压措施。一方面是对出版事业严加管制，发布禁书目录，禁止刊行路德、慈温利和加尔文的著作，甚至连非官方的通俗拉丁文《圣经》译本都被禁止。另一方面是加强异端审判法庭的机构，以血腥手段剪除“异端”。在天主教各国封建统治者中，反对宗教改革表现最疯狂的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1556—1598年在位）。他利用异端审判法庭在国内镇压“异端”派，大肆搜捕新教徒，在1559至1560年间，连续进行5次大屠杀，西班牙的新教徒几乎被斩尽杀绝。据统计，在15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140年间，西班牙人口未见增加，还锐减300万人。在西班牙异端审判法庭活动最猖獗的18年中，被控告者有114000人，被火刑焚死者10220人，被判终生监禁或公开悔罪者有97000人。天主教统治者对人民的残

酷镇压，是封建主阶级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

无论封建反动势力设置多少障碍物，都阻挡不住革命运动的滚滚洪流。就在腓力二世统治时期，尼德兰人民举着加尔文教旗帜，通过武装革命，摆脱西班牙国王的控制，成立了荷兰共和国，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一时成了各国受迫害的新教徒的避难所。半个多世纪以后，西欧发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二次大决战——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他们举着清教的旗帜，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新教各派在英国得到了信仰自由。罗马教皇要扑灭资产阶级新教的美梦象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

18世纪后半期，爆发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这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三次大决战，也是一场第一次完全抛开宗教外衣的革命。革命前，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曾对基督教进行了批判。在革命进程中，急风暴雨般的革命运动对处于法国国教地位的天主教进行了猛烈冲击。教会的什一税被取消；教会的土地财产被没收；教堂和修道院被封闭；站在王党一边的反动神甫或被流放，或被处死；大部分主教、神甫被迫放弃神职，宗教活动被迫停止……整个法国的天主教会被冲得七零八落，陷入瘫痪状态。

法国事态的发展使罗马教皇庇护六世（1775——1799年在位）心急如焚，他对法国革命怀着刻骨仇恨，下令开除法国革命者的教籍。1791年6月30日，教皇发表通谕，一方面给垂死的法国封建王党输血打气，另一方面则歇斯底里地咒骂法国人民，威胁说：“我们的力量将联合起来反对你们。”欧

洲的封建反动势力在教皇的支持下多次联合起来，武装干涉法国革命。1792年4月，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开战，教皇十分满意，并为反动派的“胜利”而祈祷。8月8日，教皇致函奥地利皇帝，感激地说：“您具有这种精神，上帝已经以秋收丰盛的神恩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自从您一开始执政，就致力于以武装力量征服您强大而顽固的敌人，致力于在他们的国家中重建教会和重建法兰西，把所有用武力从我们手中夺去的东西归还给我们。”可是教皇的祈祷和国际封建反动势力的多次武装干涉都是徒劳的，法国革命人民终于推翻千年的封建制度，跨入资本主义社会。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在节节胜利，然而罗马教皇仍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破坏意大利民族民主革命。

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意大利仍是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被分割为8个封建小邦和地区，多数小邦都在外国（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占领军的控制之下。意大利人民反对外来侵略，争取祖国统一和摆脱封建压迫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贵族也要求实现国家统一，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故19世纪是意大利革命最活跃的一个世纪。

尽管从19世纪起，罗马教廷和西方各国天主教会组织逐渐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把教会的巨额收入投资于资本主义企业，在经济上和思想上逐渐转向资产阶级，但罗马教皇仍保留着一条粗大的“封建尾巴”——教皇国。教皇国正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封建小邦，拥有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和300万臣民。由于教皇不愿放弃教皇国的领地和这个封建

国家的世俗统治权力，他顽固地站在意大利人民的对立面，疯狂破坏革命，千方百计阻挠意大利实现国家的统一。

在19世纪的教皇国里，“豺狼当道，虎豹横行”，到处是教皇的密探，只要根据简单的告密便可以逮捕人和判刑。有个教区的主教曾许诺发给告密者有效期10年的赎罪券以资奖励。教会视意大利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者为眼中钉，经常以“渎神罪”将他们逮捕监禁，监狱里关不下，以致罗马的许多公共建筑物也用来囚禁政治犯。罗马教廷抓不到著名的革命者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等人，便宣布开除他们的教籍。教皇用一切最恶毒和污秽的语言——“豺狼”、“叛徒”、“变节者”、“犹太”、“法利赛人”、“伪善者”、“发臭的尸体”、“撒旦^①的后代”、“现世恶魔”……——咒骂为意大利统一而斗争的爱国志士。教皇审判厅的法官、红衣主教里伐罗洛在1825年1年之内，便判处586名民主主义者以死刑。

尽管罗马教皇拚死反对，但统一意大利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问题。意大利各阶层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在1861年3月宣布成立意大利王国，统一了祖国的大部分地区，唯有罗马周围的教皇国因依恃法国占领军的保护才暂时没有被统一进去。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驻扎在教皇国的法军撤走，意大利政府军和加里波第志愿队趁机开进教皇国，9月20日占领罗马。10月，举行公民投票，教皇国

^① 撒旦是希伯来文Satan的音译，其原意为“抵挡”。在《圣经》中为魔鬼之名。

居民几乎是全体一致赞成并入意大利，在罗马城里支持教皇反对统一的仅有46票。结果，罗马被宣布为意大利首都，教皇国的数万平方公里领土，除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小山丘外，全部并入意大利王国版图。

罗马教皇庇护九世（1846——1878年在位）被迫退居梵蒂冈后，对失去教皇国领土和世俗统治权力耿耿于怀。他拒不承认意大利的统一，拒绝接受意大利政府提出的“教皇保障法”（即政府承认教皇在梵蒂冈有自主权并给予巨额经济补偿），更自称是“梵蒂冈囚徒”，发誓不走出梵蒂冈一步，以示抗议。以后的几任教皇，也持同样态度。可是，社会在进步，人民要前进，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罗马教皇妄想恢复封建主义的教皇国，事实上已没有任何指望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半个世纪以后，教皇庇护十一世（1922——1939年在位）不得不面对现实，于1929年2月11日同意大利政府签订《拉特兰条约》，主要内容是：教皇正式承认意大利王国，承认罗马为意大利首都；作为交换条件，意大利政府承认教皇拥有独立的梵蒂冈城，有派遣和接受使节的权利；承认天主教为意大利国教；政府付出18亿里拉（意大利货币）巨款，补偿教皇国结束后罗马教廷的经济损失。

根据《拉特兰条约》，1929年7月，罗马教廷成立至今仍存在的“梵蒂冈城国”。这个城国是世界天主教会的首脑机关——罗马教廷的所在地，领土面积仅有0.44平方公里，主要是一群宫廷建筑（包括教皇的拉特兰宫、甘多尔福夏

宫、圣彼得大教堂、博物馆和图书馆等)。全国有公民权的公民不满千人，大多数为神职人员。当今的教皇就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的元首，他的领土和政治权力与中世纪教皇权势鼎盛时期相比，真是相形见绌，不可同日而语矣。

五 “变色龙”的演化——封建的 天主教会转向资本主义

罗马天主教会是条巨大的“变色龙”。中古时期，天主教是封建主阶级的宗教，教会组织是封建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罗马教廷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尽管在16至19世纪，它曾拚死反对新兴资产阶级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恶毒诅咒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意大利的统一事业，然而当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各国确立后，这条“变色龙”便适应新的环境，将十字架与资本结合起来，使各国的天主教会从封建性组织转化为资产阶级的组织，罗马教廷从欧洲封建统治的国际中心转化为庞大的国际金融托拉斯，主教和神甫们则从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封建主的天主教为什么要向资产阶级的宗教转变？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资产阶级需要天主教这一精神武器，天主教会则需要依附于资产阶级而生存。

在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虽比封建主阶级进了一步，但它毕竟是个剥削阶级，它的统治仍然需要宗教这一精神武

器。法国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期虽然抛弃了宗教外衣，批判宗教，扫荡天主教会，可是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却又需要宗教了，于是重新捡起被他们一度抛弃的精神武器——宗教。关于这一点，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保尔·拉法格说得对：“……在18世纪，资产阶级是被统治阶级，它反对僧侣支持的贵族，它当时是伏尔泰派^①，甚至与无神论调情。但是它刚一掌握政权，便立即倒戈，急忙皈依先辈的宗教；这时它不再害怕宗教麻醉剂，并尽量利用这种手段为它自己的利益服务；它通过法令恢复当初按照它的法令废除的上帝，重新建立起被它推翻的祭坛，负责赡养它自己从前驱通和迫害的神甫。”（《保尔·拉法格文集》，第3卷第435页）

拿破仑上台执政，他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就是与教皇谈判，在法国重建天主教会。拿破仑并非虔诚的信徒，他恢复天主教无非是为了巩固法国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另一方面，教会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甘愿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服务。1801年，拿破仑与罗马教皇庇护七世达成协议，承认天主教为“大多数法兰西公民的宗教”，恢复礼拜活动。协议规定：大主教和主教由法国政府任命，并向法国政府宣誓效忠；主教任命的神甫也要经政府批准才能任职；教皇表示不再要求归还革命时期没收的教会土地财产，法国政府则答应教会经费由政府拨给。这样，法国天主教会恢复活动，开始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效劳。

^① 伏尔泰是18世纪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他以毕生精力揭露和批判黑暗的封建制度和腐败的天主教会。

拿破仑恢复天主教的政策没有失算，教会在法国所有学校中使用拿破仑亲自审订的必修课本《教义问答》，课文中“效忠上帝”的词句多已改为“效忠皇帝”；还有一些这样的条文：“上帝……要拿破仑皇帝成为行使自己权力的工具，成为自己在人间的化身”；“基督徒应该对统治他们的拿破仑皇帝陛下表示爱戴、尊敬、顺从和忠诚，应该服军役和纳税……”；“谁反对拿破仑皇帝，谁就是反对上帝所建立的制度，谁就要终生受谴责，他的灵魂将永远毁灭，堕入地狱……”这些课文成了学生们必须背诵的“圣律”。天主教会如此积极地为新主子效力，难怪拿破仑这位资产阶级皇帝得意地把他手里的三大政治工具并列在一起说：“我的地方官吏，我的主教，我的宪兵。”拿破仑在法国恢复天主教会，说明法国资产阶级已开始利用天主教这一精神武器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这是天主教向资产阶级宗教转化的一个较早的事例。

资产阶级统治在欧美各国稳定地确立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而且资本也开始渗入天主教会中。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教会把它的巨大财富投入工商企业中，从中捞取利润。从此教会悄悄地从封建主为主的组织向资产阶级组织转变。

19世纪晚期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加强对本国工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和掠夺，并广泛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成就，使资本主义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世界

工业总产值增加了两倍多。正是在这个时期，天主教会大规模地与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起来。

19世纪下半叶，法国天主教会的各个修会开始兴办缝纫厂、糖果厂、商店及旅馆。许多女修道院还以办慈善事业为名收容成千上万的寡妇、孤女充当女工。女工们受着修女的严密监视，不许与外界接触。由于劳动条件恶劣和营养不良，女工们患眼病和贫血病的甚多，死亡率极高，教会对她们的残酷剥削与资本家无异。在西班牙，天主教会一直是大地所有者，比其它国家的教会保留更多的封建性，然而到19世纪末，教会组织（特别是耶稣会）已是地主兼大企业家和银行家了。在德意志南部的巴伐利亚，天主教会在20世纪初已拥有大量资本。据1910年统计资料，该地区教会全部财产有71900万马克，其中土地和森林约值10300万马克，建筑物约值29900万马克，而资本就占31800万马克，说明资本主义成份在教会经济中已占很大比重。

梵蒂冈的罗马教廷是世界天主教会的核心，它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全世界天主教会的资产阶级化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意大利统一的过程中，有90万英亩的教会领地被政府没收，但还有40多万英亩的肥田沃土仍保留在梵蒂冈手中，它仍然是意大利最大的地主。然而在帝国主义时代，梵蒂冈已发展为一个实力雄厚的金融资本集团。

罗马教廷建立自己的银行和企业由来已久。尽管在19世纪，因意大利统一问题，教廷与意大利资产阶级之间长期发生齟齬，但在经济上，梵蒂冈早就同资本主义挂上了钩。罗

马教廷于1830年成立了梵蒂冈“贴现银行”；1834年建立“圣灵银行”；1845年成立梵蒂冈的股份公司——“安济加·玛尔却圣水公司”，经营罗马的自来水；1852年，梵蒂冈与英国资本联合组成“英吉利——罗马煤气公司”；1883年从这个煤气公司分出梵蒂冈的另一个企业“英吉利——罗马电气公司”。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统治梵蒂冈达25年之久的教皇利奥十三世（1878——1903年在位），开辟了教会史上教廷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新时期，人们称他是梵蒂冈的第一个“资本主义教皇”。他接受法国投机商邦特的建议，进一步把梵蒂冈的大量财产化为资本，于1880年与意大利的一些大银行家携手合作，创办“罗马银行”，广泛参与金融活动，从事证券投机，并通过贷款等手段对意大利的重要企业实行监督。

教皇利奥十三世本人就热中于证券投机活动，对股票和支票簿有着特别的癖好。他一当上教皇，就下令在他的私人小礼拜堂中安置了一个防火的保险柜，贮存他私有的股票和有价证券，这些证券有法国的、比利时的、巴伐利亚的和奥地利的。几年后，一个保险柜装不下，又添置第二个。教皇本人就是个百万富翁，他的私人财产估计至少有3000万里拉。在他的鼓励下，梵蒂冈的代理人在意大利各地遍设火灾、冰雹和人寿等方面的保险公司。梵蒂冈利用人们的迷信观念，劝告教徒说，参加了教会创办的保险公司便可“消灾免难”。

在利奥十三世时代，梵蒂冈利用从各方面搜刮来的金钱

开办新的企业和扩大投资，成立了梵蒂冈的“电车公共汽车公司”；又通过罗马银行给意大利巴契里家族贷款，创立至今犹存的“庞泰涅拉面粉公司”，垄断了罗马的面包业。同时，梵蒂冈的信贷机构——“罗马银行”、“罗马通用银行”、“信贷银行”和“手工业者银行”拨出巨款，在罗马大量兴建房屋，由梵蒂冈的两家企业（“不动产公司”和“贫苦者和劳动群众房屋建筑公司”）从事房地产的投机买卖。总之，到19世纪末，梵蒂冈的金融资本已垄断了罗马的自来水、电力、煤气、交通运输、面粉和建筑等行业。直至今日，梵蒂冈的资本仍在罗马的经济生活中占着重要的位置。

梵蒂冈的金融活动不限于意大利，到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已渗透到世界各地。“罗马银行”先后在巴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马耳他岛、利比亚的黎波里、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等地建立分支机构，还参与建立阿比西尼亚银行和摩洛哥国家银行。梵蒂冈的银行资金投放到法国的纺织工业和石油公司、阿根廷的动力和交通运输、玻利维亚的锡矿和比利时的橡胶工业等部门中。

“罗马银行”在北非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进行经济渗透，控制了大片田园、轮船公司和其它许多企业。为维护它在北非的剥削利益，梵蒂冈怂恿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府发动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于1911年出兵侵略的黎波里塔尼亚。两年（1911—1912年）的战争给利比亚人民和意大利人民带

来巨大的灾难，但却给梵蒂冈和意大利资产阶级带来超额利润。“罗马银行”大发战争财，1907年它的基金为4000万里拉，到1912年猛增至两亿里拉，它在意大利各大银行中的地位从第五位跃居第二位。

根据1929年2月签订的《拉特兰条约》，梵蒂冈从意大利政府手中得到18亿里拉的“赔款”。这笔收入不仅弥补了梵蒂冈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中因股票下跌所遭受的损失，还益更充实了梵蒂冈金融资本的雄厚基础。

在20世纪的今天，梵蒂冈虽是小国寡民，但却是资本主义世界一个相当庞大的国际金融托拉斯。据不完全统计，它不仅在国外占有大量土地财产，还在意大利和其它国家有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并拥有黄金和外汇储备达100多亿美元。它在许多国家的企业和银行中都有自己的代理人。梵蒂冈与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关系密切，摩根财团保管和经理着罗马教廷的大部分资产。梵蒂冈的利益和命运已经同国际垄断财团及帝国主义政府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因为天主教会组织与资本融合起来，故教会能与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携手合作，加强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统治。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人数众多的、强大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为自身准备的掘墓人。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人运动开始兴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也应运而生。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他

们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此后，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更蓬勃发展开来。到这时，在历史上一贯反对革命和人民运动的天主教会，又成了科学共产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死敌。

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刚诞生，罗马教皇庇护九世（1846——1878年在位）便向他的下属教会发布通谕，谴责科学共产主义是“罪恶的”学说。

在欧洲1848年革命时期，被革命力量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老爷们求助于天主教会，法国的反动政客梯也尔说：“只有教会才能够教导穷人们顺从。”国民议会中的教权派首脑人物蒙泰朗倍尔也唱着同样的调子：对于“基督教的人民，除了用刺刀以外，还可以用其他方法来恫吓他们：凡是得遵守上帝法律的地方，上帝本人就在执行着警察的职务”；现在的问题是“使没有私有财产的人养成尊敬私有财产的习惯……强迫他们去信仰上帝……去信仰制订十诫^①和《教义问答》^②的上帝……这是唯一切实可行和有效的保护私有财

① “十诫”是犹太教及基督教的诫条。《旧约圣经》记载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途经西奈山时，接受上帝所授的10项诫律，作为上帝与以色列人订立的约法。十诫包括：崇拜唯一真神耶和华；不可制造和敬拜偶像；不可妄称上帝之名；守安息日为圣日；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和财产。

② 《教义问答》（教理问答）是教会给一般信徒传授基本教义的教材，以问答形式编成。基督教各教派有各自的《教义问答》。

产的办法。”天主教会通过蒙泰朗倍尔之口公开表示，教会十分乐意以上帝的灵光去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充当资产阶级政府的精神警察。

19世纪后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更进一步发展。法国的巴黎公社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但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充分显示出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19世纪的最后30年中，欧美各国工人队伍不仅人数增加，而且马克思主义深入群众，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纷纷建立起来。1889年7月，成立了第二国际。1890年5月1日，各国工人第一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在欧洲多数国家和美国的许多城市里，千百万工人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种情景使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感到惶恐不安，他们益更需要借助教会的精神力量，从思想上来瓦解工人运动。

1891年5月15日，第一个“资本主义教皇”利奥十三世发表《新事物通谕》（亦称《劳工通谕》）。他假惺惺地对工人群众表示“同情”，承认工人生活贫困，并斥责“丧尽天良的企业家”过度地剥削工人，告诫资本家要“关心”劳动群众的“共同福利”等。其实，教皇的这些话只是骗取工人的好感和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而已，《通谕》的斗争矛头实际上是对准科学社会主义的。

《新事物通谕》竭力反对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学说，为地主资本家的私有制辩护。教皇说：私有财产是“上帝赐予”的和“神圣”的；世

界上总有富人和穷人，社会上的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教皇断言：如果废除私有制，将会使人同动物划等号，因为动物是没有私有财产的，只在大自然中寻找现成的食物。

《通谕》故意混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个人财物的概念，说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对资本家和工人都没有好处，还“危害工人自身”的利益，因为工人也失去了增加自己财产的可能性；如果工人能忍受苦难，勤奋工作，还能发财致富。于是教皇劝导工人不要与资本家作对，应该同他们合作，因为工人缺少资本家无法生活，正如资本家不能缺少工人一样……

基督教历来为人剥削人的制度作辩护，马克思早就指出：“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当基督教为剥削制度辩护时，也会对劳苦群众“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8页）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所作所为不正是这样吗？

最后，教皇没有忘记在《新事物通谕》中提醒人们，基督教的“最高宗旨”是“彼岸世界的生活”，是在来世的“天堂”里享受“永生之乐”，劝告工人群众要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来世，放弃现实生活中的革命斗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列宁全集》第10卷第62—63页）

总之，教皇的《新事物通谕》以“关心”工人的面孔出

现，实际上在宣扬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永恒性”，告诫工人群众忍耐顺从，寄希望于来世的“天堂”，妄图使他们脱离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通谕》的内容证实，罗马教皇与国际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完全沆瀣一气。

罗马教廷不仅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并在西欧各国内部鼓励建立天主教政党，直接参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还普遍号召建立天主教工人群众组织，以便分裂工人阶级，并使他们脱离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为资本家效劳。而且我们不能忘记，在西方资产阶级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天主教会及其教士还充当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将作专章介绍。

六 与殖民侵略血肉相连的传教事业

中古时期，基督教主要流行于欧洲。到近代，西方传教士远涉重洋，把基督教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使它成为遍布五大洲的世界宗教。目前，基督教分布在150个国家和地区。

教会学者和西方资产阶级史家对近代基督教的传教事业赞不绝口，说那些远涉重洋的传教士具有“使徒般奋勇的精神，忍受苦难，而作十字架的精兵”；“无论在通都大邑，穷乡僻壤，都有传道者佳美的足音”；“他们历尽艰辛”，向“未开化的蛮族”“传播西方文明”云云。在这些人笔下，

传教士的所作所为，被描绘得象田园诗一般幽雅和动听。

基督教的海外传教史果真是一部值得称颂的“光荣”历史么？不，它既不“光荣”，也不“文明”。近代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从一开始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政府所发动，它自始至终是殖民侵略活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基督教的海外传教事业始于十五六世纪。那时正值资本主义开始滋生，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之一是殖民侵略和掠夺——西方资产阶级通过征服殖民地，残杀和奴役土著居民，掠夺金银财宝，贩卖黑人奴隶等手段，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资本，为后来建立资本主义大生产创造条件。新航路的开辟和美洲大陆的“发现”为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场所。从15世纪末期起，西欧各国的商人、没落贵族、雇佣兵、传教士、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和亡命徒，组成一支支殖民主义队伍，飘洋过海，争先恐后地涌向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开始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殖民侵略事业，同时也拉开了海外传教的序幕。

西欧最早从事殖民侵略的国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在15世纪初，葡萄牙就开始侵入非洲西北角，建立侵略据点。后来，沿西非海岸南下。1486年，迪亚士航行到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1497年，达·伽马率船队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次年到达印度。从此，葡萄牙的殖民势力从非洲伸延到亚洲。1500年，葡萄牙一支船队在绕道好望角赴印度途中，被风暴吹到巴西，葡萄牙的殖民势力又扩大到南美洲东南部。然而中、南美洲主要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场所。意大利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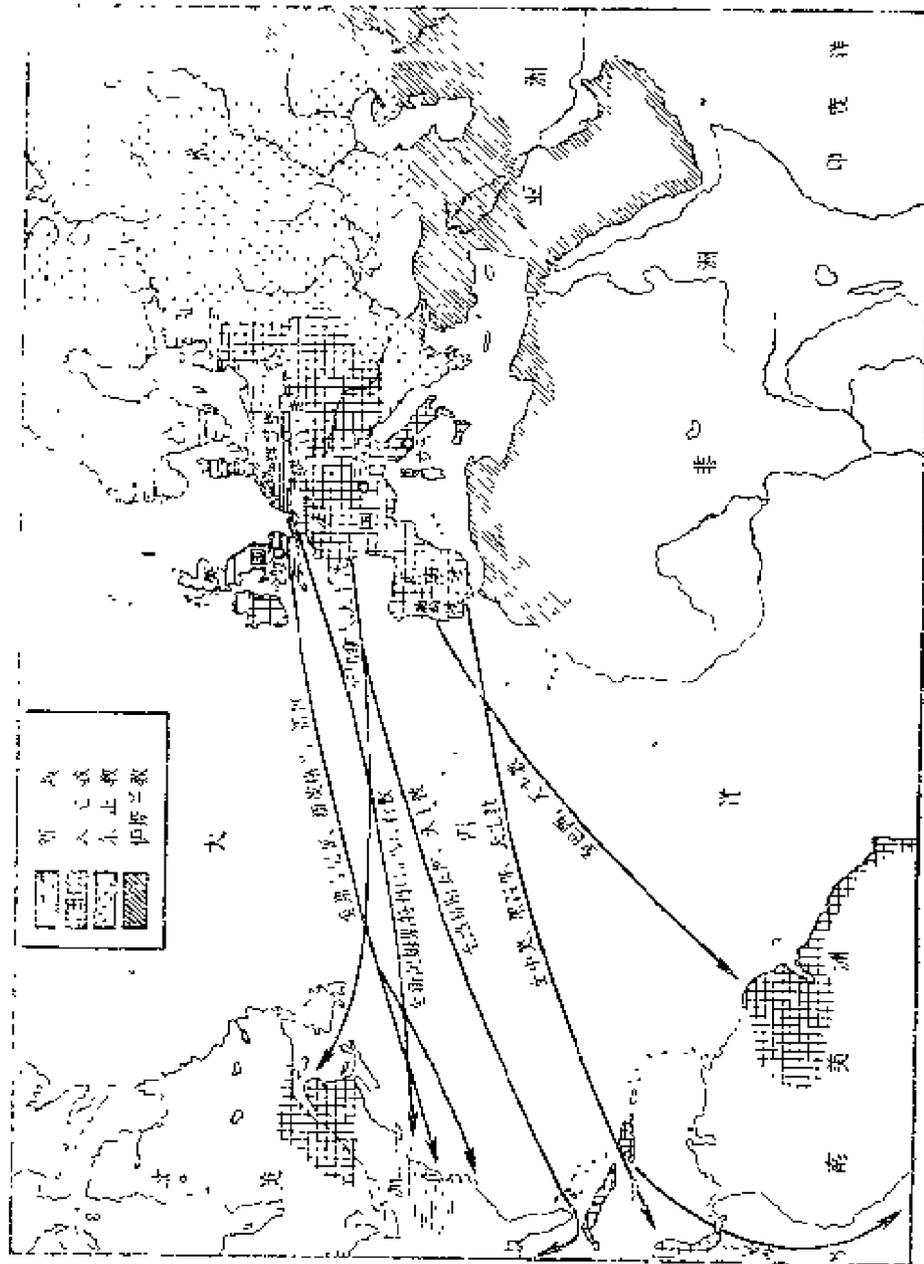
手哥伦布受西班牙王资助，在15世纪末期，带领船队4次西航，先后到达巴哈马群岛、古巴、海地和南美大陆的一些沿海地带。他们每到一地，都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加以占领。以后，殖民主义队伍接踵而来，到16世纪上半叶，墨西哥、秘鲁及中、南美洲广大地区均被征服，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西班牙及葡萄牙的殖民侵略活动一开始便得到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的赞助与支持。15世纪时，天主教会已日趋没落；16世纪时，又受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西欧各国的一部分臣民改奉新教，某些国家的君主也乘机使本国教会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天主教会力量被严重削弱，地盘大大缩小。教皇为了弥补天主教会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受到的损失，提出“在欧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补进来”的口号，积极支持和参与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天主教国家的殖民侵略扩张，企图使欧洲以外的广阔天地完全纳入天主教的势力范围。

1493年3月15日，哥伦布结束第一次航行回到西班牙。5月4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即发表通谕，承认哥伦布“发现”的土地归西班牙国王所有，并要求西班牙王对土著居民传播基督教。

当殖民主义国家发生纠纷时，教皇又充当仲裁者。西欧国家的早期殖民侵略活动刚开始，西班牙和葡萄牙就为争夺殖民地而争吵。哥伦布自以为到了“印度”，葡萄牙人也误认为西班牙势力在“印度”大陆捷足先登，故准备发动军事远征夺取哥伦布“发现”的“印度”土地。为避免这两个天主

教国家发生冲突，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亲自出面调停。经过一年多讨价还价的谈判，双方于1494年6月7日在西班牙



宗教改革后基督教三大派系在欧、美两洲的分布

的托尔德西里亚签署条约。两国接受教皇意见，在大西洋的佛德角群岛以西 370 里加（约两千公里）处，从北到南划一条分界线，即所谓的“教皇子午线”。条约规定：“教皇子午线”以西的一切非基督教国土归属西班牙，线以东的一切土地归属葡萄牙。然而地球是圆的，当麦哲伦环球航行至摩鹿加群岛时，双方再次发生争执。1529年，两国又在教皇的干预下订立新条约，在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即在摩鹿加群岛以东17度处又划出一条分界线。此线以西属葡萄牙，以东属西班牙。根据这两个条约所定的界限，美洲的绝大部分为西班牙的殖民领域，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则为葡萄牙的殖民领域。罗马教皇自称是“基督在世的代表”，以人类的主宰者自居，伙同老殖民主义国家随意瓜分世界。这一点说明教皇是殖民侵略活动的支持者。

几个世纪以来，教皇极重视海外传教事业，不仅鼓励殖民主义国家积极传教，还亲自抓传教的组织工作，1622年在罗马教廷中成立“传信部”，负责欧洲以外各大洲的传教事宜。1627年，又成立“传信大学”（亦称“乌尔班学院”），训练传教士，毕业后派遣他们向亚、非、拉进行渗透。

西班牙等老殖民主义国家在教皇的鼓励和支持下，始终把殖民侵略和传教这两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利用天主教的教义和组织作为征服和统治殖民地的有效工具。

1492年哥伦布首次西航时，他一手拿着西班牙国旗，一手拿着十字架，在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小岛上登陆。他命名这个小岛为“圣萨尔瓦多”，意为“救世主”；并以耶稣

基督之名，宣布该岛为“西班牙国土”。1493年哥伦布返回西班牙并筹备新的远航时，西班牙国王明确指示他，远航的目的任务是“开辟商业殖民地”和“使印第安人改信天主教”。1493年9月，哥伦布第二次西航，随行的传教士有贝尔纳尔·博伊尔等12人。1498年第三次西航时，又有著名的传教士拉斯·卡萨斯随船队到海地传教。此后，传教士随人殖民主义队伍中蜂拥而至。

传教士们要土著居民相信，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到来是为了传播“基督教文明”，使海外各国人民“共享幸福”，建立殖民统治制度是“上帝的意志”，因此是不可抗拒的。在西班牙殖民者侵入美洲时期，由神学家劳毕斯·德·佩拉西奥斯·罗皮奥斯起草了一份王国政府的正式文件，即著名的《要求书》。《要求书》通知印第安人：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土地已由罗马教皇交给西班牙国王了，要他们承认教皇和西班牙国王是“这些岛屿和大陆的主人和君王”；如果他们胆敢违抗，将大祸临头云云。殖民主义者每侵入一地，都要把《要求书》作为最后通牒向当地居民高声朗读。由于殖民者不一定随时都有译员，往往当一读完印第安人所听不懂的《要求书》时，灾难便降临到他们身上了。

据传教士拉斯·卡萨斯的记载，西班牙殖民者打着“传播圣教”的旗号，以“救主耶稣”之名征服海地。当印第安人反抗时，殖民军对他们进行野蛮的屠杀。他写道：“小西班牙岛（即海地）是基督徒最先登上并消灭土著人的地方……基督徒用马、刀剑、长矛向他们攻击，到处发生血战和

想象不到的残酷。”殖民者“进入村里，不放过小孩、老人、妇女、产妇，把所有的人全部杀光，彻底加以破坏和摧毁……”“他们打赌和争论能不能一刀把人切成两半，或是用战斧能不能一下子把头砍下或把脏腑剖开。他们从母亲的怀里夺下婴儿，把脑袋往石头上撞。或者把人抛入河里，在看到垂死者泛起水泡时，笑着并开心地说：‘看！这就是异教徒的灵魂离开躯壳泛起的水泡’……他们用救世主和十二门徒的名义立起大绞刑架，在火刑柱上把印第安人活活烧死。”为了追捕那些躲藏在森林里的印第安人，“他们训练出最凶猛的猎狗，在一篇‘主祷文’^①没读完以前，就能把印第安人咬碎”（《世界通史资料选集（中古部分）》第322—323页。）后来，一个名叫瓦利亚洛博斯的人为殖民主义者的暴行辩护时说：“我们杀人和伤人，是为着要卫护对我主耶稣基督的信仰。这样，在蒙耶稣恩宠及为他服务中，我们可以用枪和刀赢得天堂。”（转引自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第115页）

16世纪2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墨西哥时，殖民军头目科蒂斯也是打着“神圣十字军”和“事奉上帝”的旗号，靠欺骗和残酷屠杀征服土著居民的。征服墨西哥后，西班牙殖民者的侵略魔爪伸向南美大陆。法兰西斯科·皮萨罗组织了一支远征队，自巴拿马出发，向位于今秘鲁地区的印加“帝

^① “主祷文”亦称“天主经”，是基督教最常用的一篇祈祷经文。教会称，“主祷文”是耶稣口授门徒的祈祷词，原载《新约·福音书》中。因教会称耶稣为“主”，故名“主祷文”。

国”进军。天主教士积极参加这次远征，在殖民军的领导集团里便有一名神甫——卢格。

1532年，皮萨罗乘印加“帝国”内部发生争夺王位的内讧，率领西班牙殖民军侵入，11月15日进占“帝国”北部重镇卡哈马卡城。印加“王”阿塔瓦尔帕率军约4万人驻扎城外，他缺乏对付外来侵略的经验，没有采取任何主动的军事行动。皮萨罗则设下圈套，派人去“邀请”阿塔瓦尔帕前来与他“会晤”。11月16日，阿塔瓦尔帕毫无戒备，带着一些没有武装的随从，坐着一乘黄金轿子进入卡哈马卡。但敌人全副武装，早就设下埋伏。阿塔瓦尔帕与皮萨罗会见之后，一个名叫维生特·瓦尔维尔德的神甫手里拿着一本《圣经》向他走来，对他说：“圣彼得及其继承人罗马教皇是基督在世的代表。教皇把全世界的土地分给了基督教的帝王并给这些君王以开拓的权利，其中一个区域付托给我们的皇帝兼国王查理陛下，皇帝陛下又派法兰西斯科·皮萨罗阁下到这里当总督……如果你愿意接受洗礼，皈依圣教，并服从督军（皮萨罗），即象一切基督徒一样行动起来，那么督军将保护你，并使这个地方享有和平与公正……你如果不顺从，督军就要诉诸武力，用火和剑来消灭一切手执长枪的人。”阿塔瓦尔帕听了这番话，感到十分气愤，义正辞严地回答侵略者说：“这里的土地和土地上所有的一切都为我祖辈所有，现在这一切都归我所有了。我不知道圣彼得把土地赐给任何人，即使赐给了，我不曾知道，也不想知道。我不知道创造天地的人和耶稣基督，只知道这一切都是太阳创造

的^①。在这里，太阳是上帝，土地是母亲，帕加卡马是祖先。”“我只尊重太阳神和我的祖先。”这时瓦尔维尔德神甫转过身来朝着西班牙人喊道：“进攻他们，进攻他们！”侵略军按皮萨罗事先的布置，从四面八方冲进广场。在战斗中，成千的印第安人被屠杀，阿塔瓦尔帕被逮捕。

皮萨罗以阿塔瓦尔帕为人质，进行敲诈勒索，要求印加人交纳巨额赎金。规定的赎金数目是：金子必须填满一间长32英尺，宽17英尺，高9英尺的屋子，还要用银子装满两间小屋。印加人为了营救他们的部族领袖，把能弄到的金银从各地急速运到指定的地点。但当赎金全部凑齐时，皮萨罗这个无赖却不履行诺言，背信弃义地把印加“王”阿塔瓦尔帕绞死了。

阿塔瓦尔帕被杀害后，殖民军侵占印加“帝国”的古都库斯科和全部领土，皮萨罗成为这个地区的统治者。在征服印加帝国期间，这夥打着“传播西方文明”的杀人匪帮不仅抢掠印加人的财富，还恣意破坏宏伟壮丽的庙宇、陵墓、古迹和艺术珍品，毁灭了光辉灿烂的印加文明。在印加“帝国”遭受这场浩劫后的20年中，西班牙殖民军又相继侵占今智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地区，把整个中、南美洲（除巴西为葡萄牙殖民地外）都纳入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版图之内，由西班牙政府进行了300年的殖民统治。

^① 印加人崇拜太阳神，认为太阳是造物主，本部族的始祖也是起源于太阳，他们称国王为“印加”，其原意为“太阳的子孙。”西班牙殖民者最初同他们接触时，错误地以其领袖的称号称呼该部族，称为“印加人”。

当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侵入美洲时，一些传教士是先锋。在殖民统治确立后，一些天主教会又是维持殖民统治制度的精神支柱。

迫使印第安人改奉天主教是西班牙王国巩固其殖民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殖民主义者每到一地，都有传教士伴随，进行布道，对土著居民软硬兼施，迫使他们受洗入教。仅在墨西哥被征服后的头15年中，就有400多万印第安人被迫受洗。有的教士每天要给1500个土著居民施洗。到1545年时，就以墨西哥城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大主教区。此后，每当西班牙殖民者建立一块新的殖民地，接着就出现一个新的教会组织。到殖民统治末期，拉丁美洲的绝大部分居民都成了天主教徒，整个拉丁美洲共有10个大主教区，38个主教区。在城市里，几条街巷便有一座教堂；在乡村，每个村落都有教堂。从殖民者到来至1623年的百余年间，在西属美洲殖民地总共修建大小教堂7万座。此外，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等修会组织还在各地建立许多修道院。不论在城镇或乡村，神甫、修士和修女随处可见。以利马城为例，16世纪中叶，该城仅有26500居民，但天主教的各类教士便占全城人口的1/10。这种历史状况，至今仍留下很大影响。目前，全世界有天主教徒5.4亿人，拉丁美洲就有两亿多，占总数的45%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大陆。

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会地位显赫，它的势力伸入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它拥有庞大的土地财产，占有拉丁美洲全部土地的1/3以上，是最

大的地主。它经营大种植园、工商业和放高利贷，残酷剥削和奴役印第安人和非洲贩运来的黑奴，还征收什一税和通过各种宗教仪式搜刮钱财。因此教会比世俗统治者更富有。同时，教会组织与殖民地行政机构并列，是殖民统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高级教职——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长由西班牙国王任命，神甫等一般神职则由殖民地总督指派。有的神职人员还兼任殖民统治机构的正式官职。教会垄断了殖民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各级学校或由教会创办，或由教会监督；各种书刊的出版发行须经教会严格审查。教会还掌握着殖民地的大部分司法权力。16世纪中叶，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下令在殖民地设立宗教裁判所。不少寺院里设有监狱，备有各种刑具。对有反抗殖民统治嫌疑的人，宗教法庭会立即以“异端”罪名将他逮捕监禁，受各种刑罚。16世纪后期，一个叫季叶伏·德·朗达的方济各会修士就严刑拷打过6330个印第安人，许多人被打成残废，其中有150多人当即死亡。传教士的狰狞面目已暴露无遗，所以在印第安人中流传着一句谚语：“公牛得提防它正面冲来，骡子得提防它后腿踢人，可是对神甫得从四面八方提防他。”

一些传教士不仅是殖民侵略者的得力助手，还是奴隶贩子们的亲密伙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资本家从肮脏的奴隶贸易中赚取巨额利润也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在欧洲殖民主义者从非洲大陆掳掠黑人奴隶贩运到美洲的这齣“人类血肉贸易”悲剧中，基督教会同样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最早贩卖黑人奴隶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为了使奴隶们驯服，奴隶贩子力求使他们受洗入教。所以奴隶商走到哪里，传教士便跟到哪里。十五六世纪时，在葡属安哥拉的罗安达港口，奴隶们在被驱赶上贩奴船以前，在码头上排着长队，由神甫施洗。那里有一把大理石椅子，就是当年葡萄牙主教给即将运走的奴隶施洗时坐的。葡萄牙政府向奴隶贩子征收营业税，而主教、神甫便从奴隶商手中获得施洗费。

到17世纪时，荷兰、英国和法国相继在美洲夺得殖民地，建立起棉花、烟草、甘蔗等的种植园，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劳动力，于是这些国家的商人纷纷到非洲贩运黑奴，奴隶贸易益发兴旺起来。17世纪中叶，荷兰人在奴隶贸易中居于优势地位，但从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英国人赶上荷兰人，在欧美各国中跃居第一位。英国贩运的黑奴只有1/3是贩入英属殖民地，其余的大量供应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荷兰人和英国人都是新教徒，但在贩运黑奴的肮脏贸易中，他们同西班牙、葡萄牙的天主教徒一样，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虽然英国也有基督徒反对这种肮脏勾当，但由于贩卖黑奴可以一本万利，故英国国教会（“安立甘教会”或译称“圣公会”）的神职人员都支持奴隶贸易。英王的枢密院属下有个指导奴隶贸易的专门机构，其中就有英国圣公会的伦敦主教参加。英国在西非海岸设立的每个贩奴商站的工作人员中，也都有牧师。英国海军头目兼奴隶商霍金斯的贩奴船还取名“耶稣号”。此外，神学家们论证奴隶贸易的

“合理”性，说什么赖有奴隶贸易，才使黑人受洗入教，从而获得“拯救灵魂”的机会。

由此可见，不论是天主教或基督新教的教士中，都有奴隶贩子的亲密伙伴。奴隶贸易推动着传教事业，而传教事业又回过头来为奴隶贸易效力，为美洲奴隶主提供更多的驯顺的奴隶。

到十八九世纪，从英国开始，欧美各国相继进入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有显著的发展。此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不再热衷于奴隶贸易，而着眼于夺取新的殖民地，扩大殖民地范围，并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开发自然资源，将它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供给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为实现这一目标，同以往一样，有些基督教传教士仍充当了殖民侵略者的尖兵。

在这个时期，英国是最主要的殖民侵略国家，也是进行海外传教最积极的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扩张相适应，从18世纪上半叶起，英国出现一个“奋兴布道运动”，企图振兴教会，掀起传教热潮。这个运动的核心人物是新教卫斯理宗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18世纪后半期，卫斯理宗开始海外传教活动。1788年英国成立“非洲内陆探险协会”，目的是深入非洲腹地，探查那里的资源。根据这一需要，英国的海外传教差会^①纷纷成立：1792年成立浸礼会差会；

^① 差会 (Foreign Missions) 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督新教派遣教士进行海外传教的组织，产生于17世纪中叶。早期的差会，有的直接由殖民主义国家政府主持。19世纪以来，形式上多由教会自己建立，一般都得到垄断资本集团的资助。到20世纪时，在大资本家资助下，美国基督教差会在人力物力上跃居世界首位。

1795年成立伦敦宣教会；1796年成立苏格兰差会；1800年成立基督会差会。其中，伦敦宣教会是一些新教教派共同发起创立的，该会的宗旨是：向“异教徒地区”和“未开化的民族”传教；传教士不分派系和宗派特点，着重传播各派共同承认的基本教义。该会的活动得到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资助。1799年，英国国教会又成立“非洲与东方行教会”，派出传教士到非洲，配合“非洲内陆探险协会”进行殖民侵略活动。该会的海外传教活动领取英国政府的津贴。

传教士在英国对非洲的殖民侵略活动中，起到殖民军队所起不到的特殊作用。在英国传教士来到南非以前，欧洲殖民者对土著居民实行野蛮的屠杀政策，遭到黑人部落的顽强抵抗，使英国政府陷入无休止的殖民战争中。后来，英国政府改行怀柔政策，利用传教士对黑人部落酋长从政治上进行收买拉拢。伦敦宣教会派往南非的著名传教士罗伯特·莫费特在博茨瓦纳地区成功地笼络霍屯督部落酋长，使他受洗入教，归顺英国殖民侵略者。19世纪后半期，博茨瓦纳终于沦为英国殖民地。

19世纪中期，伦敦宣教会的另一个著名传教士大卫·李文斯顿来到非洲。他先在博茨瓦纳居住，学习当地语言，熟悉土人的风俗习惯，然后把主要精力用于探险活动，打通贸易通道。1849年他从南非北上，到赞比亚寻找传闻中富有象牙的马古洛洛人。又从这里西行，直到安哥拉的罗案达，打开了通往西南非海岸的商路。后又折回马古洛洛人地区，沿赞比西河东下，1856年到达莫桑比克海岸，找到通往东非海

岸的路线。这时，他立刻回到英国，宣传他为英国开辟了横穿非洲大陆的商路。此后李文斯顿直接受雇于英国政府，担任远征队长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探险家。他以传教士的身份，在非洲活动数十年，为英国侵略掠夺非洲准备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调查了解到非洲内陆的许多准确情况，二是在沿途以小恩小惠和欺骗宣传取得土著部落酋长对欧洲人的好感。因此，李文斯顿得到英国政府的赏识。19世纪末基督教差会的负责人司弼尔牧师也十分得意地说：“大大有助于我们打开全世界的，首先是传教士，他们打开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如果不是传教士，我们就不会象今天这样认识全世界。整个黑非洲大陆，我们主要是靠了传教士才知道的。”

从1866年至1900年，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增加了一倍。1900年时，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面积达92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的40倍。在这段时期中，英、法、德、意、比、葡等西方列强为瓜分非洲展开十分激烈的争夺。各国的教会，不论是天主教或新教各派教士都各显神通，相互竞争，为本国的殖民侵略服务。结果，非洲的绝大部分肥美的土地被西欧各国殖民主义者鲸吞。南非的班图人民深有感触地说：“欧洲人来的时候，我们有土地，他们有《圣经》。现在，我们有《圣经》，他们有土地。”被侵略的殖民地人民心中十分清楚：传教事业与殖民侵略是血肉相连的。

七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时断时续，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

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西安附近盩厔（今周至）县的农民在掘土时发现一块长期埋藏地下的石碑。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石碑上端饰有十字架图案，下为碑文，题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全文共1700余字，概述景教教义及景教自波斯传入中国后的活动情况，碑底和两侧还列有汉文及古叙利亚文的景教僧侣名单。碑文为景教教士景净撰，吕秀巖书，石碑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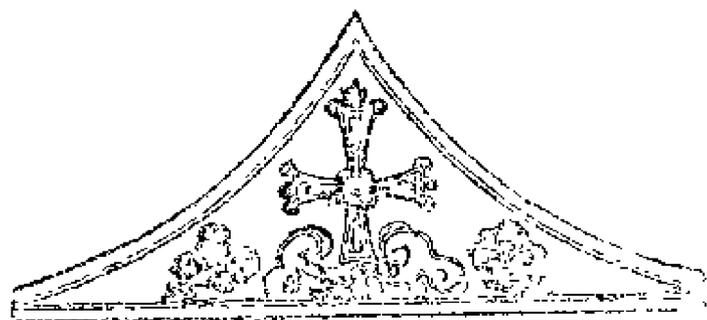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发现后两年（即1625年），来华的耶稣会会士金尼阁就把全部碑文译成拉丁文，不久后又有人把它译成法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和英文等多种文字，因而驰名中外。近几百年来，经过中外学者的精心研究，确认碑文中所说的景教就是基督教中的聂斯托里派传入中国后的称呼。

聂斯托里派是5世纪时形成的基督教派别之一，因信奉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托里所倡导的教义学说而得名。聂斯托里违背正统教义，主张基督具有二性二位，称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并未合成统一的位格，而分别形成神、人两个不同的位格；作为人的耶稣是马利亚所生，后被钉死于十字架；作

为神的“上帝之子”（圣子）和基督不是马利亚之子，故不能承认马利亚为“神的母亲”。431年，在东罗马帝国皇帝召集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聂斯托里学说被判定为“异端”，他本人被革职流放。他的信徒也受到迫害，逃亡东方，聂斯托里教派遂流行于叙利亚和波斯一带。由于波斯帝国与东罗马帝国长期对立，波斯皇帝收容和保护聂斯托里信徒，5世纪末又帮助他们建立独立的教会，使该教有较大发展。7世纪时，聂斯托里教派由波斯传入中国，取名“景教”。因该教发源于东罗马帝国，我国古时称罗马帝国为“大秦”，故在“景教”之前常加上“大秦”二字，或干脆称之为“大秦教”，其寺院先叫“波斯寺”，后改称“大秦寺”。

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及《唐会要》卷四十九的记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景教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携带基督教的经典，跋山涉水，从波斯来到唐朝都城长安，译经传教。这就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开端。

景教入华，曾受到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唐太宗派朝廷重臣房玄龄从西郊将阿罗本迎入长安。贞观十二年（638



景教碑顶的十字架图案石刻

年），唐太宗诏令在义宁坊建大秦寺一所。唐高宗时又下令在各州县建立景教寺院，并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由于皇帝的提倡，景教在全国传播开来，正如景教碑中所说的“法流十道”^①，“寺满百城”，可谓盛极一时。

但景教的盛况仅昙花一现，到唐朝晚期，它的地位急转直下。唐武宗鉴于佛教寺院地主势力过于强大，危及世俗地主的政治、经济利益，于是在会昌五年（845年），下令废止佛教，勒令僧尼还俗。景教是外来宗教，也受到牵连，景教寺院被废弃，教士2000余人被逐。此后，聂斯托里派虽仍在我国的边远地带（契丹、蒙古及新疆地区）流行着，但在内地却销声匿迹，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传播时期结束。直到元朝建立后，基督教才再次入华。

13世纪时，蒙古族兴起，并迅速向外扩张，成吉思汗的子孙的统治横跨亚、欧两洲。各个蒙古汗国都十分注意保护商路，使千余年来时断时续的东、西方交通畅通无阻。这时，从中国到欧洲，商使往来不绝。加之元朝政府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不仅原来流行于蒙古、中亚一带的聂斯托里教派在我国内地恢复活动，就是远在西欧的罗马教皇也派遣教士东来，把罗马天主教带到中国。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二次传播。

元朝时，人们把在华的基督教各派统称为“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一词为蒙古语，意为“有福缘的人”或

^① 唐朝时曾将全国划分为10个“道”（监察区），每道设高级官员1人，监督各地州、县官吏。

“信奉福音的人”。在文献中，不仅称教士为“也里可温”，也有称一般教徒为“也里可温”的。由于基督教各派均尊崇十字架，故当时人们又常称该教为“十字教”，称其教堂为“十字寺”。

许多蒙古人原来就是聂斯托里派信徒，入主中原后，把景教再次带入内地。此外，蒙古族统治者还与罗马教廷直接发生联系。1245年4月，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方济各会教士柏朗嘉宾来华。1246年夏，他到达和林，企图劝说蒙古大汗皈依天主教。1294年（至元三十一年），罗马教皇又派特使约翰·孟德高维诺（方济各会教士）来到元朝首都汗八里（汉名大都，即今北京），不久，获准在北京传教，先后建教堂3座，并将《新约全书》及《旧约·诗篇》译成蒙古文。当时，在北京受洗入天主教者达6000人之多。1307年春，教皇获悉孟德高维诺在华传教成功，封他为汗八里总主教兼东方宗主教。此后，孟德高维诺派遣教士到各地传教，1313年在东南沿海最大港口泉州添设一个主教区，任命哲拉多·阿布意尼为主教。

据文献记载，除北京及泉州外，甘州、宁夏、杭州、温州、镇江和扬州等地均建有“十字寺”，在全国大多数省区都可遇到也里可温教徒，其中有不少达官贵人、学者名流和医师。元朝政府还专门成立了管理基督教事务的机构——“崇福司”，由此便可窥见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盛况。但也里可温教信徒多半是蒙古人和迁居内地的中亚人，它在内地广大社会下层群众中没有牢固的根基，所以随着元朝政权的

倾覆，基督教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又湮没无闻了。

在中断两个世纪后，至明末清初，天主教再次入华，这是基督教在我国的第三次传播。

从16世纪起，随新航路的开辟和西方国家早期殖民侵略活动的开展，基督教的海外传教事业兴旺起来，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他们的重要目标。自明朝中叶起，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会上，相继到中国活动，其中以葡萄牙派遣的耶稣会士势力最大。

最早被派遣到我国的耶稣会士是方济各·沙勿略。1540年，他奉葡萄牙国王之命，以罗马教皇的使者的名义来到亚洲，先在印度的果阿、东南亚和日本活动。1551年，他从日本乘船抵广东台山县属的上川岛，企图进入我国内地传教。由于明朝政府厉行海禁，沙勿略请求一个中国商人用船送他到广州，但被拒绝。面对着严密封锁的中国大陆，他一筹莫展，不久病死在上川岛上。

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侵占我国澳门，从此便以澳门作为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据点，作为耶稣会对我国内地传教的基地。在沙勿略死后30年，能随机应变的耶稣会士利马窦利用各种手段，终于从澳门挤进中国，逐步深入内地，扎下根来，打开传教的局面。

利马窦，1552年生于意大利，19岁时成为一名耶稣会员，28岁时升任神甫。明万历十年（1582年），在葡萄牙殖民者支持下，他受命到澳门学习汉文。次年，他偕同另一名意大利籍教士罗明坚至广东肇庆，向地方官员赠送厚礼，请

求在当地居住，终于获得一块空地建起寓所和一座小教堂。为便于同中国人接触，他们不穿天主教士的圣服，而身披和尚的袈裟，薙须剃发，并命名其小教堂为“仙花寺”，故人们称他们为“西僧”。为吸引群众到教堂听讲，他们在教堂的接待室里陈列着西方国家制造的时钟、天体仪、地球仪等物品，墙上还悬挂着标有汉文地名的世界大地图。为迎合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天朝上国”心理，他们所绘制的世界地图，故意移动子午线的位置，把中国放在地图正中。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利马窦至韶州。他敏锐地觉察到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官方的统治思想，要在中国立足，传教必须适应中国国情，利用儒家的思想形式。于是他开



身穿儒服的利马窦

始研读儒家的四书五经，并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起，脱去和尚的袈裟，改穿儒服，戴上儒冠，并自称是“西儒”。随后到江西南昌和江苏南京活动。1596年他被任命为在华耶稣会会长。这时他更明确提出“耶儒合流”论，极力主张把中国的儒家思想和祭孔子、敬祖先的习俗同天主教的教理教仪揉合起来。他在南昌编印的《天学实义》（后改名《天主实义》）一书，使用儒家的思想

形式解释基督教教义，说“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①也”。此外，利马窦还以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数学、天文、地理等）的方式，结交士大夫阶层和统治集团，当时的一批名流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都与利马窦过从甚密，先后受洗入教，成为中国早期天主教会的台柱，被誉为“教中三杰”。

利马窦的最大希望是得到中国皇帝的信任，使他皈依天主教，并通过皇帝带动百姓受洗入教。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利马窦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传教士庞迪我陪同下进入北京，觐见明朝神宗皇帝，“献天主圣像、圣母像、天主经典、自鸣钟大小二具、铁弦琴、万国图（世界地图）”等。他还借用儒家词语向皇帝传教，说：我们信仰的“上帝就是你们所指的天，他曾经启示过你们的孔丘、孟轲和许多古昔君王；我们的来到，不是否定你们的圣经贤传，只是提出一些补充而已。”利马窦甚得神宗欢心。虽然皇帝没有接受洗礼，但批准利马窦长期居住北京传教，并赐给一所住宅。后来在这所住宅旁建起一座天主教堂，即今北京宣武门内“圣母无染原罪堂”的前身。利马窦居住北京10年，“交游益广，著述益多”，译著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万国輿图》、《乾坤体义》等（其中有些书是与徐光启或李之藻合译的），把欧洲当时的先进科学知

^① 基督教的两大教派——罗马公教传入中国后，将基督教信奉的“神”译作“天主”，故在中国称该教派为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新教各派则多半借用中国原有词语，将“神”译称为“上帝”。

识介绍给中国。另一方面，他把中国的儒家典籍翻译成拉丁文介绍给欧洲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马窦病逝于北京，神宗应群臣请求，下诏以陪臣礼葬之于阜成门外二里沟。

明末清初，继利马窦之后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仍在中国传授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他们取得朝廷信任，有的在朝廷任职，掌管钦天监，修订历法。朝廷允许外国教士在中国十三省中自由传教。明朝末年，宫廷贵族中领洗入教者多达500人左右，在全国各阶层中已有天主教徒3万多人。

清兵入关后，天主教势力仍继续发展。汤若望同样受清朝皇帝重用，任钦天监监正，后又领太常寺卿、光禄大夫等衔。顺治皇帝把他视为顾问，常召他入宫咨询，并尊称他为“玛法”（满族语对长辈的尊称）。顺治帝甚至不顾皇上身份，到汤若望的寓所去过生日。顺治七年（1650年），皇帝赐金千两，在北京宣武门内建立天主堂1座。康熙帝即位后，传教士南怀仁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奉命制造天文仪器；后又加封太常寺卿及工部侍郎，监制火炮。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时，来华天主教士徐日升、张诚被任命为译员。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朝廷任命天主教传教



著清朝官服的南怀仁

士白晋、杜德美、雷孝思等人赴17个省区测量地形，绘制地图。绘制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的工作历时11年始完成。

清初，天主教教士除一部分人在宫廷任职外，多数人在全国各地进行传教活动。康熙年间，天主教在我国已初具规模，最盛时教徒人数发展到30万人左右，其中大多数属于耶稣会接受的信众。不久后，由于发生“中国礼仪之争”，导致清廷下令禁教，使天主教在我国的传播一度受挫。

所谓的“中国礼仪之争”是天主教各派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习俗问题上发生的论争。最早派遣传教士来华的国家主要是葡萄牙。原来，由葡萄牙政府控制的在华耶稣会，遵循利马窦的传教方针，适应中国国情，允许中国天主教徒保留祀孔祭祖的传统习俗，故传教颇见成效。但后来由西班牙派遣来华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教士企图削弱葡萄牙势力，夺取在中国传教的垄断地位，断定教徒祭祀孔子和祖先属于“异端”行为，不能宽容；同时提出“维护天主教的纯洁性”的口号来批判耶稣会，还向罗马教皇提出控告，于是在教会内部挑起论战。随事态的发展，这场教会内的论争演化成罗马教皇与清朝皇帝的公开冲突。

1700年，康熙皇帝公开表态：“祭祖祀孔”是中国传统礼俗，与宗教无关。但教皇借教会“礼仪问题”肆意进行干涉，于1704年11月20日订出“禁约”，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本国的传统习俗，并派出代表到中国 与清廷谈判。1705年12月，教皇使节铎罗到达北京，要求康熙皇帝运用行政权力

下令中国天主教徒遵守教皇“禁约”，停止祭祀祖先和孔子。康熙帝维护中国的传统习俗，拒绝教皇要求，并将铎罗驱逐出境。1706年12月，康熙帝发布命令：“凡传教士愿按清政府规定安分传教者，可领取传教印票，不从者一律遣返回国。”于是那些反对中国礼仪的外国教士概被驱逐出境，但罗马教皇执意坚持，于1715年重申“禁约”，宣称凡违背“禁约”者均视为“异端”处以绝罚。1720年，教皇再次派使节到北京谈判。在谈判中，康熙帝态度强硬，寸步不让，教皇使节嘉禄只得妥协，提出“八项准许”，同意教徒可在与教皇禁令精神不相悖的情况下，行非宗教性的中国礼仪。可是教皇仍不甘休，于1742年又重申1715年的禁令，废除“八项准许”，指令传教士督促中国天主教徒顺从教皇。乾隆皇帝同康熙帝一样持不妥协态度，并严禁传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更实行闭关政策。从此时起直至鸦片战争的1个世纪间，清廷对洋教一般采取严格取缔的方针，订出传教治罪条例，所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又一度进入衰落时期。正如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所说：“在1700至1842的140多年中，天主教在中国变得奄奄一息，不绝如缕了。”

清朝中期，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虽被削弱，但其传播并未中断。清政府一面禁教，一面继续任用一些西洋教士帮助修订历书，还有数十名天主教士在各省秘密活动。而且在这个时期，基督教的另一个教派——东正教正不断向我国渗透。

自17世纪中叶起，伴随着沙皇俄国对我国的侵略，东正教开始在我国黑龙江边境地区活动并传至北京。1685年，在北京东直门内建立一座东正教堂——俄罗斯“北馆”，不久，东正教会正式命名它为“尼古拉教堂”。由于当时中国人称沙俄侵略者为“罗刹”，故又称“北馆”为“罗刹庙”。沙皇政府十分重视东正教士在对外侵略扩张中的作用，每次派商队来华，都配备有传教士随行。1715年，俄国政府奉彼得大帝之命，正式派遣第一个传教士团体（“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到我国，进驻俄罗斯“北馆”。雍正六年（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商定：“东正教传教士团”长驻北京，其成员有4名神职人员和6名世俗人员，每10年轮换一次。1732年，传教士团由清政府协助，在北京东江米巷（后改称东交民巷）兴建一座新的东正教堂——“奉献圣婴堂”（或称“圣玛利亚教堂”），即俄罗斯“南馆”，作为他们永久性驻地。自此，东正教传教士团由临时性组织变为常设机构，它是沙皇政府派驻我国的官方代表，名为教会，实际上是沙俄枢密院与中国理藩院之间的官方联络站，也是沙皇俄国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中心。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条约》，沙俄政府在中国设立公使馆，东正教传教士团改由俄罗斯正教会牧首公署管辖，表面上改为单纯的传教机构，实际上仍受沙皇政府外交部的操纵，在我国刺探机密，搜集情报，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效劳。

从1715年至1860年这一个半世纪中，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共换班13次，来华教士共150余名，发展教徒200名左右，

为后来东正教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打下基础。这一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清朝中叶基督教在我国虽一度衰微，但传教活动并未中断。

自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列强用洋枪洋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不平等条约钳制下，清政府被迫取消传教禁令，洋教士蜂拥而入，教会势力迅速膨胀起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第四个时期。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第四时期以新教来华为起点。基督教新教各派传入中国远比天主教和东正教为晚，始于19世纪初期。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是英国人马礼逊（R. Morrison, 1782—1834年），他受伦敦宣教会的派遣，于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来到广州。那时清政府仍实行禁教政策，他不能公开活动，先在广州的美国商馆里隐居1年，埋头学习汉语。1809年，受聘为东印度公司的翻译，遂以这一公开



马礼逊像

身份进行活动。1816年，英国政府特使阿美士德到北京谈判时，马礼逊被任命为他的秘书兼翻译。1834年当英国政府派商务监督律劳卑驻广州时，马礼逊又担任秘书兼翻译职务，同年死于广州。马礼逊来华25年间，虽然由于传教工作的困难，由他施洗接受人教者寥寥无几（大约10人左右），但他和他的助手一起编译

了基督教新教的第一部《圣经》的汉文译本，编辑了《华英字典》和编写传教书籍《救赎救世总说真本》等，可以说，他实为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先驱者。

继马礼逊之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督教新教差会陆续派遣教士来华，其中著名者如米怜、裨治文、罗孝全、郭士立（郭实腊）、文惠廉、卫三畏等。他们在广州商行内设诊所，在广州创立小学，办《中国丛报》，在南洋出版书刊，为在中国发展传教事业作准备，同时制造舆论，鼓吹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署不平等条约和打开中国的大门。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随后在各帝国主义列强的威逼下，又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1844年）、《黄埔条约》（1844年）、《天津条约》（1858年）、《北京条约》（1860年）和《辛丑条约》（1901年）等。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起草和签订大都有西方传教士参与策划，有的还出自他们的手笔。如郭士立参与签订《南京条约》，伯驾、裨治文为《望厦条约》出谋划策，卫三畏、丁韪良参加签订《天津条约》。在这些条约里，都写进了容许外国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所谓“宽容条款”。如在《望厦条约》第十七款中，美国人取得了在我国5个通商口岸自行建立教堂的特权。1844年10月24日，中法两国代表在黄埔的法国军舰上签订《黄埔条约》，除了给法国人在5个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和坟地的特权外，又规定如有人侵犯法国教堂和坟地，清朝地

方官员要严加治罪。在这一条约的基础上，法国代表拉萼尼进一步要求清政府废除实行了120余年的禁教令，并发还雍正年间被封闭的天主堂旧址，道光皇帝一一依允。在英法联军大炮胁迫下订立的《天津条约》里，也写进了“宗教宽容条款”，教士不仅可在通商口岸活动，还可以“安然入内地传教，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毫不得刻待禁阻”。在签订《北京条约》时，不仅把传教士到内地传教的条款写上，而且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居然在条约的中文本里擅自添加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一语（这句话在条约的法文本中是没有的，）真是胆大妄为！

在上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传教士伴随着鸦片、商品和大炮，毫无阻拦地来到中国，并长驱深入内地活动。他们在全国各地遍设教堂，创办学校、医院、孤儿院，还建立“广学会”这样的机构出版书报杂志，使基督教在我国得以广泛传播，教会力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自《南京条约》签订至抗日战争前的90余年中，天主教派到我国的修会已达100多个，女修会80多个。1936年时，我国天主教徒发展到280万人。全国划分为130多个传教区（99个“宗座代牧区”，设主教；38个“监牧区”，由没有主教衔的神甫管理）。

东正教也有所发展，1860年以后，其势力从北京扩展到华北、东北、华东和西北各地。据1905年报刊统计，当时在蒙古和新疆等西北地区注册登记的华籍东正教徒有37000多人。

东北地区至1938年有教堂67座，教徒25000人，因而建成独立的教区。

基督教新教自马礼逊来华起的1个多世纪中，传入我国的教派共有100多个，同一个宗派内又有英、美、德、法之分，它们代表各自的国家和各个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争相在中国建立基地，划定势力范围。如圣公会主要势力在上海至厦门一带，浸礼会在宁波，归正会在厦门，美以美会在四川，循道会在湖南，自理会在云南等。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这是个跨宗派的差会组织，任何宗派均可参加，总部设在伦敦。内地会曾派遣大批传教士深入我国内地各省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到1936年，仅内地会在我国便拥有教堂1233座，堂支会2000余处，教徒9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基督教各派在我国的力量又有新的发展。解放前夕，天主教徒有320余万人，罗马教廷正式将我国天主教组织划分为20个教省（辖有总主教区12个，主教区85个，监牧区34个，自立区4个），共拥有大小天主堂15000座。基督教新教徒则有70万至100万人之间，分别属于150多个外国差会，其中美国差会最多，共有70多个。

基督教在我国的第四传播期与第三传播期情况不尽相同。第三传播期（明末清初），即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来华的那段时期，中国与派遣传教士的那些西方国家还处在平等地位，相互和平交往。利马窦等教士为达到传教的目的，除传教外，还从事翻译活动，把西方当时先进的科学文

化知识介绍给中国，又将中国古代文献翻译为西文介绍给欧洲，在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东、西方人民友好往来方面，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但自鸦片战争以后，即基督教在中国的第四传播期，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基督教各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各派）均为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服务，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并非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是帝国主义分子，有些人是因失业谋生路而当牧师的，有的传教士在抗日战争中还同情和帮助过中国人民。但是，作为整体来说，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总是控制和利用天主教会和新教差会，让传教士充当他们侵略中国的先锋，这就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史烙上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刻印记。

沙皇政府几次训令驻北京的俄罗斯传教士团：“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重大政治事件”；传教士团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派到北京去的传教士团监护官搜集有关中国及其领土的可靠情报。”

鸦片战争期间，美国新教传教士雅裨理和文惠廉参与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罗伯济乔装打扮成中国人，乘一只小船去会见英军司令璞鼎查，报告南京教区社会情况和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1848年，文惠廉胁迫上海道台吴健彰在上海开辟美租界。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与英、法相互勾结。东正教

北京传教士团领班固里搜集到我国的重要军事情报：“清政府集结兵力57000人，其中3万人驻大沽口，5000人在山海关，北塘毫无戒备。”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迅速将这一情报转告英、法方面。英法联军即避开设防的大沽口，在“毫无戒备”的北塘登陆，从侧背攻下大沽口，英法联军遂顺利北上，进逼北京。

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于1865年创立内地会，曾为侵华英军提供大量情报。内地会教士身边藏有一本密电码，随时将他们在我国各地搜集的情报用密码发往上海的内地会办事处，再转发伦敦。

八国联军侵华时，则尽量搜罗在华外籍教士充当向导、翻译官或情报官。著名传教士李佳白、丁韪良都当上翻译官。英军打到天津时，雇用驻天津的英国教士宝复礼担任该军情报处官员，他随军从天津打到北京，一路上带领几名便衣侦探窃取情报，绘制行军地图。英军进攻北京城时，他又为英军参谋长献计献策。

此类情况，不胜枚举。



著军装的宝复礼

19世纪后期，深入全国各地传教的一些外国教士，依恃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和在 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作恶多端。他们欺压我国人民，霸占田产，逞凶杀人，包揽词讼，并搜罗一些流氓歹徒入教，寻衅闹事，挑起非教徒与教徒间的纠纷。清政府

官员，慑于帝国主义淫威，在处理“民教纠纷”时，总是“护教抑民”，受压的百姓有冤无处伸，以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据不完全统计，自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末，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教案”就有400多起。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精神，也暴露出这种自发斗争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最后，在帝国主义及卖国的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党和政府制订了正确的政策，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操纵一贯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国际基督教会反动势力和他们在中国的少数代理人，披着宗教外衣，大搞间谍破坏活动，并煽动某些教徒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反对社会主义祖国。这些反动行径激起爱国教徒的极大愤慨。1950年，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基督教（新教）爱国教徒联名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新教）教会和团体割断与外国差会的关系，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地自办教会。1950年11月30日，四川广元天主教神甫王良佐为首的500名教徒也发表宣言，倡议中国天主教会割断与帝国主义者的联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这两个宣言得到广大教徒的热烈响应，掀起全国规模的“三自爱国运动”，割断中国教会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清除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废除

教会中的封建特权与剥削制度，独立自主地和民主地管理教会，改变了国内外剥削阶级控制我国教会的状况。1954年，正式成立我国新教徒反帝爱国的群众团体——“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57年，又正式成立我国天主教神长和教友的爱国群众团体——“中国天主教爱国会”。1980年，我国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会又分别举行全国代表会议，成立“中国基督教（新教）协会”和“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分别作为新教和天主教的全国性教务机构。

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我国的新宪法，再次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是一项长期的政策，是一直要贯彻执行到将来宗教自然消亡时为止的政策。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在世界观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是对立的；但是在政治行动上，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的宗教信徒完全可以而且必须结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广大的爱国基督徒，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近年新修订的章程都一致表明其宗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教友，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下，开展与国际宗教界人士的友好往来，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贡献力量。

——附录

本书参考及引 用的主要书目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
- 列宁全集 人民出版社
-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三联书店
- 新旧约全书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
- 基督教之基础 [德]考茨基著 三联书店
- 基督教的起源 [英]阿·罗伯逊著 三联书店
- 基督教简史 [美]G·F·穆尔著 商务印书馆
- 基督教会史 [美]华尔克著 广学会出版
- 基督教会简史(Short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约·赫·赫斯特著 纽约、伦敦版
- 基督教史纲 贾立言编 广学会出版
- 基督教史纲(上册) 杨真著 三联书店
- 朗克教皇史(Rank's History of the Popes) [德]朗
克著 1908年伦敦版
- 教会历史 谷勒本著 香港道声出版社
-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选 商务印书馆
- 耶稣 [英]汉弗雷·卡本特著 北京工人出版社
- 耶稣传 [德]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著 商务印
书馆

- 忏悔录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 商务印书馆
- 马丁·路德传 何礼魁著 香港道声出版社
- 路德选集 香港版
- 梵蒂冈——宗教、财政与政治 [苏]约·拉甫列茨基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 梵蒂冈史 [苏]M·M·舍英曼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罗马天主教会与英国的反宗教改革 (Rome an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in England) 腓力普·休斯
著 英国版
- 阐明教会历史的文献(卷三)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Vol. III .C.500—1500)
英国伦敦出版
- 剑桥古代史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剑桥
大学出版社
- 剑桥中世纪史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剑
桥大学出版社
- 新剑桥近代史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剑桥大学出版社
-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美]汤普逊著 商务印书馆
- 中世纪史(第一卷) [苏]科斯敏斯基编 三联书店
- 中世纪初期的西欧 齐思和等译 三联书店
- 中世纪中期的西欧 刘启戈等译 三联书店
- 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集 耿淡如译注 天津人民出
版社

- 世界通史资料选集（中古部分） 商务印书馆
- 世界通史 苏联科学院主编 三联书店
- 西方文明史 (A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美]
R.N.斯特朗伯格著 美国版
- 文明简史 (A Shor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美]H.S.卢卡斯著 美国版
- 法国史 [法]瑟诺博斯著 商务印书馆
- 意大利简史 [英]赫·赫德等编 商务印书馆
- 人民的英国史 [英]阿·莱·莫尔顿著 三联书店
- 德国史 [德]维纳·洛赫著 三联书店
- 瑞士简史 [瑞士]埃·邦儒尔等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拉丁美洲国家史稿 李春辉著 商务印书馆
- 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 [英]阿·克·穆尔著
中华书局
- 江南传教史 [法]史式微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利马窦中国札记 利马窦、金尼阁著 中华书局
- 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 江文汉著 知识出版社
- 景教碑考 冯承钧 商务印书馆
-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 德礼贤著 中国出版
-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中华书局
-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张星烺编注 中华书局
-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顾长声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 曹琦、彭耀宗著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版权归作者所有

友情提示：本书仅作为学者资料研究之用，
不建议普通信徒阅读。

天主教在线
www.ccccn.org